

編者的話

文 / 式

自 2019 年起，香港人一直在成長，《如水》雜誌創刊逾一年，也沒有不成長的藉口。

《如水》讀者將發現我們本期作出大幅改版。其中最明顯改動，莫過於我們增加一系列採訪與報道。我們以圖片故事，嘗試在官方外宣角度之外論述主權移交 25 年後的香港。我們增加了「世界・香港大事回顧」、「流散港人動向」、「外媒觀點整理」以及「香港研究進展」四個篇章，既是為留下香港人的歷史紀錄，也希望藉此能讓讀者更緊貼與香港以及世界相關動向。我們也添加編委問答欄目，讓我們在主題以外回應讀者關心的議題。最後，我們把版面分成時政與文化等部分，嘗試以更多角度回應每一期的主題，既是為拓寬我們的思考與討論空間，也希望不同讀者都能在《如水》中找到自己喜愛閱讀的文章。同時，我們在保持文章質量的前提下縮短了大部分文章篇幅，讓讀者能在繁忙的日常之中更易抽空閱讀香港。

香港共同體面對的課題之一，是我們應該如何梳理與中國政府、中國人、以及中華文化之間的關係。中國是否只是一個我們共同面對的敵人？抑或我們依然在共同建設一個民主中國？我們能否完全與中國以及中華文化完全劃清界線？這些問題關係到不只是我們應如何與世界各地盟友去呈現自己，更關係到一個更根本問題：到底什麼是香港人？何謂香港民族？我們是誰？我們又想成為誰？

在 2019 年後，香港人終於踏上國際舞台。然而，我們在這舞台上，卻發現香港往往被放在中國議題之下。《如水》本期訪問張崑陽、劉祖廸以及鄺頌晴。他們均提到在從事國際倡議工作之際，發現有部分外國政客或因為西方殖民史而對中國感到愧疚，或有人對中國持有不設實際的幻想，忽視中國已成另一個霸權。但或許香港人面對最大的難題是若果香港議題從中國議題切割出去的話，就難以說服國際社會持續關心香港。到底他們三人各自如何走過重重的難關，在讓世界看到香港的同時，保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在訪問中，張崑陽指長遠來說我們必須以香港研究把香港打進國際的知識與話語圈中。然而，從事香港研究，或許不比國際倡議簡單。《如水》本期訪問撰寫《香港__何去何從》的日本學者阿古智子以及通過 80 後學者卡卡的文章，討論中國與香港研究的前世今生。若然在政界中香港議題被視為中國議題一部分，在學界中香港研究這領域尚在成形。香港學者如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而隨著中國與香港言論自由不斷收窄，我們如何繼續研

究香港？我們又應該如何梳理學術研究、社會、以及政界之間的關係？

這些問題看似是倡議者與學者的問題，但其實也是每一個香港人需要學習的課題。到底我們要如何論述自身歷史，選擇與誰連結，並帶領香港共同體在未來走上一條怎樣的道路？我們邀請了《香港民族論》編者之一的梁繼平，與他討論香港民族論述在這流散時代有何意義。

而徐承恩在其《脫華論：告別黃河，擁抱海潮》一文中，提出一個不一樣的歷史框架：「一個中國」從來都不存在過，海潮的東亞與河流的東亞本分屬兩個世界。我們應該重新把東亞史詮釋為大陸帝國與沿海族群的角力，以把香港定位為沿海族群的一員。在這個脈絡之下，到底香港應該如何連結沿海各個族群並擔當起對抗大陸帝國的先鋒角色？前區議員張嘉莉在其《由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的融合 走到 大同世界主義》一文則有稍為不一樣的理解。對她而言，「大中華派」與「本土派」的對立已成往事，而在當下香港人已經鞏固了自己的主體性，不再被大中華迷思所囿困。張嘉莉看到的是香港人比其他人更能理解其他受打壓的族群的困境。若然如此，我們在國際線可以作出什麼貢獻，與其他族群一起建構一個不一樣的大同世界？當我們在建立香港人共同體的同時，我們也在與其他人一樣在重塑這個世界，但在眾多路線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崗位？《如水》這期也訪問了溫哥華的港人，嘗試理解他們如何梳理這個課題。

這些問題看似宏大，但其實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每日都會面對。旅居柏林的木子雨通過他在德國尋找正宗茶杯的旅程，反思到底何謂鄉愁，何謂正宗的文化。紅眼則通過剖析一系列愛國「爛」片，討論我們應如何看待中國大外宣策略。日荅則剖析《聲生不息》等不同節目如何嘗試通過流行文化統戰香港人，並思考香港人應該如何走出這個困局，撰寫香港人自己的流行音樂。文化解殖，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蔡慧敏及高仲明通過台灣如何處置蔣介石像的故事，讓我們反思應如何處理自己的過去。

隨著香港流散族群擴大並成長，《如水》團隊也一直在發展並反思這本雜誌的角色與路線。我們至今沒有改變要以此空間去維繫香港共同體以及承傳抗爭火種的決心，隨著時代改變，我們亦以「流動若水」原則，去迎合香港人新需要及新挑戰，唯望讀者能給予我們反饋，讓我們一起為香港人建構更美好未來。

目錄

本期專題：流散時代的「大中華膠」

前言

- 02 編者的話 文 | 式
04 目錄

報道 / 長篇

- 07 【日本】阿古智子：失聲年代 在漩渦呼喊的人 文 | 劉 言
20 【英國】「為甚麼你要研究這可怕的政權？」 文 | 卡 卡
「中國研究」在英國
30 【加拿大】當溫支聯放棄「建設民主中國」之後 文 | 冬 甩
新一波移民潮下，溫哥華港人的繼續抗爭

報道 / 論述

- 42 當香港民族不再只是論述 與梁繼平的問答 文 | 亞 當

報道 / 國際線

- 54 以香港研究、文化實力跟大中華膠說再見： 文 | 亞 當
訪問張崑陽、劉祖迪、鄭頌晴

評論・時政

- | | | |
|----|---|---------|
| 78 | 香港/脫華論：告別黃河，擁抱海潮 | 文 徐承恩 |
| 82 | 流散/從“I come from Hong Kong”
到“I’ m a Hongkonger” | 文 冬 甩 |
| 88 | 抗爭/由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的融合
走到大同世界主義 | 文 張嘉莉 |
| 93 | 倫理/海外抗爭倫理之失範與重構——
世界港人的意志共享及相互制 | 文 柳廣成 |

評論・文藝

- | | | |
|-----|----------------|--------------------|
| 100 | 大舞台/當中華膠變成麥高維治 | 攝 高仲明
文 蔡慧敏 |
|-----|----------------|--------------------|

評論・文化

- | | | |
|-----|--|---------|
| 106 | 書評/向中共學習 製造香港、台灣軟實力
評《中國軟實力 China Soft Power》 | 文 六 月 |
| 110 | 電影/愛國片不一定是爛片
但為何中國的幾乎都是 | 文 紅 眼 |
| 116 | 音樂/LONG LIVE 廣東歌
從《聲生不息》看流行音樂與身分的關係 | 文 日 巷 |
| 120 | 飲食/追尋完美之茶杯、或曰 2022 年的正宗 | 文 木子雨 |

評論・讀者投稿

- | | | |
|-----|----------------------------|---------|
| 130 | 我愛我的國 而她尚未誕生：
大中華獨理理論基礎 | 文 羅 依 |
| 134 | 中國即外國：文化詮釋與割捨 | 文 兩 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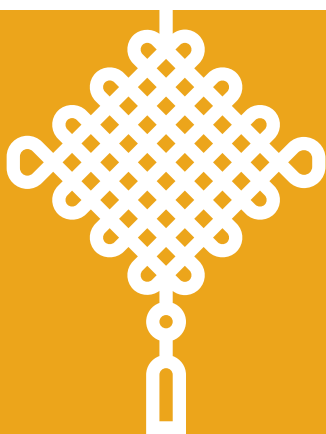
本季焦點

報道 / 化零為整

- | | | |
|----|-----------|---------|
| 62 | 世界・香港大事回顧 | 文 編輯室 |
| 68 | 流散港人動向 | 文 編輯室 |
| 72 | 外媒觀點整理 | 文 編輯室 |
| 76 | 香港研究進展 | 文 編輯室 |

評論・文藝

- | | | |
|-----|-----------|---|
| 104 | 四手聯彈 | 畫 Justin Wong
vawongsir
日巷
柳廣成 |
| 126 | 編者答 / 鍾桑豪 | |
| 127 | 編者答 / 鄭頌晴 | |
| 128 | 編者答 / 黃台仰 | |
| 129 | 編者答 / 馮敬恩 | |
| 136 | 編者結語 | |





報道／長篇【日本】

阿古智子：失聲年代 在漩渦呼喊的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之後，舉國歌頌安倍的功績。東大教授阿古智子叮囑在亂世要特別保持理性，小心過濾訊息。（劉言攝）

文／劉言

香港記者，關心亞洲人權及身分問題，相信採訪有助豐富人類的思維角度。世界再壞，也需要報道

《產經新聞》副總編輯藤本欣也在《港區國安法》成立後一年，撰文形容《港區國安法》儼如一輛隱形坦克車，正摧毀香港文明自由與法治。事實上，日本國內不少國民已對香港生畏，在他們眼中，《港區國安法》已成為共產黨隨意拘捕反對者的工具。

《蘋果日報》被粗暴取締，老闆黎智英被捕、《立場新聞》被控涉嫌發布煽動刊物罪，《眾新聞》宣布停運，過去繁囂喧鬧的大城市，一下子被滅聲，市面一片肅靜，今日的香港靜得可怕。

東京大學近代中國研究專家阿古智子曾撰文談論「香港殖民地的悲劇」，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竟積極解釋並使用殖民惡法，令「一國兩制」陷入尷尬局面：今日的香港是否被二次殖民？阿古智子隔岸看着香港這個曾是「無民主有自由」的城市，一座座言論自由堡壘一一被摧毀。





大台已死，眾人靠自己發聲，教授亦然。阿古智子在2019年至2020年奮筆直書，今年其著作《香港——何去何從》推出中文版。該書記錄海峽兩岸因「中國因素」發生的一連串變化，2020年在台灣總統選舉前落實《反滲透法》，加強境外勢力的監控，同年中央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令言論自由的空間大幅收窄。

7月8日，日本參議院選舉前兩天，14歲的山上徹也在奈良向前首相安倍晉三身後連轟兩槍，槍聲劃破長空，這兩槍觸動日本國民的神經，也在改變日本的命運……

香港和日本，彼此也被捲入無力無聲的漩渦。當權者漠視無權勢者的存在，無權者就用暴力手段發出最後的呼喊。

疫情當前，戰爭回歸，暗殺政治人物，保守主義抬頭，網絡上盡是假新聞……很多事情回到二戰之前的氣氛。網絡促使個人主義抬頭，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愈來愈細，阿古智子倡議用理性態度為社會呼喊，還有意義嗎？



踏單車的教授

安倍晉三暗殺事件發生之後數天，約阿古老師喝茶，騎着單車的阿古突然停車在我面前。「不好意思，我遲了。」她輕輕的跨過座駕，推車四處找泊車處，可是拐了一圈也找不到。始終日本不是一個可以隨處泊單車的地方，最後她還是決定停在咖啡廳前，「停在這，應該沒事的」，在門外放下單車便推門入咖啡室。

大汗淋漓的阿古坐下來轉用國語說話，她說留意到國內外媒體追捧「安倍經濟學」，事實上在這種低日圓匯價、低息政策在全球通貨膨脹下，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內閣仍坐困愁城，苦無對策；剛過去的參議院選舉，執政聯盟加上支持修憲的兩黨，參議院議席超過三分之二，議席的數目足夠提出修憲，安倍被刺殺之後國民多了危機感，或許傾向支持；說時遲那時快，岸田文雄稱為解決能源危機，重新啟動6個核電廠，面臨冬天缺電，民間一時不知如何回應這則新聞。

疫情令極權國家變本加厲，上海封城說封便封，民主國家嘴巴批評極權，實際上也利用疫情玩弄民主，走向專制。日本政府在今年大半年發出「緊急事態宣言」，建議店舖晚上8時關門，食肆停止賣酒。自民黨在修憲提案上建議，當發生天災或戰爭，政府發出「緊急事態」，國民須服從政府指令。安倍死後，這項建議有可能放在提綱上。

阿古智子說疫情令不少學生在家太久，削弱新一代的溝通能力；政府為大眾「決定好」的風氣，亦會令大眾更失語。「COVID-19 這幾年，政策沒有好好討論。在民主社會，討論過程很重要的。現在不是。（國民驚覺）呀，（政府）已經決定了。呀，再問下去，（政策）有沒有根據？沒有溝通好就決定，有什麼意思呢？」

香港問題

不止是一條是非題

「現在習近平所指『一國兩制』，是表示保障言論自由……？」月一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任內第二次訪香港，日本電視台在時事節目中提出疑問。

席上阿古智子解說：「中國憲法也寫保障言論自由，但大前提是在共產黨管治下得到保障……香港的言論自由在『一國兩制』的『一國』下存在，因此本身是有限制，但不能說違反『一國兩制』。」

阿古的解說是「一國」下的自由，中國給香港多少便多少。事實上，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概念模糊。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港人聲音，北京在「港人治港」可以添上「愛國者治港」，建制派突然引入「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論述也可以，所有都在「一國」的大原則下決定。

主持聞言側頭暗示不理解，中日在憲法與「一國兩制」的理解上存異。

「那今日的香港，還有沒有言論自由？」主持直

接了當問。

「取締《蘋果日報》，香港再沒有言論自由」，阿古智子在大氣電波直接了當否定香港還有言論自由的說法。眾人點頭示意明白。這始終像「Yes or No」的懶人包，是較令人理解。

然而阿古說，事情的討論不應只停留在「是與不是」。「是與不是」之間也存不同面向的看法。反觀日本，她說在疫情和俄烏戰爭下，討論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窄，傳媒一面倒報道同一事情，網上言論兩極化，令身為教授的她有時感到發言的壓力，「雖然說日本有言論自由，但對於日本的學者也好，就是有一種不敢說的氣氛……我作為日本人，有些說話想說，但不敢說」。

專門研究中國公民社會，年輕時更在內地落地做研究的東京教授，原來也有不少事情是「不敢說」，這種「不容易站起來說話」的日本文化，阿古說多年來暗暗蠶食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她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說」，她還着記者放心，「現在我說的都可以說的，沒事」。



日本電視台節目截圖



2022 年新宿六四集會，有人手持寫道「償還國民人命」的標語。（劉言攝）

生一下子接受不了對祖國的批評，搖身一變成「小粉紅」，四處攻擊同胞不愛國。

阿古智子的學生曾在她的 Facebook 留言不滿老師批評中國，惹來日本網民攻擊她的學生是「小粉紅」，阿古對此表示心痛。「比較同情這些年輕人（留學生），他們不是沒有良知的。在中國不翻牆的話看不到其他（東西），這些人沒有辦法，因為都在這個環境長大，環境是很重要的。不是中國人壞，是環境造出來的……，我不想改變他們，他們要自己去改變，我們的悲哀是一樣的。」

阿古智子在香港認識居港的港日混血兒，他們都分成兩批人，一是支持反修例運動，另一邊是較為反對運動的「淺藍」一族。阿古智子認為有這樣的分歧，理由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在本地接受教育的日本少年有香港朋友，講廣東話，他們投入感很大；對運動厭惡的少年是讀國際學校的。」

中國田野研究生

阿古智子視中國為第二個母親，她曾在中國留學，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在香港大學讀博士，專修「比較教育學」，回國在東京大學當教授，多年來致力研究言論自由及教育環境。她說，年輕時言論自由的啟蒙不在日本，反而是中國、香港令她感受言論自由的可貴。如今面對日本國內對中國政權的猛烈批評，阿古念茲在茲，指言論自由建基於尊重，要保持理性。

「中國共產黨是有問題，但不能說中國是壞東西，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是壞人。這些事要『丁寧』（誠懇慎重）的討論，不能只說好與不好。」

她眼看「香港朋友」因《港區國安法》被拘捕，出獄無期；「中國朋友」因她批評中國的言論與她絕交；她的「中國學生」在網絡上因維護中國而遭受網上欺凌。世界不再一樣，她依然堅持和平理性討論。這種韌性，源於年輕時在中國做研究的歷練。

九十年代初阿古智子到中國留學，捲起衣袖落農村做田野訪問，了解當地社會，跟調查記者和維權律師合作，游走「紅線」之間。她眼見尊敬的調查記者「被邀約飲茶」，有些被關在牢中，有些維權人士親人受不了國安恫嚇而舉家流亡海外。阿古心痛，他們做的

一切也是為人民，但竟得到這樣的遭遇？阿古深刻發省，日本人自由在手，卻沒有好好實踐，「他們（記者、維權律師）敢寫敢說話，日本可以投票，但年輕人不要投票的，這是不可思議。」

留學時她遇上過一次「不被記錄」、「沒有發生」的選舉，令她畢生難忘。她沒想到簡單一次協會選舉，主事者也淪為階下囚。「一次（中國）歷史協會選代表，部分會員說在北京不如搞直接選舉，然後……就被抓了。」時值江澤民年代，風氣較為開放，惟選舉依然是禁忌。2012年的烏坎村事件更是一錘定音，令民選選舉舉步維艱。阿古眼巴巴看着優秀的傳媒、公民社會、維權律師的空間一步步被扼殺。

「起初上海（四月）封城，很多中國朋友傳來訊息，表示不滿，到現在，靜了。在現行的制度，中國人很難站起來說話……」阿古說，中國國內的「事實」很難被看見，更遑論不同角度的「真相」。少時留學歲月匆匆，廿年後她沒想到香港也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2020年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內地「禁言」現象正在向香港、澳門蔓延，而她亦從此再難回到她的第二故鄉——中國。

這幾年，內地出現很大變化，政權容不下公民記者、獨立記者的聲音，留學海外的中國年輕人由牆內走出牆外，突然接觸到六四屠城、反對習近平的論調，有感全世界也對中國敵視。一些留日的中國留學生對中國負面的事沉默不語，心中有數；另一些留學



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增上寺舉行簡單的葬禮，寺旁大批民眾獻花。（劉言攝）

這宗刺殺前首相的悲劇，實在令日本國民百感交雜，大家都清楚「統一教」的問題，他們洗腦式遊說教徒捐獻，舉行集體結婚等荒誕事。九十年代初曾有傳媒報道「統一教」的惡行，往後其醜聞卻不見天日。不少日本人心中有數，「統一教」在日本吸取信徒家財，供養韓國的宗教，日本警察、政客對此默不作聲，因為該宗教傳播的保守意識，所取得的選票，正是執政黨所需，日本的政治與宗教的權力早連在一起。

阿古智子作為言論自由的觀察者，深明日媒一開始默不作聲的原因：「宗教與政治人物關係密切，傳媒是由企業給錢的，之江江也要考慮自民黨，政府會施壓。但是，誰為無權者發聲？」暴力抬頭已成事實，阿古苦笑說，更殘酷的還在後面，「警察權力會提升，軍費也會增加」。

日本政壇披上「安倍的外衣」，吹風修憲勢在必行，現時執政黨加上支持修憲派的議席已足夠通過，惟最後還須過公投一關。7月10日參議院選舉沒有因為安倍效應拉高投票率，投票率僅52.05%，年輕人投票率依然低，令外界難以預測之後修憲公投的結果。事實上65歲以上人口已佔全日本28%，用公投決定修憲，

對最有機會參戰的新一代又是否公平？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阿古智子經常到香港現場採訪穿起黑衣的年輕人，問他們為何上街，仔細聆聽他們背後家庭撕裂的故事。在示威現場，阿古找到一名14歲中學生，還有在香港出生的日本少女，探問之下，各有故事。見到小孩們上街示威的景象，身為老師的阿古在《香港——何去何從》一書說「內心是五味雜陳」，她看到這座城市年輕人與有財有勢的人正各走一方，關係決裂至不能挽救的地步。

「2019年的社會運動，各人都參與了，跟中國做生意的、跟中國企業合作的，不太支持（運動）的……，居於香港的香港人，應該有權說話，政策過程中，沒有他們的聲音，勇武派用暴力去改變結構性的問題……。」

權力失衡，社會失去發聲的渠道，漸漸以暴力找出口，這個無力的循環亦正在日本上演。阿古智子像2019年在香港那樣探問她的東大學生，「『你要不要參與戰爭？』大家都說不想打仗，不想加軍費。誰可以想像要加入軍隊，與敵方打起來？」可是，最有可能上戰場的還是今日沉默的一代。日本的現況還是老人操控資源及票源，老人決定年輕人命運。

「安倍之死 誰是共犯」

阿古老師在日本努力筆耕，經常出席有關人權、言論自由的講座，發表對今日香港的看法。她曾在雜誌《世界》撰文，指香港是殖民制度留下來的悲劇，主權移交後香港繼承了英國殖民地的自由經濟，同樣也繼承了殖民惡法，才會令處於「冬眠期」的惡法被今日政權所用。主權移交後香港人仍然是不能作主。在她眼中香港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沒有解決，埋藏多年的問題、分歧一次過在2019年爆發。

這些悲劇看來也在日本上演，無權勢者沒有宣洩、發表意見的渠道，最後訴諸暴力令問題曝光。

她慨嘆，制度滋生暴力，我們只能無奈地看着事情發生。「用暴力去改變現況，這是不好的現象，但都發生了。」

安倍晉三於7月8日遇刺後，日本傳媒出現一種奇怪現象，兇徒被捕後自述動機，翌日只有自由派報紙《朝日新聞》以殺手因宗教仇恨槍殺安倍晉三為題，其他報紙在標題都沒有明言。第三天，傳媒陸續透露兇手山上徹也因仇恨一宗教而殺安倍，直至第四天傳媒才開始公開牽涉的宗教名字「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統一教）」，以及調查自民黨與「統一教」的關係。

安倍被殺的消息震撼全日本，當初民眾痛罵殺手，甚至有人怪罪網絡言論太自由，促成暴力事件云云。事件過了10天，民眾開始同情在安倍背後狠狠轟下兩槍的山上徹也。

山上徹也有一兄一妹，父親擁有一間建築公司，少時過着較富裕的中產生活。山上天資聰穎，成績卓越，可惜父親自殺早逝。父親死後，母親信奉「統一教」，不惜賣地傾家財一億日圓（約56萬港元）給予「統一教」，自此家道中落。據山上伯父憶述，母親時常往南韓朝聖，丟下子女在家不顧，山上的兄長自少患癌亦不幸有眼疾，成長後輕生離去。為了生計，山上05年加入海上自衛隊。05年山上徹也亦一度尋死，想到還要照顧家人才打消念頭。各大媒體一度傳出山上徹也的Twitter提及，對自己的母親又愛又恨……

去年（2021年）9月，山上徹也在網上看到前首相安倍晉三在「統一教」的宣傳影像，於是計劃下手刺殺。傳媒其後抽出與「統一教」有關係的自民黨議員，其關係追溯至安倍的祖父岸信介，指自民黨利用「統一教」確保票源。

「統一教」脅迫信徒捐贈並不是今天發生的事，協助信徒的律師團隊「全國靈感商法對策律師聯絡會」（下稱：律師聯絡會）早於1987年成立，「律師聯絡會」指該教會近5年吸金54億日圓（約2.64億港元）。涉及「統一教」的民事訴訟從來沒有停止，民眾在網上怒吼：為何傳媒一開始不公布宗教的名字？為何不報道「統一教」的訴訟案件？

教導兒子這段歷史。

阿古智子遂就拆「監獄之門」一事，向校長倡議學校上下應該先學習這段歷史，怎料校長極力反對：「這樣會削弱中立性」，阿古反駁校長：「當年被關的左派、右派、偏保守派也在裡頭：如果我們不認識歷史，怎樣討論歷史？」

只是在家長會中，像阿古那樣支持先認識、後商討清拆者，還是少數。話語權都落在大聲的一方，沉默的一群也被代表了。「其中一位（家長）是自民黨委員的秘書，她說話很大聲。周圍的家長說：『這個人說話很大聲，我不想跟這個人談』。在日本大聲說話的人就是有影響力，結果人人不敢說話……」阿古智子是國內的中國專家，但在兒子的小學，她的聲音也被不同聲線蓋住，無形的壓力懸浮在空氣中，令人透不過氣。

研究了廿多年中國的阿古智子冷不防道出一個見解：「日本人是很乖的，中國人不會這樣乖，哈哈！日本人是服從權威的，很容易被洗腦。」

阿古說日本社會往後退，失去多元思想，這源於教育出現問題，七十年代歷史老師教他們「日本跟中國打過仗，對中國人民很不好意思，要說抱歉」；往後老師灌輸的思想形態已跟以前不一樣，老師說「不應該一味道歉，日本應該有自信，不要只看歷史的負面」。然而無論是哪種方法，都是一種觀點灌輸，而非讓學生思考。阿古智子慨嘆，在校園滋長不求甚解、只信權威的思想，令社會趨向單一化，失去消化複雜事情的能力。

1997年阿古智子在香港大學修「比較教育學」，她的師父是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首席教授程介明，程介明對她循循善誘，教導她教育不是倒模機器，必須讓學生有獨立思考。

阿古智子特別讚嘆香港教育的開放性，比如2020年歷史科考題為「1900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法？」，阿古智子說這些需要思考論證的題目，換轉在日本，已是大學級別的題目，這種開放性讓香港年輕一代比其他東亞國家的年輕人相對有獨立思維。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之後，舉國歌頌安倍的功績。東大教授阿古智子叮囑在亂世要特別保持理性，小心過濾訊息。（劉言攝）

「暴力的漩渦」

疫情期間，日本近乎每個月都出現「無差別傷人事件」，一次更出現在阿古智子教書的地方——東京大學。今年一月東大舉行入學試，一名17歲的名古屋男生在東大門外用刀刺傷三人。少年供稱想考入東大理科，可惜成績未如理想，原本想自盡了結生命，但他選擇殺人洩憤。去年日本的車廂同樣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這些新聞的頻密程度，已令日本人漸漸麻木。

社會上暴力事件不絕，受害者由醫生、學生，演變到前首相安倍晉三，這些事件盡見社會已病入膏肓。致力研究中國人權問題阿古智子提醒我們，日本「自我維穩」的問題入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風潮過後，國民轉趨主張和平，社會展現的是一種「表面的和平」，這種偽善的和平主義令很多國民失去了「站起來說話」的勇氣，令問題不斷惡化至不能挽救的地步。

阿古智子續指，「逃避主義」、「去政治化」、「權威人格」等意識形態已植根在日本人腦袋，她比較中國與日本的維穩手段，兩國的差別很大，日本是「國民自我維穩，不用靠警察的」，今次刺殺安倍事件將日本結構性問題浮上面，民眾終於在網上鼓起勇氣質問主流媒體：為何不公開「統一教」？

阿古智子語重深長分析，日本國內由來已久的保守主義與網絡的個人主義已發生衝突，「保守派是主張傳統的價值觀，家庭觀念，缺乏多樣性；但社會上已走向個人化，你看殺安倍的兇手活在社交媒體世界，不跟外界交流也可以做很多東西」，這衝突是不能避免，而且會愈演愈烈。

「不容討論的「監獄之門」」

《香港「何去何從」一書，記錄兩岸三地言論自由的情況，阿古智子對日本的批評亦不留情，她先從自己的生活說起。書中記載了她孩子學校附近的「黑暗遺產（Dark Heritage）」（與戰爭、暴力事件有關的歷史遺址或文物）。

她的兒子在中野的和平之森小學讀書，為遷校作準備，校方邀請家長教師會、歷史研究者和當地居民商討應否拆除「監獄之門」。「監獄之門」原址是豐多摩監獄，建於1915年。該建築物代表着戰前悠長的思想監控史。據《香港「何去何從」，阿古智子寫道：「二戰前、二戰期間，無產階級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文學評論家龜井勝一郎、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宗教家戶田城聖等多名政治犯、思想犯被關押在豐多摩監獄」。戰後，該建築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徵用為「美陸軍刑務所」，及後改建成「中野刑務所」，於1983年停用。小學家長教師會討論拆門之事，才「發現」它的歷史。

「監獄之門」象徵了百年前軍國政權如何壓制思想家的歷史。歷史近在咫尺，作為當區老街坊的阿古智子靦腆真誠說對此竟一無所知，實在慚愧。

阿古智子的兒子對「監獄之門」的理解是「以前反對戰爭的人們會被抓進這裡」。阿古聞言笑了，對這個敢言、經常與班主任吵架的兒子說：「事情也沒有那麼單純啦。阿古說大人們口口聲聲說「學校建設要以孩子為第一考量」，但對於有關「監獄之門」的認識和討論，孩子們往往被摒出門外，所以作為母親還是先了解，慢慢



(劉言攝)

當時香港呼吸每一口空氣，也是自由。也許天真，阿古沒料到香港三年間變成這樣陌生的模樣。

「想不想回香港一趟？」

「想。」阿古智子沒有多說其他，低着頭沿道玄坂斜路一條氣走上去，準備看一齣在香港不能放映的《憂鬱之島》。■

「回家之路」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阿古智子不時忍痛跟朋友說，《國安法》後香港教育出現骨牌式效應，阿古讚嘆不已的通識科遭「殺科」，換上灌輸愛國教育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香港人的價值不免「被動搖」，香港人的身分也會「被抹去」……

對於香港局勢，阿古智子非常關心，看到《明報》一則新聞講述中學圖書館有200本書下架，她直言心痛，「老師也要替學生『選書』，實在太糟糕了」。書本是知識泉源，傳媒是言論自由之母，阿古智子看到香港自由不斷被摧毀，她說現在可以做的是，愛護僅存的言論自由環境，理由很簡單，因為人總要說話的。

「人跟動物哪裡不一樣，就是我們有文字，有很多話要說出來。言論的活動非常重要，我們沒有言論就不是人，難道我們放棄做人嗎？」阿古智子皺眉苦笑。

阿古智子於九七前後在香港居住，她笑言居住香港三年，廣東話怎樣學也講不好，但在社區總能夠與街坊溝通，這實在是不可思議又可愛的事，她說怪不得日本女生都愛香港，愛它的異國風情，享受不能事事都要講「敬語」的自由。

2022年參議院選舉，投票率僅52.05%，年輕人的投票率依然是低。（劉言攝）



今年3月，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 HEPI）發表一份題為《了解中國：英國學校與大學的普通話及中國知識教學概況（Understanding China: The study of China and Mandarin in UK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的報告。報告作者 Michael Natzler 訪問了超過四十名業界相關人士。他告訴《如水》，訪問中類似 Phil Entwistle 的故事亦時有所聞。

「中國政權很壞所以不要研究它」——這種想法確實不罕見。不少人會有種印象，覺得投身「中國研究」多少暗示某種「親中」傾向。而這印象也不是全無道理。首先，研究一個地方或多或少暗示你對那個地方感興趣；其次，要研究中國往往需要和中國政府打交道，這重關係可能反映研究員與中共關係良好；再者，中共官方論述一直很支持外國人（以中共認可的角度）「認識」中國。當 Natzler 發表的報告提到英國的中國研究發展不理想，令英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未能應付時代需要，中國官媒《環球時報》隨即發表一篇題為〈英國報告：我們對中國的認知竟然是這樣的！〉的文章，引用該報告大談英國該增加對華理解。投身中國研究不就正中北京下懷？

然而直接將「中國研究」等同「親中（共）」顯然是錯誤的。以英國為例，對中國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近5個世紀前，那時候別說毛澤東，連馬克思都未出世。西方的中國研究課程不會找到像中國大學那種歌頌共產黨的政治課，也沒有香港高等教育新興的國安法課程。以英國劍橋大學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學士課程為

例，四年課程首年專攻中文，第二年主要涉及中國歷史和全球化等，第三年會在中國留學（北京大學或中國海洋大學），第四年則教授中國藝術、視覺文化和語言學等。

上述是就學士而言，至於真正做研究的研究生、學者，選取的題目則包羅萬象，從四書五經到東風導彈無所不包。儘管如此，打正旗號懷有政治目的歌頌中國的論文也是少之又少，若不是沒有話。

到底西方是怎樣研究中國的？學術界是抱持怎樣的理念從事「中國研究」？也許對香港讀者來說，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應如何看待中國研究、尤其是它與香港的關係？今期《如水》專題將以英國為例，透過文獻回顧、學者和學生訪問，嘗試解答這些疑問。只選擇英國作討論對象，是因為每個地區的中國研究都稍有不同。基於其帝國主義歷史，英國在西方諸國中，中國研究歷史相對悠久。許多世界最優秀的中國研究相關期刊也在這個國家出版，包括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The China Quarterly*，以及 *Modern Asian Studies*。

雖然只是論英國，但讀者仍可憑本文窺見西方中國研究的面貌。然後，你可以選擇支持 Phil Entwistle，或他那對中國研究深痛惡絕的愛爾蘭同事。



報道／長篇【英國】

「為甚麼你要研究這可怕的政權？」「中國研究」在英國

文／卡卡

88 後學者

2020 年，《經濟學人》曾經有過一篇文章提到一個小故事：從事中國研究的英國人 Phil Entwistle 博士畢業後受聘於一家愛爾蘭大學，創辦中國研究課程。教授內容包括中國政治、歐中關係，文化和宗教等。教學範疇並無特別，大多地方研究（Area Studies）的題目都是這些，但就因為那是「中國」研究，Entwistle 的許多同事都對他表示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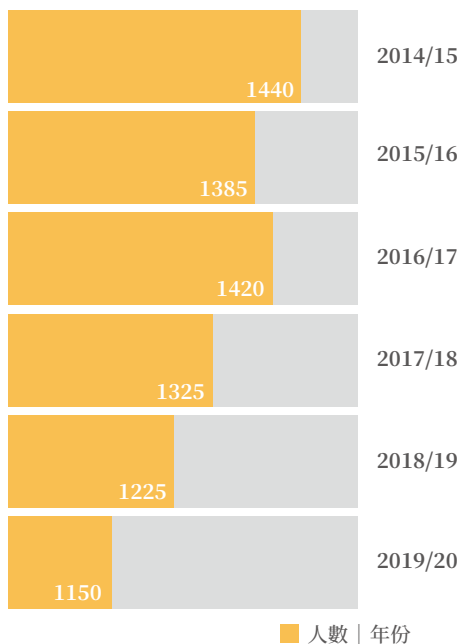
「他們問，『為甚麼你要研究這可怕的政權？你看看那裡正在發生甚麼事，我們可不想與中國有任何瓜葛。』」

三年後，Phil Entwistle 去了做獵頭公司。

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興趣。1978年以降中國改革開放亦令西方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市場。無論各地，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往往會帶動學術界的研究興趣。這除了是因為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的曝光率增加外，亦出於客觀原因：商機處處令社會對「中國通」的需求增加。嶄新的政經氣象令英國的中國研究再度起航。

中國研究一直發展。直至近年，在英國地位舉足輕重的英國漢學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ACS）調查才顯示，2017年以來英國大學修讀中國研究的學生逐年減少。類似現象在澳洲與美國等地方亦有發生。

表：英國 HESA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中國研究學生人數 2014-20



為甚麼會下跌？原因之一是習近平 2012 年上台後，中國再次變得封閉。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 (Minkin Pei) 曾稱現在是「毛時代結束以來最困難」的時刻。西方學者在中國比以前更難取得簽證、安排訪問、查閱資料庫。2018 年一項調查顯示，過去 10 年三分之一受訪的西方及香港中國研究學者曾被拒進入中國或閱覽其檔案庫。接近十分之一指他們曾被邀「喝茶」。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坦言，許多學者都勸他們的博士生最好避免研究中國。

此外，孔子學院風評不佳亦有關係。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今年 3 月發表的報告指，現時全英國共有 29 家孔子學院。學術研究需要龐大資金，但當這些資金是來自孔子學院，學者難免要受政治干預，外界對其研究成果印象亦會大打折扣。一名現在從事中國研究的學生就對《如水》說：「孔子學院的 PR (公關) 做得太差，大家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很多本來可能對它較友好的人都不想與它有瓜葛。打從一開始，這件事已被學術界唾棄。」除學者外，學生亦會因孔子學院的形象考慮，避免在該處學習中文。

第三個原因則是整體社會對中國的反感。「有關一個地方的學術研究要健康發展，其中一項要素就是國民對那個地方的印象要好。我認為這也是中國研究面對的問題。」Nazler 說。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最新調查顯示，在英國，多達 69% 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印象，持正面印象的只有 27%。在這樣的氣氛下，別說學術，還能令英國人印象稍佳的「中國」事物，可能就只有中餐。

在這樣的環境下，仍在英國從事中國研究的人，到底在想甚麼？

英國與中國的最早接觸可追溯至16、17世紀。原因除了許多人早已熟悉的傳教士來華，海外華僑也扮演重要角色。這是因為西方國家的亞洲殖民在東南亞諸國要比中國早許多，故當時與西方國家有較多交流的「中國人」，不少是東南亞華僑——「中國研究」與地理上被稱為中國的地方，關係其實可以很疏離。

1815年至1823年間，由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於澳門出版的《華英字典》（*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是世界首部英漢—漢英對照字典。這部字典可說正式打開英國的中國研究大門，畢竟對不諳中文者而言，中文就是研究中國的最大難關。

當時英國人之所以研究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實際需要：不是為傳教就是為做生意，要不就是跟中國官員打交道。隨著兩國交流漸頻（或說大英帝國主義擴張），1837年，也就是鴉片戰爭開打的前兩年，倫敦學院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聘請Samuel Kidd（1799-1843）擔任英國史上首個大學中文教授。其後，倫敦國王學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亦先後成立中文系。這些變化都是發生在1900年以前，因此可以說18世紀尤其是中後期，是英國的中國研究萌芽期。

英國的中國研究其後發展仍然務實。20世紀前半的戰爭令英國需要大量通曉中文的人才，政府回頭一望才驚覺國內老師短缺，決定進一步推動中國研究發展，亦因此培育了不少漢學家，為其後這領域的發展打下基礎。

1960年代以降，地方研究在學術界日益流行。這類型研究（較多被稱為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側重社會科學及跨學術領域的方法，以當代中國（其時正值文革前後）社會、經濟與政治為主題，以區別於以語言、文本與歷史的傳統中國研究（較多被稱為Sinology）。

與此同時，英國的中國研究卻開始失卻動力，原因有三。首先，功利思維仍然主導中國研究命運，而這一次效果是負面的。戰後，英國對中文翻譯的需求明顯減少。國共內戰以及中共於1949年建國，屬資本主義陣營的英國難與華建立學術與商業關係；台灣其在國際間影響力微；香港則在學術上剛起步（中文大學也是到1963年方成立），英國鮮有利益誘因推動中國研究。

其二，文化大革命等連串政治事件令西方學者難以進入中國調查，中共對知識分子與言論自由的打壓亦令文獻銳減。西方學者就連寫信給中國同行，都有可能會害收信人遭算帳。無法知曉中國內部情況，加大西方學者研究難度。

其三，冷戰時期社會政治立場壁壘分明，學術界亦受影響，不少人將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與推崇毛主義扣連起來，對毛澤東趨之若鶩；而弱弱提出文革中國真實景況的學者則不時被扣保守、親資本家的帽子。政治先行的意識形態，令嚴肅學術發展難以推行。

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結束。中國國內狀況改善，上述負面因素褪色。資訊日漸流通，更多英國人可以透過電視接觸到中國，提高



2022年亞非學院畢業典禮。(卡卡攝)

父親比長短；其母家族則曾參與印度殖民統治。「如果我想令自己不用承受殖民罪疚，那就得往更東的地方去。」加上他總是念念不忘以前居住的城市碧仙桃（Bristol）那家藝廊，收藏許多宋青花瓷——「中國研究」就是這樣選出來的。

Barrett 在劍橋大學修讀中國研究。1971年畢業，其時中國正值文革，外國人幾乎不可能前往考察，台灣的學術環境亦不理想，結果 Barrett 去了當時能有效研究中國而又最近中國的地方——日本。

作為東亞國家一員，日本與中國關係非比尋常。

「其實劍橋的中文課程就是在日本學生要求下成立的。因為以前在劍橋，所有畢業生都須要學拉丁文。日本學生就說：拉丁文不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拉丁文』是中文。我們可以考中文嗎？」

1978年，Barrett 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佛教研究博士學位，在劍橋任教至1986年後，於1994年轉職到 SOAS，直至退休。

投身中國研究超過半世紀，Barrett 對英國的中國研究印象也是功利先行，上至政府，下至學生，都是一樣。他直指社會上有好些人研究中國，目的只為賺錢，或做個「業餘中國人」，「食中餐、學太極，也許還來一點書法。祝他們好運。」

Barrett 提到，Natzler 撰寫的報告。報告中有一個表格，羅列2017年以來英國不同團體認為應該加深對中國認識的原因。英國



2022年7月末的一天，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畢業典禮的日子。鳥雀呼晴的午後，白髮蒼蒼的Timothy Barrett教授徐徐步入校園。到處都有老師與學生拍照，但不久前才自武漢肺炎康復過來的Barrett教授返回SOAS，僅是為接受《如水》訪問，而非慶賀門生畢業。

畢竟他已八年沒有任教。從事中國研究的他是SOAS名譽退休教授。1960年代開始已投身中國研究，可謂英國中國研究歷史的見證人。當然60年代前的日子他無法親身體會，但其著作*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1989）還是談到了許多當時英國中國研究的史事，此書到今天仍被視為英國中國研究史的經典。

Barrett對中國的興趣可追溯至中學時代。當時接受傳統英式教育的他在校要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教育，對他而言卻是「不道德」。

「儘管我學習有關歐洲的一切，對世界其他地方卻沒半點理解。」他說。「過去50年，基本上我所做的就是彌補自身教育的紕漏。」

在這邏輯下，他也可以研究非洲、中東以至東南亞。然而Barrett卻選擇了中國。箇中原因他自言是「巧合」：因他父親是在埃及長大，說得一口流利阿拉伯語，Barrett不願自己的學術生涯要與



SOAS 名譽退休教授 Timothy Barrett 認為「中國」有許多意思，無法視之為一個界線分明的實體。（卡卡攝）

這種對中國的理解，令人聯想到近年「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討論。中共不斷呼喊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而批評者則指責說，根本就沒有所謂「自古以來」的中國，遑論領土。

訪問中，Barrett 亦運用其中國歷史知識，如數家珍地解釋「中國」不是一個自有永有的整體。比如中國北方就曾多次被不自稱「中國人」的民族如契丹統治。就連「中國」這個字，古時也不是今日「中國」的意思。Barrett 曾在明朝典籍讀到這個詞語，但它是用來形容明帝國與西藏的關係，而非將之視為自己國家的稱號……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語出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采）。有關『中國』的問題，到今日仍然存在。問題是，你要如何運用這些知識？」

此外 Barrett 亦提到中國研究對港人流散社群的實際作用。2021 年，BNO「5+1」移民途徑正式開放申請，英國的港人社群急速擴大，Barrett 認為中國研究由此會變得日益重要。他提出的例子是其女兒的

親身經歷：Barrett 的女兒是勞工法律師，一次她要代表一個信奉道教（或最少類似於道教的民間宗教）的男子上庭。這名男子在英國某公司上班，有日老闆交給他一項差事，但這男子基於道教原則，擔心按老闆指示做會「昇天收」，因而拒絕遵從，雙方不歡而散，鬧上法庭。英國法例有保障這類因宗教理由而無法進行某種工作的人，然而，由於法庭對道教陌生，辯護過程困難重重。

「就因為你在大學不會學到關於道教的知識。」Barrett 說。他指，BNO 赴英的港人中，雖然有不少是基督徒，但也會有道教徒和佛教徒。若英國社會對這類文化缺乏了解，長遠而言可為港人融入英國帶來負面影響。

文化協會認為民眾通曉中文對「英國脫歐後的戰略利益」有利，皇家國防安全聯合軍種研究所認為認識中國能令英國更能區別中國的「合法影響」與「非法干預」，英國外交政策組指加強關注中國語言、社會等，有助建立可持續的英中關係……

「翻閱整份 Natzler Report，你能否找到一些說法，認為中國值得研究，因為她是造紙術、活字印刷與火藥的發源地？」Barrett 指 Natzler 的報告某程度上是有缺憾的 (Flawed in a way)，因為它過於強調市場，「卻沒有人想過，亞洲研究，當然包括中國研究，應當作為一種學術興趣 (Intellectual Interest) 存在。」(Natzler 回應指，他亦認同中國研究可做為一種學術興趣，只是他指，比起學術興趣，現實性問題如英國國家安全，更能引起執政者的關注)。

Barrett 認為，包括他自身在內，仍有不少中國研究學者是將中國看做「一整個文明」去學習。

「她擁有許多紀錄，可追溯至許多個世紀，能夠給你截然不同的人類經驗，讓你能夠反照自身」。

可以預料，由這種角度看待中國會引來質疑。首先，今日的中國到底與那「一整個文明」的中國，還有多大關係？其次，那「一整個文明」的中國真的對我們當下的生活還有意義嗎？

這些質疑讓 Barrett 想起文革。雖然這段日子的思潮連鄧小平後來都批評為「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但或許它也令西方人不

自覺接受了中共一套說法，即那應破的「四舊」，包括孔孟、老莊、朱熹、王陽明等學說，以至中國民間婚喪風俗，都是「腐朽的、反動的」，不應該與共產黨新中國相提並論。新中國只與馬克思主義有關，要研究今日中國，也只能從馬克思的框架去做。

Barrett 形容這思想在學術上是「侷限的 (limiting)」。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知識論的問題。中國的那套馬克思主義……總是假設他們知道甚麼是『正確』。……中國政府的失敗也在於此，他們總是覺得要教導人民何謂正確。」

而事實是，研究中國可以有許多方法和觀點，不必假設只有今日的中國，或中共，才值得研究。即便是「中國研究」的「中國」，已經有萬千種意思。古典的「中國」肯定不是指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這個國家於 2019 年才剛慶祝成立七十週年。Barrett 認為，重要的不是爭辯「中國」到底是甚麼定義，因為其定義不可能只有一個；重要的是，自由。學術自由。

「關鍵在於，不要認為任何中國，無論是文獻描述的中國，或文化上的中國，都可以被一刀切為一個明確的實體。」

如果有學生問 Barrett 從事的「中國研究」，到底是哪個「中國」呢？

「我會說，中國就是你讀中文時看見的那個中國。」



亞非學院的書店售賣中國藝術卡片。(卡卡攝)

只是這條路，香港研究不容易參考。這除了因為台灣研究比香港研究早起步外，也涉及實際的問題：錢。

「多錢就可以做更多研究。」阿泰說。「台灣政府一直投放許多資源推動台灣研究以作為她的軟實力，讓世界透過學術認識台灣。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台灣民主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等，都放了許多錢支持世界各地的學校建立台灣課程、辦台灣活動。我認為這是台灣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是香港為何難以照辦煮碗就昭然若揭：礙於政治問題，你很難期望香港教育局、「外交部」，以至某個「香港民主基金會」，會推動國際上的香港研究發展（而不是用類似於孔子學院的模式）。

如果說香港研究有甚麼需要向台灣研究學習，那可能是，學習如何利用中國研究作為跳板。阿泰指，儘管台灣研究已頗成熟，仍有許多學者認為台灣研究不必完全脫離中國研究。

「因為你要吸引新學生……而對很多人而言，學中文的主要地方仍然是中國研究學科。」而與台灣同樣，就算政治上是否認同香港是個獨立的地方，事實是對許多西方人來說，了解香港之前無疑先會認識中國。

「大環境始終是關心中國的人比關心香港多很多，如果把香港列入China Studies 能夠令更多人認識香港，或者令香港研究接觸到更多人，我不介意。」■



問題：若真從香港人為本位出發，為何不直接做香港研究，而要講中國？

學者 Guldana Salimjan 去年曾在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發表博客，談到中國研究學者可能會不自覺在其學術領域形成某種核心，同時將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邊緣化。同理，當香港只能作為一個小組討論（Panel discussion）議題存在於中國研究學術會議，會否在意識形態上形成一種層級架構，變相默認香港為中國一個次要的部分？

港人阿泰（化名）現於英國某中國研究相關學院修讀博士學位，其畢業論文題目涉及香港、台灣與中國三地。他亦有在校內任教部份課程。阿泰指，「香港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注目程度偏低。雖然這領域已有一些相關學會，例如 Hong Kong Studies Association 和香港學會（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但整體參與人數仍然較少。此外，獨立的香港研究課程在英國也是絕無僅有。

「這些課程很重要，因為吸收新學生對一個學術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是關鍵。」

就算 2019 年的抗爭確實為香港增加不少曝光率，但學術上的助力始終有限。

「對香港人來說，香港當然很重要；但始終都要接受一個事實，就是世界上很多觀眾眼中，香港可能只是一個 specific case。你很難說服他們為甚麼一定要了解香港。」

在學術界尤其是地方研究，一項研究的價值某程度上與其普遍性（Universality）有關。固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不同地方發生的事各有不同（Specificity），但研究員仍須找出個別案例能與其他個案對話的元素，否則便難向其他人證明其研究的意義。從殖民時代、主權移交、一國兩制到今日的國安法，香港的經歷是非常特殊的，正是這種特殊性，讓其他地區較難向香港借鏡，令香港研究因難以在學術界發展。

類似的例子是台灣。有趣的是，如今台灣研究比香港研究蓬勃得多。雖然半世紀前台灣研究基本上是聞所未聞，有關台灣的研究也僅隸屬中國研究，但從九十年代開始，研究台灣的學者開始增加。2018 年，學術界出現第一份台灣研究的國際性跨領域同儕審查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現在世界各地不少中國研究學院亦有專門探討台灣的内容。



周豎峰及多名一直對當地港人社群有觀察的媒體人及學者，都認為隨中國近年的倒退，信奉「民主中國」的大中華路線將會消失；現時亦是讓「民智剛開」的香港人，學習包容不同觀點及價值的機會。

「六四集會」「香港化」

今年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六四集會現場，不少參加者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光時旗）（另有少數「香港獨立」、港英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等）出席，而且沒有多少人會唱傳統民運歌曲《自由花》或《民主會戰勝歸來》，但當大會在集會尾聲準備唱《願榮光歸香港》時，不少本來坐在草地上的參加者紛紛起立配合。

此外，在集會舉辦地點，在多倫多大學學生會大樓的六四紀念碑外，兩座花圈上的挽聯分別獻給「六四英魂」及「時代革命英魂」。附近亦有人放置了周梓樂及陳彥霖的肖像。

將六四紀念活動與時代革命連結，並不只是單一城市的現象。在加國另一邊的溫哥華，情況相似，而且香港元素亦佔了主要部份。

「等我哋一齊默哀」分鐘，去哀悼33年前6月4日天安門廣場被殺的學生及死難者，以及過去兩年，在香港被逼害，殘殺及被謀殺的手足。」由溫支聯在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領事館外舉辦的燭光晚會上，主持在默哀前作上述呼籲。

而在「毋忘六四」的橫額前，除了民主女神像、手持光時旗的香港



報道／長篇【加拿大】

當溫支聯放棄「建設民主中國」之後 新一波移民潮下，溫哥華港人的繼續抗爭

文／冬甩

陷入中度思緒情緒的普通香港人。

在我們認識的香港，支聯會、維園六四晚會等等，可算是「大中華膠」的代名詞。

但當支聯會及維園六四晚會都成為歷史，仍然相信中國會有一天邁向民主、自由的「大中華膠」及他們相信的大中華路線還存在嗎？在太平洋彼岸的溫哥華，或者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今年由溫支聯舉辦的六四集會，出席人數創新高。

不過，正如首次參加集會的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豎峰所言，香港的抗爭口號、旗幟已成這個原「大中華膠」活動的主流。他直言集會者已經發生質變。

溫支聯主席李美寶受訪時亦指，他們早已放棄「建設民主中國」；隨香港狀況惡化，19年後都相當積極組織聲援香港抗爭活動。

而在新一波移民潮下，有帶著香港抗爭記憶的新移民亦在溫哥華成立新組織「溫哥華手足」，希望與溫支聯各有各做。

在「毋忘六四」橫額前，放有周梓樂及陳彥霖肖像及一個抗爭的標語。（溫支聯提供）





抗爭者像，也同多倫多一樣放了周梓樂及陳彥霖的肖像。

參加集會的約3000名示威者，除了揮動加拿大國旗，不少亦揚起光時旗。獲溫支聯邀請發言的人士當中，除了一直關注香港抗爭的加國國會議員關慧貞，亦有被視為本土派的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

而溫支聯主席李美寶，在集會最後一段發言，更呼籲參加者除了六四事件以外，亦要記住其他香港抗爭的關鍵日子。

「香港維園的燭光已經不能再現，我們身處溫哥華的香港人，要更加堅持將維園燭光承傳落去，維園燭光承傳去到世界每個角落，一起發光發亮。人民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要促請大家要記住八九六四、六二、七二、八三。同埋香港人，你哋去到邊度，個度就係香港，香港人！（群眾回應：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然後，現場有人高喊數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

今年是周豎峰首次參加在溫哥華舉行的六四集會。

「我好驚訝現場很多人明目張膽地揚起光時旗、港獨旗，而主辦的溫支聯視這些情況十分平常，好像已是默許了一樣。」

他在現場感覺到，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同「香港獨立」口號的聲浪，也遠遠超過「平反六四」的聲浪，「雖然難以量化，但我感覺聲浪或高出一倍。」他也發現，即使有個別人士叫出「建設民主中國」口號，亦無人「應機」。而大會邀請馮敬恩發言，亦令他感十分意外。

「好驚訝的原因，除了是溫支聯（對本土派、港獨口號、旗幟等）的包容程度，亦發現到參加者本身已有質變，好似所有人都換了立場一樣。」



「建設民主中國」不再是目標

「我們叫溫支聯，不少人誤解我們與香港支聯會有關係，或者是姐妹團體。但我強調溫支聯不是香港支聯會的一部分，我們沒有任何關係，是兩個獨立團體，在我們組織全名『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甚至無中國兩字在內。」李美寶介紹說。

「我們起初是在六四事件後，由溫哥華的社區人士組成，大部份都是香港移民，當時本來覺得中國有希望成為民主國家，但這個希望卻粉碎了，看到這麼多學生、市民無辜送命，無緣無故犧牲，所以當時我們希望做一點事情，就組織了溫支聯。」

與香港支聯會的關係，或者僅在組織創立時存在，「當時曾邀請過司徒華、李柱銘及一些學者來加，進行一些籌款活動，籌到一些經費及在卑詩大學內設置了民主女神像。」

她表示，起初成立組織時，目標大致與其他民運組織一樣，是平反六四，並為不公義的事發聲，例如為死難者取公道，及繼續支持天安門母親等。

但隨時間過去，「時至今日，『建設民主中國』已經不再在我們的使命內，我們的目標已經改變了」。她說。



在多倫多的六四集會，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及香港獨立旗十分普遍。（冬甩攝）

「長安街至彌敦道」

在接受《如水》訪問時，溫支聯主席李美寶主動說起：「有些人會說，我們是否騎劫了『六四』，我覺得不是，我們的宗旨都是倡議民主、自由，為不能發聲者出聲，我們的宗旨沒有改變。在六四集會中，一半是紀念六四，一半是紀念香港的事。」

加拿大六四紀念活動將1989年連結2019年的轉向，早於2020年開始。

受疫情影響，當年由溫支聯，多倫多民運會合辦的加國紀念活動改在網上進行，活動的主題直接寫上「血腥鎮壓從長安街伸向彌敦道」，活動宣傳海報，亦配上香港抗爭者及天安門的組合圖片。

「加入香港元素，因為我們覺得，香港在19年發生的事，就是六四20。（八九民運）是一班大學生，希望爭取反貪污、反腐敗、民主及言論自由等。2019年的香港亦大致一樣，都同樣由年青人領頭，但被（政權）打壓，很多人受傷、自殺、甚至懂得游水都會淹死……所以我們都會悼念2019年犧牲的香港市民。」



2014年溫支聯舉辦的支持香港民間普選方案公投汽車遊行。(溫支聯提供)

他同意龍的看法，指香港在2014年後有關六四集會的爭論及在雨傘革命後的社運低潮，亦影響到海外的集會。「開始會有人覺得集會好膠，不知為何仍要去悼念。但在19年後，隨六四集會被禁，香港手足重新將意義灌注進去。」

他指出，有不少現時參與六四集會的人，不再因為是「大中華膠」而參加，而是感覺香港的六四集會被禁後，本身理所當然可以做的事被人剝奪了，故在海外仍可參與時積極出席，從而將集會加上一層香港抗爭意義。他認為現在溫支聯的做法，是「老牌組織在慢慢調整，嘗試吸納新人的聲音」。

但他憂慮，將悼念六四連結2019的香港抗爭，「是將兩樣不能融合的東西，勉強放在同一個集會發生」。他認為此情況下，這個模式不能持續。

「現時的集會模式是一個困境，好像不太知道自已的主題同框架，只是回應當下大家面對的政治打壓。」

「問題是如果太偏向香港，其他如來自中國的參加者會感到有距離，但如回復過去較強烈的『大中華意識』，亦會令香港的手足不滿。」

周豎峰就覺得，如果組織者不去改變，就會被淘汰。「作為政治組織需要貼近群眾，故大趨勢將會是遠離大中華路線。」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其實同香港的政治轉向相約，在2014年前後出現。

「2014年香港環境開始改變時，我們的想法亦開始改變，但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政治犯，仍然是我們的使命。」她補充：「2014年雨傘運動前，我們的目標集中於中國，例如劉曉波被捕及判刑。我們針對此事件，發起活動讓加拿大國會議員了解事件，就此發聲。但我們的成員大部份都是香港移民，我們的心仍然是香港心，在香港長大，都仍然非常關注香港，因此當時就發起活動爭取普選。」

查看溫支聯的Facebook，於2014年6月，他們發起了汽車遊行，支持香港民間發起的普選方案公投。

而19年6月9日，他們亦在溫哥華發起當日的全球聲援行動，並在其後多次舉辦活動支持香港抗爭。「2019年之後，香港情況更壞，故我們更積極為香港發聲，很多活動因而都是圍繞香港而舉行。」李說。

改變反映香港身分認同崛起

在2019年6月初，當時移居溫哥華2年，曾從事媒體工作的龍華琛，在關鍵評論網發表《在溫哥華，中國誓必成為最終贏家》一文。

文中他指出，當時溫支聯的活動中看不到有任何年青人的參與，即使他接觸到的年青中國移民知道六四事件，也無甚感覺。「：這些中國青年卻寧可用支付寶，在百度、微信圈裡自成一國。」他在文中指。

因此他作出了一個悲觀預測：「無論國外國內，中國還是香港人，對六四的堅持，可能就只剩下幾十年前曾經熱血的一代人，只要他們老去，沒有人再願意談，共產黨在這場鎮壓中成為最終贏家。」

3年後，他接受《如水》訪問時，仍然保留較悲觀的看法，對溫支聯是否可以持續地舉辦六四集會有所懷疑。「他們都知道這句（建設民主中國綱領）不合時宜，放棄了是wise move，但問題是好難『洗底』，有一些特徵是入血的。例如米高佐敦有段時間轉打高爾夫球，但你只記得他是籃球員。」

對於溫支聯改變的原因，他指出自從2012年國民教育運動後，香港人對香港身分認同意識增強，這股思潮亦影響了海外，「我知道，他們內部都知道過去的集會模式不合時宜，都有（轉型的）壓力……」

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系博士生Kennedy正以流散香港人為研究主題，與多名溫哥華港人進行訪談。他指出一直以來，溫哥華的六四集會不是單純紀念事件，而有將香港政治抗爭投射進去的情況。「李立峯亦有一個研究，結論是香港六四集會已演變成香港人的活動，本土意識已將其本土化。」

移民潮下的後來者：溫哥華手足

龍華琛今年沒有出席六四集會，但就去了由今年新成立的港人組織「溫哥華手足」首次舉辦的六一二活動。活動中，除了設置多塊展板講解香港抗爭情況，他們以街頭劇場方式，重演香港抗爭者與警察的衝突。

「你會見到他們將英文文宣放在視角水平，反而將中文置低，看出他們想吸引本地人的關注。而且他們選擇以重演方式，將香港抗爭情況展示，有戲劇性的效果，這好明顯是未見過的手法，令人感到有不同。」

溫哥華手足成員 Abby 在受訪時，被問及六四集會的「香港化」時這樣說：「溫支聯其實都是香港人成立，由香港人主導，故經歷這三年的變化，加入香港元素很正常。」

她補充，「溫支聯的活動可能多以集會形式為主，我們就會希望做到更多可以跟進的行動，因有一些手足的意見會認為，過去一些行動不足夠，會希望探索在集會之外，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Abby 介紹指，溫哥華手足由一班新抵達的香港移民成立，他們希望就算來到加拿大，亦可延續香港抗爭，令到香港的人知道，就算在海外，仍然有港人沒有放棄，仍關注自己的地方。「溫哥華生活環境理想，故我們更要繼續抗爭，不可忘記（過去幾年）有幾荒謬。」

溫哥華手足成立後，曾參與聲援烏克蘭人的示威，及舉辦團練等定期活動。但這組織開始為人熟悉，仍始於今年六一二的街頭劇場及展覽。

除此之外，在○月底及▽月初，「溫哥華手足」亦發起了兩場活動，針對香港特區政府在溫哥華舉行的「慶祝回歸25周年」。在香港政府舉辦的晚宴場外，示威者向進場嘉賓舉起抗議標語，並與他們對話。

「（赴宴者）當日見到我們示威者好驚訝，可能他們當晚是懷著好開心的心情赴宴，但我們不是這樣想，自香港交到共產黨手中，沒有好過，淪陷至此。故我們確認了活動地點後，短時間內動員示威，希望令他們知道，出席這些活動其實是可恥的事。」

而在香港經貿處於一個大型商場舉行的香港藝術展覽，他們就發動了靜默遊行。

「他們想做的是宣揚香港文化，但創作藝術不能沒有自由。」她指活動並沒有破壞展覽的進行，亦沒有對商場其他人構成滋擾。

上述示威，香港特區政府留意到。香港商經局局長丘應樺▽月13日在立法會表示，溫哥華等地的「慶回歸」活動受示威「滋擾」，局方感「遺憾及失望」，會與各地經貿辦了解情況。

民主大中華膠的

最後一代

更直接地問周豎峰，那是否代表過去一直主導六四紀念活動的大中華路線，未來會完全消亡？

在周豎峰眼中，抗爭語境下的「大中華膠」核心思想，是仍然相信中國會有民主自由的一天。撇開中國大陸當地人不論，周回應指過去其中兩種主要「大中華膠」源頭，分別來自去到外地仍未有改變身分認同的中國移民，及曾經對中國有超現實幻想的香港、澳門和台灣人。

但他直言早年由中國經香港移民海外的華僑人口正老化，近年受制於中國收緊移民政策，亦令可移民的人數減少，再加上現在西方社會對中國印象普遍負面，令海外華僑較少張揚大中華意識形態。

而曾經對中國有冀盼的香港、澳門和台灣人，在經歷近幾年的衝擊後，很多人已覺醒，「我認為足夠清醒的人是沒可能對中國有幻想」。

至於香港的下一代，周認為在愛國教育制度及環境下，自然會有越來越多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故長遠而言，「大中華膠」會買少見少。「無論在本土或海外，持有大中華意識的政治路線已沒有意義」。

龍華琛亦同意指過去一些「大中華膠」相信中國會有民主的一天，「但這些人已經沒有了，習近平好成功推翻不同中國人的中國夢」。他指出在近年中國的狀況倒退，令人對民主中國不存希望。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在溫哥華六四晚會上發言。(溫支聯提供)

海外香港人的民主實踐

周豎峰覺得在民主政治下，如果一個組織的路線不合符大眾要求，就不會取得支持，自然會被淘汰。「如果你是符合到香港人的路線，代表到香港人的想法，你就會留得低。」

他亦認為，民主不只是一種制度，而是一整套體系，信仰、思考能力及方法。「過去我們為民主而戰，希望建立民主制度，但不幸地港人嚴重缺乏民主的素養。現在海外港人在多元、文明的民主社會下生活，可以學習民主社會如何解決問題，及學習包容多元又不同的政治思想及價值。」故他表示欣賞溫支聯作為一個老字號組織，能接納新組織的出現，指這事相當不容易，「可以俾個 like 佢」。

龍華琛就指，「香港人的政治智慧，大多數都是民智剛開，包括我自己在內，仍在觀察及學習模式。」

「當日200萬人上街，都不是只有一個理念。我認為（我們）要先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看其他組織在做什麼。如果你希望對方接受你（的想法），不應站在他對面，而應是在他旁邊了解他的視野。」

Kennedy亦同意，不同組織各有各做，是一個最好的妥協。「大家都理解雖然都是香港人，但又不能貼太近，合作唔到，故我們只能夠尊重及認可大家的付出。如果做得到這一點，相信多個組織共存是可行的。」■

「手足：各有各做」

溫支聯：「打倒共產黨」目標一樣

大批新移民抵埗，令參與示威的人數大幅增加。李美寶指，過去的六四集會，主要在5或10周年會較多人，但過去兩年，參加人數都過千。李相信有一部份出席者是因看到香港維園「空晒」而參與。

「溫哥華好多支持民主香港的人，你有活動就出席，不會理你是新或舊的組織發起。」

對於有新組織創立，李對此保持開放態度。「如果一個組織覺得另一組織的活動方向不同，發起其他行動，如（我們）時間配合都會支持參與……大家一起做，目標同樣是打倒共產黨，不會是分化。」

「我們熟悉的香港已經沒有了……大家有不同的做事方法，活動是為了讓自己人圍爐取暖，或對本地人宣傳都好，都有各自參與的位置，做多做少都不要緊，最重要將訊息帶出去……不割席不分化，就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讓香港回復至以往的香港。」

她亦強調溫支聯除了辦六四晚會，過去亦會接觸學校及教師，向他們提供資料以至講座，此外溫支聯亦會進行人權倡議工作，及向加國國會議員進行遊說。

Andy對此亦有相似看法。「每人都有不同追求，但既然都有共同敵人，大家都是同路人。政治光譜好闊，……不一定要講求合作或一定要成為伙伴，即使假設有大大中華膠，但他同樣反抗中共，希望摧毀中共，這都是好事，總之目標一致就可以。」

她亦認為活動模式更多元，可以適合不同光譜的參加者。「每個人都不同經歷，不是每個人都經歷過2019年的運動，（政治）光譜不同在香港都是正常，每個人對於活動形式，都有其可以接受的程度……在不同的活動，都看到即使不同年紀的手足，他們都可以好有火……大家整體來說，希望各有各做。」



多倫多六四晚會的花牌挽聯上寫上「時代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冬甩攝)



報道 / 論述

當香港民族不再只是論述 與梁繼平的問答

文 / 亞當

無特別之處，但有一點運氣傳媒小警。

十年前的夏天，香港爆發反對國民教科運動，被部分論者視為近代本土思潮及香港民族主義的起點。

在反國教運動十周年之際，今期《如水》邀請了《香港民族論》編者之一的梁繼平進行訪談，從當時出版該書的時代背景說起，回顧香港民族過去是如何活在中國民族主義陰影。而在香港本土及香港人都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後，香港民族又何去何從。

梁繼平表示，當時出版《香港民族論》，主要是不滿香港主流政治圈子及公民社會已經將中國民族主義視為理所當然，亦從未有認真反思過香港人可否成為一個民族，於是希望以該書挑戰歷史霸權，及反駁當時針對香港本位及民族主義的偏見。

他指出，中共過去一直刻意利用言語的模糊性及文化上的操縱，在過去幾十年阻礙了香港民族的發展，亦令華語社群難以擺脫「大中華意識」，從而抑制如台獨或藏獨等分離主義運動。

然而 2019 年的時代革命及隨之而來的鎮壓，梁繼平指除了令香港泛民主派不再抱持「大中華意識」做「大中華膠」，另一重意義，「是我們真正進入了歷史進程，成為離散、受到壓迫的民族。」

當本土及海外的香港民族都面對存續問題時，梁繼平認為，這亦是我們「鬥團結、鬥耐性、鬥堅毅、鬥創意」，是「實踐先於理論」的階段。

Q1：回顧當時於 2014 年出版《香港民族論》，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A：我們先回顧一下當時環境。在 2008 年北京奧運當年（根據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當年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達到史上最高），香港對中國有很多想像。

經濟上，當時中國經濟正逐漸富庶，因自由行關係，本地經濟依賴及受惠中國經濟崛起。而在政治上，是中港融合蜜月期，當年劉曉波發起 08 憲章運動，有很多學者支持，仍有很多人說中國的憲政可能一時間還沒有民主，但有可能出現一條憲政改革的道路，甚至當時有說法指「將黨的權力放在籠子裡」，人們期望可以用憲法限制黨的權力。當時不少港人，對中國仍然有一些良性的想像，覺得中國有機會走向憲政，會有法治自由，而香港民主化亦有機會可以幅射到中國。

而由 1997 至 2008 年，泛民主派都沒有認真反思中港關係，或者台灣及西藏的處境，於香港有沒有可類比的現象。大家沒有這個危機意識。當時連民主派都是指我們都是中國人，毫無保留地接受民族主義，覺得要由中國本位出發，去看西藏、台灣、新疆以至香港前途問題，可見大家都是受到這種民族主義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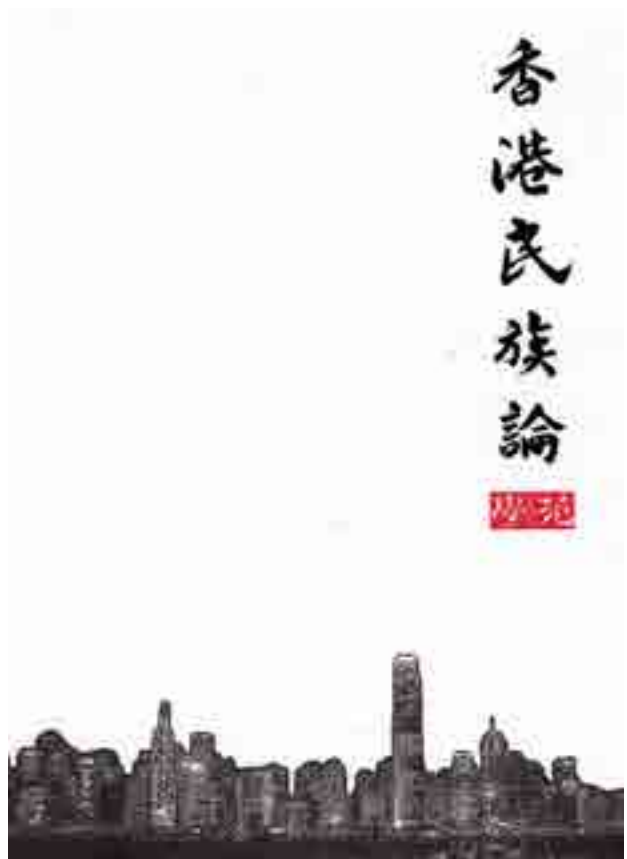
Q2：海外香港族群，當時又是如何被這種民族主義影響？

A：我相信對當時香港族群亦有影響，因為 8、90 年代不少移民的人是抱著一種避秦的心態，或是一種避險、hedging 心理，移居去外國多是為子女。但他們並不會有一種很強烈感覺，認為自由香港已淪陷，或從現今香港民族主義角度，沒有抱著一種被滅族的想法離開。甚至當時香港人會覺得自己能夠以中國人的面孔，遊走於白人精英圈子，無論其普通話好不好，對香港人而言都是優勢，是他們「搵食」的身分特徵。

即使他們在海外參與民主運動，仍然在中國民主框架下進行，他們並沒有一種 19 年後的意識，認為我們作為香港人要去遊說外國政府，去爭取香港的利益。2019 年後離開的港人，則會真正當自己是一個獨立族群，覺得自己有自決自治權利。如果當時香港遊說方針比較進取、進步一點，會不會換到多些空間？都可能，但這是大背景。

Q3：在 2022 年的今天，情況有變嗎，還有沒有「大中華膠」存在？

A：我在海外角度去看，2019 年運動後，無論是 20 幾歲一輩，或去到 60 歲一輩，不少人不是已經入獄，就已流亡海外，現在大家都親身知道 50 年前經歷白色恐怖的台灣人，甚至同現在的新疆、西藏人完全是同一個處境。當大家看到香港這樣淪陷，公民社會被打壓至肢離破碎，我認為過去他們過去如何「大中華膠」，現在都不會再討論什麼民族復興、中國民主化、改革等等。



Q4：剛才你提到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根深柢固，原因為何呢？

A：在華文語境之中，沒有分開 Ethnicity 同 Nationality 兩個概念。你的族裔身分及國籍身分是結合的，華人這概念太 powerful。

直到 2014 年牛津字典才有 Hongkonger 這個字，大家先會開始用 Hongkonger 或 Hongkongese 去自稱。

但在西方社會，例如以英國為例，因為過去民族之間的多次戰爭衝突，他們可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分別。

在美國會以 Caucasian（高加索人種）去形容白人，這純粹是一種膚色上的普通形容，不代表一種認同或政治忠誠，兩個白人相見，不會覺得我與你在政治取態上一定要是同胞，一定要一樣。高加索這概念可能是歷史膚色文化上的歷史源頭，一個文化的群體；但之後可以慢慢變成我是美國公民、加拿大公民、英國公民。

但在中國就會將兩者混淆。「你首先都係中國人」，共產黨愛這樣說，指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來自 5,000 年中華文明，大家都是黃皮膚黑頭髮，其實在策略上非常合理。他們就是希望將你的族裔及國籍混淆，因此在中國的語境中，你不能夠只說我的族裔是華人，但我國籍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這事是不合理的。

在這種中國民族主義語境下，你理解不到台灣人為何要爭取獨立，為何香港人要獨立。無辦法。因為你是華人，你是中國人，你就要應該支持中國這政權。

當時有討論是日後一旦中國民主化，香港應不應成為中華聯邦一員，就好像是美國一樣，而香港是其中一個州，還是純粹是英國一個城市？我們定位是如何呢？是蘇格蘭、愛爾蘭，還是德州？這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禁忌，當時一直未有衝破，因此，我們當時就希望寫文章，打破這種想法，質問為什麼不可以叫自己香港民族。香港人說要有自決權，希望建立一個民主政府，但你的族群身分是什麼呢？

Q5：這是不是共產黨的策略，又是從何時開始出現？

A：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在意識形態層面，共產主義其實不應該講太多民族主義，因為他們本應以世界大同為目標，在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民族主義是壓逼者的工具。不過如果你看共產黨某程度上挪用民族主義，你可以追溯到國共內戰、日本侵華，當時的共產黨發現民族主義可以最有效地爭取到支持者。

要重申我不是專家，但不少外國研究都指，中國共產黨重新推動民族主義，其中一個分水嶺是六四事件後，為了穩定政權，中共全面開展國民教育的更新及再造，強化用民族主義控制內部穩定的政策方針。無論是重寫所有歷史書、科普教材，強調民族主義等等，都是因為當時的政權出現合法性（legitimacy）的危機，而之後開始衍生的這套策略，亦直接影響香港的史觀。

中共的民族主義思想可以追溯到史大林。蘇聯很早就發現只強調共產主義是維繫不到人心，因此需要強調某程度的民族主義去維護自己政權。

李啟迪（李其後立場轉變，於 2020 年公開表明不支持港獨，並加入了希望聯盟）在《香港民族論》其中一章有說，其實少數民族民族自決來源，就是史大林的蘇聯民族主義，因為他們當時想拉攏更多中亞及東歐國家進入蘇聯體系，因此要用少數民族自決權的語景、論述去吸引他們，表示會尊重他們的少數民族自決權。其實在共產黨的歷史，對於他們有利的東西，就會去支持，無利的就不會。例如民族主義有利他們打倒西方殖民主義，可以將潛在盟友從西方、美國陣營拉攏過來，就會支持民族自決、殖民地解放等等，所以，中國對於民族主義，從來都是工具性的使用及挪用，亦因此在 89 年後，變成最核心的統治策略。

Q6 : 西方社會的「大中華膠」又是如何產生的？

A : 我不肯定可不可以叫他們做大中華膠，因為大中華膠核心係中國民族主義，而西方社會基本上可以只是「中國樂觀主義」，純粹政經利益交易，由利益出發，而無價值觀在內。前美國財長 Henry Paulson 的著作 *Dealing with China* 一書，講述華爾街精英在 90 年代幫中國金融銀行企業改革，他們以為未來中國會開放金融市場讓他們進入獲利，而對於一般美國消費者，中國入口貨品便宜，亦因此會從中國經濟起中獲利。

但直至習近平上台後，他們開始發現市場不會自由化，更會踢走外國企業。中國市場不會對外國企業有利。近年習近平也進行擴張主義，要搞一帶一路，針對台灣並加強控制新疆及西藏，建立自己勢力範圍。整個美國精英系統，由金融去到製造業及軍事外交政策，便由奧巴馬後期的重返亞洲政策開始進行調整，反思中國長遠不是盟友，中間有競爭關係。

在這過程中，2014 年開始的香港民主運動，亦有幫助整個西方社會反思中國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Q7：2022 年的世界，同《香港民族論》出版時已有巨變，現在討論香港民族理論，有那些不同，有需要增減的地方嗎？

A：我認為目前有關香港民族的討論，最大問題未必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而是我們真正進入了歷史進程，成為離散、受到壓迫的民族。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在本地及海外保持組織力，維持生態，繼續遊說及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

以台灣人為例，他們的第二代以至第三代仍然十分團結，美國有一個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我見過他們屬於第二代、第三代以至第四代的代表，大部份人只懂英文，但仍然非常關心台灣事務，仍然保持熱度，繼續在美國的遊說、組織工作。

這是一個很赤裸的問題：假設過了 20 年，我們老了，我們的下一代可能連廣東話都不會講，對香港的歸屬感亦可能歸於零，這是很現實的。因此回到你問我覺得香港民族主義哪裡要改進，我認為暫時在現時層面，應該是實踐先於理論。

再說，我認為其實在 2012 後至 2019 年期間，都已經進行過非常多的辯論，亦浮現了不少問題。在現在整個社群都受到嚴重壓迫下，反而是如何堅持、組織，是有關韌性的問題；或可以說，現在面對的，是香港人族群的存續問題。

Q8 : 有什麼可以做？

A：我覺得有一些海外的活動都有其作用，例如是繼續在西方社會進行遊說，我們要繼續針對香港自治，各國對香港政策，以及如何制裁中國等去遊說，讓人理解香港人作為一個活躍而獨特的利益群體，我們的利益是與中國不同的，而且我們是會擁抱自由民主的價值。

但另一個層面亦是重要的，就是在所謂軟實力方面。既然外國人受中國的民族主義影響，以為香港人和中國人都是一樣，你就需要教育西方群眾，讓他們理解意識形態上的分別。

在 90 年代，Free Tibet 在美國是一個十分流行的運動，有人會穿 Free Tibet 的衫，荷李活的影星會支持 Free Tibet，他們亦有不少電影以西藏為題材。我認同有不少人批評這是文化熱潮，純粹是表面的支持，而風潮會退卻。不過，如果香港能夠以一種文化圖騰，成為自由民主的指標、成為文化標誌，進入到西方主流社會，我覺得都會有價值及意義。

我們亦曾說 2019 年的革命哲學是「如水」，這哲學或抗爭模式其實有影響到東南亞，如泰國、緬甸，他們都認同是受到這種抗爭的哲學影響。

華府是政經利益行先。香港已經沒有軍事優勢。台灣最重要是其戰略地位，香港先天也沒有。但我們有的是文化的彈性，我們說英文，我們的教育程度能夠讓我們進入到西方文化對話。當我們可以將香港的民主、自由及經濟地位與中國的自由改革開放扣連，表明如果你關心中國就要關心香港，從而進入政經對話，這是重要的。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Dimitri Rodriguez 攝)

在紐約 Bronx 區有不少西藏人居住，而該區亦是 AOC (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近年急速冒起的民主黨左翼眾議員) 的選區，AOC 就令他們可以與主流政治人物對話。我認為這就要看各地香港人是否可以通過組織，對當地社區產生影響，包括建立聲譽，與當地政客聯繫，建立伙伴關係，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可以在文化層面上做到。因此，繼續搞香港節，宣傳香港電影等文化工作都是有重要性。

我記得一次在美國去酒吧，老闆看到我姓 Leung，就笑問是否 Tony Leung，我第一下不太明白他在叫誰，但之後記得梁朝偉就叫 Tony Leung，我問他是否有看香港電影，他說自己很喜歡看《花樣年華》及王家衛。王家衛就可以做這個橋樑，令普通美國人都可能會通過電影接觸及認識香港。

台灣研究都是近 10、20 年才開始獲更多注視。台灣就是在 60、70 年代黨禁，白色恐怖時，有不少知識分子在海外流亡，落地生根。他們就組織海外台灣人工作，海外台灣學者自己發起台灣研究，經過幾十年發展，加上有台灣資本家支持這些海外學術機構或學術智庫、大學研究中心，才開始有人認為台灣值得獨立研究、作為一個地區看待。香港在發展香港研究方面落後 20、30 年，都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有香港研究發展、推進，但你沒開始的話，更沒有人會為我們爭取。

Q9 : 我們亦看到在海外港人社群，即使大家立場相近，都仍然有相當多分歧、斷層。我們有需要先處理這些分歧嗎？

A：本土派當年對泛民經常掛在口邊，「要團結、唔好鬼打鬼」的說法反感，但在現今處境，海外運動團結十分重要。在西方政客眼中，如果看到你們在內鬥，會覺得你們混亂，無人會想同你合作。因為在政治世界，新聞有周期性，當你提出的議題過氣，關注人數、基數少，他們就不會理會你，不會想浪費時間在你們的泥漿摔角上。

在 2019 年前的香港，不同派別之間在公民社會互動很頻繁，你可以每星期見面，有相當多交流、動員。我們過去亦可能有很多不同意見，但不少人在 2019 年大型抗爭運動時，都有一個和解的機會，一笑泯恩怨。但可以預視，在未來好幾年，都不會有一場大型動員可以團結到香港人。在海外，我們現在也較難頻繁地交流見面。

我們現在只是「食緊」2019 年運動的資產，無論累積的聲浪，內部團結及信任，某程度都是在 2019 年時形成，從而一齊合作。未來幾年我們都只能利用這些資本，一旦傷了元氣，傷了信任，要再建立是非常困難。大家或要策略性地思考，什麼是次要矛盾，什麼是主要矛盾。如果是次要矛盾，有幾大程度需要馬上解決呢？

我覺得當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歷史實踐的問題，就係鬥團結、鬥耐性、鬥堅毅、鬥創意。

我們可不可以捱過這個冬天，就看海外和本地香港人如何維持某程度的聯繫。海外港人如何保持熱度時，又要取得平衡，避免不理性、涉及人事關係的辯論。否則可能過 30 年、50 年後，就會灰心，無人繼續。



所以最基本命題是，我們會不會「散修修」，這個危機比「大中華膠」更甚。

在 2019 年前，其實和理非及勇武亦存在相當大分歧，只是在 2019 年時，雙方都能夠動員，「交到貨」，從而形成兄弟爬山精神。如果此精神可以幫我們渡過此一段時間，我覺得是好事。

我們的抗爭運動經驗同上一代本身已經不同，在海外或會再隔多層。一批初到海外的香港抗爭者，他們帶著最熾熱的運動記憶，來到外國是會失望。我想去到最後，如果你不滿一些人的做事方式，但可以和平處理，不是水火不容，可以另行建立新模式、兄弟爬山、各有各做，都未必不是好事。遊行集會這種活動，大家都知道用處有限，但起碼有內部團結作用，可以讓香港人見一見面，起碼讓大家知道彼此仍然掛心，所以還是有用的，雖然我認同仍可以做得更多。■

報道 / 國際線

以香港研究、文化實力 跟大中華膠說再見： 訪問張崑陽、劉祖廸和鄺頌晴

文 / 亞當

無特別之處，但有一點運氣傳媒小薯。



香港民族思潮自 2012 年反國教運動開始萌芽，到 2019 年時代革命，香港人以行動向全世界公開宣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但在西方政界、學術界以至普通人眼中，這一切有意義嗎？過去認為中港台都是「中國」的西方人，在 2022 年的今天，仍會認為香港與中國沒有差別嗎？這些「西方版的大中華膠」，會對阻礙香港民族發展嗎？

為解答上述問題，《如水》訪問了張崑陽、劉祖廸及鄭頌晴三位一直參與海外遊說及政策倡議工作的社運人士。

「所謂大中華膠，我覺得會絕種。」劉祖廸在訪問中說。他與張崑陽都覺得 2019 年後，世界大幅增加了對香港的了解，令香港與中國的差異更明顯；但中共在語言上的壟斷地位及民族主義等因素，仍對外國將香港視為獨立主體構成影響。

雖然是瀕臨絕種，但「大中華膠」仍然存在。鄭頌晴就指，德國有一批政客，受該國本身歷史影響，在理解政治及歷史脈絡時對中國多持包容同情態度，坦言彼此難以互相理解。

張崑陽亦提到，在學術層面，香港無可避免會被列入中國研究的範圍內。他認為參考台灣研究的軌跡，壯大獨立的香港研究會是出路，「要讓人知道香港本身已經好值得研究」。

三人亦同樣認為，在政治及學術以外，香港人可以由自身出發，在社會及文化層面向西方社會突顯香港民族的獨特性及力量。

政治世界的香港認知度

「經過這 3 年，政治人物基本上都可將香港人同中國人區別，始終香港一向都很國際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城市。就算他們不知道什麼一國兩制基本法，都起碼知道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在回應西方政客是否普遍理解香港與中國有別時，張崑陽說。

劉祖廸亦有類似看法。「2019 年革命前，外國人未必知道香港在哪裡，亦未必知道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但 2019 年有很多香港相關報道、紀錄片、甚至是外國人的 YouTube 節目，大家就明白香港與中國有不同。」隨對香港的認知提高，劉甚至說，「所謂『大中華膠』，我覺得會絕種。」

不過，在德國有較多與政客交手的經驗的鄺頌晴有另一看法。

「(有一批政客)受本國歷史因素影響，理解世界政治和歷史脈絡，與我們作為被壓逼者從帝國夾縫中觀察的視野相當不同。」她形容這批政客，「會覺得中國自清末開始被列強打壓，反抗是逼不得已，現在的擴張正是對西方擴張主義的反擊。」她甚至曾聽過有人說：「你會否認為中國要這樣做，是因為美國或歐洲以前太過份？」鄺頌晴坦言，其實難以理解對方想法。她亦指出德國政界對外交議題相當保守，在「一個中國」議題上非常小心。

張崑陽覺得，此類政客因種種不同原因，例如出於對美國的反感，或受中國古文明、文化吸引，認為不應苛待中國，「他們無法理解中國已成為一個霸權，對中國有錯誤的包容」，雖然這類政客並非主流，但在某些國家會較有影響力。

他亦提出另一個因素，「語言上的壟斷亦會造成思維上的壟斷，覺得所有事都與中國有關。例如 Chinese 一字，好多人不太懂得分別，會問你是不是說中文，即使你同他們解釋，有時他們都會覺得很混淆，要再說明即使同一種語言，都不必然代表來自同一國」。

他指中國政府亦有通過操縱民族主義情緒，令許多移民海外多年的中國人，即使已入籍他國，仍會認為自己作為華人、華僑要對華夏土地有所貢獻。



劉祖迪（日巷攝）

劉祖迪亦同意，指不少字詞其實隱含大中華思想，如「內地」一字。「香港的內地是黃大仙不是中國。」

而在學術界，社運人士亦認為有關香港的討論，會無可避免被納入中國的範圍。

張崑陽舉例指在出席研究會議時，例如有一場「中國人權情況」研討會，就會找他作為香港代表參與，同場可能亦會有如西藏、台灣人、甚至中國民運人士等代表，但大家可能只集中講述自己認識的範圍。

「其實內心有一點 odd（不以為然），我重點想講香港人權狀況，但他們將香港放入中國這個大範圍的討論中。我明白這是實際考慮，當香港的抗爭降溫後，不是每場研討會主題都可以只為香港度身訂造，故他們將主題擴大的確可吸引更多聽眾，引起更多討論。唯有屆時同聽眾說明我只能就香港方面的事發言。」



張崑陽

張崑陽：香港研究或是出路

長遠而言，張崑陽認為，專門的香港研究或者是一條出路。

他解釋作為參考對象的台灣研究發展多年，台灣人會向不同大學捐款，建立獨立的台灣研究學系，近年在華府亦有專設的智庫 Global Taiwan Institute（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當有足夠學者及智庫意識到討論香港例如金融政策等題目有策略性作用，對研究整個亞太區域有貢獻，香港研究就有機會從中國研究分拆出來，培養更多研究香港的專家學者。

「不單要讓世界知道香港與中國有不同，也要在香港抗爭運動不是處於高峰時，仍為香港作（學術研究），讓人認知香港仍對世界產生很大影響，值得討論。」

他指其實 2019 年世界因抗爭而突然關注香港，但不少專家並非真正熟悉或理解香港，故他希望香港研究壯大後，可以舉行專門的香港研究會議，推進知識或實務上的研究，甚至可以讓智庫提出政策文件，給最終政策制定者考慮、討論及推進。

劉祖迪：借助中國角度是策略取捨

劉祖迪就覺得，通過一種「中國角度」帶出香港議題，這是一種策略上的取捨。他舉例指，自己在 Twitter 簡介，有提到自己是香港及中國的社運人士，當有媒體就中國人權情況提出查詢，他就可以連帶提及香港，增加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純粹是策略需要。只要策略目標清晰就可行，這並不代表我是『大中華膠』。」

鄭頌晴亦同意，在學術圈子中，需要更多香港學者填補空缺，「例如政治、文化研究等，要用香港學者身分去做相關的研究、討論，否則這些空缺將會被他人填上。」

三人在訪問中亦有提及，除學術及政治層面，海外香港人亦可在日常生活中帶出香港與中國的不同，令一般外國朋友亦更理解香港的處境。

「他們不是奉旨了解（香港與中國的分別），畢竟亞洲的事對他們而言很遙遠。普通人當中可能十個有九個都未必太了解狀況。」張崑陽指，民間外交有賴各地港人通過身體力行，在融入當地社區時強調香港人身分。





鄭頌晴

「他們未必會記得幾年前在地球上另一角落發生過什麼事，但透過你的故事，他們會記得我有一位鄰居，因被迫害而來到這裡。」

他亦強調，各地香港人除通過宣傳香港文化，顯示與中國人的區別，也可在關鍵時刻發揮政治影響力，故希望港人可建立更多同鄉會性質的組織。

「我們可以在有事發生時，向政客發聲，例如在遊說時，向他們說明在他的選區內香港人有多少，並強調我們全部都是選民，我們有以下需求，請你正視……」

政治上，張指香港人可以向政客施壓。而文化上，他則認為港人可以透過美食等軟性手段，令外國人理解香港在文化上不同於中國。

鄺頌晴：港人散居仍可發揮群眾壓力

鄺頌晴提到，即使港人未必聚居於同一地區，但同樣可以發揮群眾壓力。她表示在奧地利，當地港人人數不多，但通過與議員的會面、遊說，亦成功讓奧國政府承認 BNO 的護照地位。

「對我來說，離散不代表我們一世要住在外國，我們始終有一天要返去香港。故即使離開了，我們仍然可以行動，特別是可以投票的人。」她說。

劉祖迪最後亦提到，不時會遇上無知的外國人，「他們未必是『大中華膠』，但見到你是黃種人，會同你說『Ni Hao』。」他認為如果對方是朋友，可以告訴他，「其實我們香港人打招呼會說『Hello』的。」

「近年香港有很多大眾向的歷史書。作為香港人，我們應該要（透過這些書籍）學習、認識更多，保留自己的根，並創造更多與當地人溝通的話題。」■



世界・香港 大事回顧

5月



05/03 香港

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公布2022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21年的80位，進一步暴跌至148位，較索馬里、斯里蘭卡及菲律賓等國家更低。

05/08 香港

李家超以唯一候選人身分，被「優化」後的選委會「選舉」為新一任行政長官。

05/11 香港

已停運的612基金5名信託人，包括陳日君、樞機、吳靄儀、何韻詩、許寶強及何秀蘭，被警方國安處以「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被捕。



6月



06/01 香港

《時代革命》在網上公開放映。

06/01 國際

中國上海市解除維持超過兩個月的封城狀態。

06/02 國際

英國舉辦盛大的英女皇白金禧慶典，慶祝上下慶典。

06/04 香港

警方於3日起封鎖維園足球場，嚴禁六四事件紀念活動。惟仍有市民以不同方式悼念。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時代革命



05/21 國際

烏俄戰爭：馬里烏波爾全部守軍撤出亞速鋼鐵廠向俄軍投降成戰俘，歷時近 3 個月的圍城戰結束。

澳洲舉行聯邦大選，工黨擊敗執政 9 年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由艾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 出任新總理。

05/24 國際

BBC 等國際傳媒發布「新疆公安文件」系列報道，該批文件包括超過 2,000 名被拘留的維吾爾人資料，當中有人僅因家人涉及「罪行」而被拘留。文件亦指再教育營的守衛可射殺逃跑的人。

05/15 香港

東鐵綫金鐘至紅磡段通車，標誌著沙中綫工程在多次延期後，歷時十年終大致完工，總成本預計超過 800 億元。

05/17 香港

有報道指香港政府或會考慮封鎖 Telegram。

05/31 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進一步收緊疫苗通行證要求，已接種 3 針者才可進入超市、商場、戲院等地點，或在餐廳堂食。



06/06 香港

《明報》報道指有學校在缺乏足夠指引下，因擔心《國安法》而自我審查，將多種涉及不同範疇的圖書下架。

06/10 香港

於 2015 年成立的調查報道媒體《傳真社》宣佈停止運作，最後的報道包括揭發「安心出行」具人臉識別功能，及李家超的兩名兒子曾與選委共事。

06/10 國際

加拿大與丹麥簽署條約，解決漢斯島領土爭議，結束為期近 50 年的「威士忌戰爭」。亦設立了兩國首條陸地邊界。



6
月



06/19 香港

香港著名地標之一的珍寶海鮮舫於 6 月 14 日由香港仔出發前往「翻修」，但於 19 日被船東指已於南海沉沒。但其後海事處指船隻沒有完全沉沒。



06/24 國際

歐盟同意給予烏克蘭及摩爾多瓦候選國資格。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裁定女性進行墮胎合憲的 Roe v. Wade 案，多個州份可推行限制墮胎的法律。

06/25 國際

烏俄戰爭：北頓涅茨克落入俄軍手中。

7
月



07/01 香港

李家超接任特首，同時，新一屆政府擴大架構，增設三名副司長及改組為十五個政策局，即將運輸房屋局分拆及增設文化旅遊局。



7
月



07/07 香港

被《國安法》起訴的呂世瑜，獲高等法院批出上訴許可。他早前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後，並沒有獲得 3 分 1 的刑期扣減，被法官按《國安法》判處 5 年監禁。

07/07 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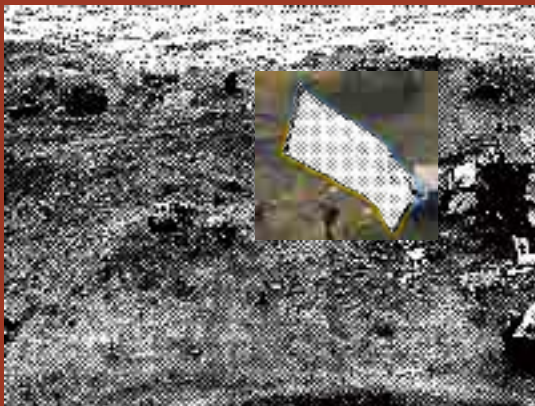
雖然在 6 月初通過黨內信任投票，英國首相約翰遜最終因黨內爆出新性騷擾醜聞導致多名大臣辭職，而宣布將在保守黨選出新黨魁後離職。

06/30 香港

習近平即日來回式訪問香港兩日。惟首日多間本地及海外傳媒如《獨媒》、Hong Kong Free Press 被拒採訪。另外即使其他傳媒如《香港01》、《明報》、now 新聞台及法新社等媒體獲邀採訪，多名預先登記的記者在最後一刻仍被當局以保安理由被要求換人。但因採訪習近平行程的記者須要預先進行檢疫，記協指大部份受影響傳媒已無法安排符合要求的人手，未能派員到場採訪。

06/30 國際

烏俄戰爭：據烏軍指，俄軍在遭受攻擊後被逼撤出蛇島，烏軍隨後重佔該戰略重地。

**07/03** 香港

創作《衛斯理》小說系列的作家倪匡去世，終年 87 歲。

**07/08** 國際

日本戰後在任時間最長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市為黨友拉票期間，被人從後槍擊，同日不治。

**07/09** 國際

斯里蘭卡因國家破產而觸發大規模示威。總統官邸被示威者佔領後，總統拉賈帕克薩 (Gotabaya Rajapaksa) 辭職，13日離國抵達新加坡。

7
月
→

07/10 國際

中國河南多間村鎮銀行倒閉，過千名無法取回存款的苦主在鄭州中國人民銀行外示威，被警察及身分不明的白衣人襲擊。其後當局公布墊付方案。另有部份存戶的健康碼早前一度被轉為紅碼。



07/14 香港

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中槍，其後一度聲稱已流亡的曾志健，以及其餘 3 名因他案被起訴的抗爭者於西貢被捕。

由部分被拒參加貿發局書展的出版社自行籌辦的「香港人書展」，在開幕前被場地業主指「違反租約」，被逼停辦。

07/21 香港

首批來港大熊貓之一的安安去世，終年 35 歲。



07/27 香港

位於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委託網絡安全公司揭發「安心出行」有多項私隱隱患。同時，有報道指香港當局計劃在「安心出行」引入紅、黃碼。



07/11 國際

美國太空總署發布來自韋伯太空望遠鏡的首張照片，名為《韋伯的首次深空》，為人類拍攝所得「早期宇宙最深處」的照片。

同日，聯合國發表展望，指地球人口將於今年 11 月 15 日達到 80 億。印度將於明年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中國最快將於明年開始出現人口負增長。



07/22 國際

在聯合國及土耳其參與協調下，俄羅斯同意容許烏克蘭從 3 個港口出口糧食及化肥，舒緩環球食物供應緊張情況。

07/25 香港

包括香港大學等多間大學，相繼要求學生完成國安相關課程才可畢業。

07/25 國際

去年通過政變上台的緬甸軍政府，公布已將 4 名民運人士處決，包括全民盟前國會議員，歌手漂扎亞桑及作家覺敏友，為該國 30 年來首次執行死刑。

07/28 香港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指如條件許可，應在全港學校全面推行普教中。

同日，Mirror 演唱會發生嚴重意外，一個巨型屏幕倒下，壓倒兩名舞蹈員，當中一人重傷，演唱會會餘下八場腰斬。

07/29 香港

「賢學思政」4 名成員承認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報道/化零為整 ○

流散港人動向

(5/2022-7/2022)

反送中運動後 3 年，隨著多國推出「救生艇計畫」，讓港人移居海外，各國的港人社區正快速成長。連帶由港人在海外發起的實體示威遊行、集會、街站、放映會及展覽等活動亦大幅增加。

《如水》統計，由 6 月 4 日至 7 月 2 日期間，世界各地港人合共在全球超過 50 個城市，舉行了最少 100 場活動，主要集中於六四、六一二及七一這 3 個對港人有特殊意義的日子。當中，以六一二相關的活動最多，達最少 42 場。部份城市如倫敦及溫哥華，集會出席者估計高達 4,000 及 3,000 人。

部份由港人發起的示威活動亦引起香港特區政府留意。例如香港政府 7 月初在加拿大列治文一個商場內舉辦的「慶祝回歸 25 周年」藝術展覽，成為當地港人舉辦靜默遊行的目標，事後香港政府表示會向各經貿辦了解情況。

除此之外，在其他重要的抗爭相關日子，如七二一，各地港人亦有以個人或組織身份舉辦街站等活動。



《如水》由今期起，每期都會統合流散港人動態。今期將聚焦 6 月至 7 月初記錄到的活動，以圖像方式呈現。

除了上述活動，在 5 至 8 月期間，亦有不同組織舉辦各種規模的研討會、藝術展覽及市集等，如香港民主委員會 7 月底在華盛頓舉辦的香港峰會、溫哥華香港屋於 5 月舉辦的市集。

數個於網上進行的聯署亦引起關注，例如「香港人不承認李家超為特首」，以及由 19 個港人組織發起的「聯署全球城市與中國姊妹城市斷絕關係」。

文化活動方面，除《時代革命》在各地陸續公映引起海外港人關注外，另一套由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在多倫多 Hot Docs 國際紀錄片節獲得「最佳國際紀錄片大獎」，取得角逐奧斯卡的資格。而其他與香港抗爭相關的電影，如《少年》、《香港本色》及《因為愛所以革命》，亦陸續在期內配合多地首次創辦的香港電影節上映。

以台北為基地的一八四一工作室，亦於 7 月 20 至 26 日，首度於台北、英國倫敦、曼城、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舉辦「五城書展」。

相片來源

Re-Water、澳洲首都香港協會、DC4HK、Lion Rock Café、Reading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西雅圖香港民主監察小組、Western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Pan-Asian Democracy、Newcastle Stands with Hong Kong、Manchester Stands with Hong Kong、溫哥華手足、Halifax Hong Kong Link、Liverpool Hong Kong Alliance

2022年6-7月港人 曾於哪些城市辦活動



United Kingdom 英國

Aberdeen 雅巴甸	Leeds 列斯
Birmingham 伯明翰	Liverpool 利物浦
Bristol 碧仙桃	London 倫敦
Cardiff 卡迪夫	Manchester 曼城
Cambridge 劍橋	Newcastle 紐卡素
Edinburgh 愛丁堡	Nottingham 諾定咸
Exeter 雅士打	Reading 雷丁
Glasgow 格拉斯哥	Sheffield 雪埠
Guildford 僑福	Southampton 修咸頓

Denmark 丹麥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Sweden 瑞典

Stockholm 斯德哥爾摩

Czech 捷克

Prague 布拉格

France 法國

Japan 日本

Tokyo 東京

Taiwan 臺灣

Taipei 臺北

Germany 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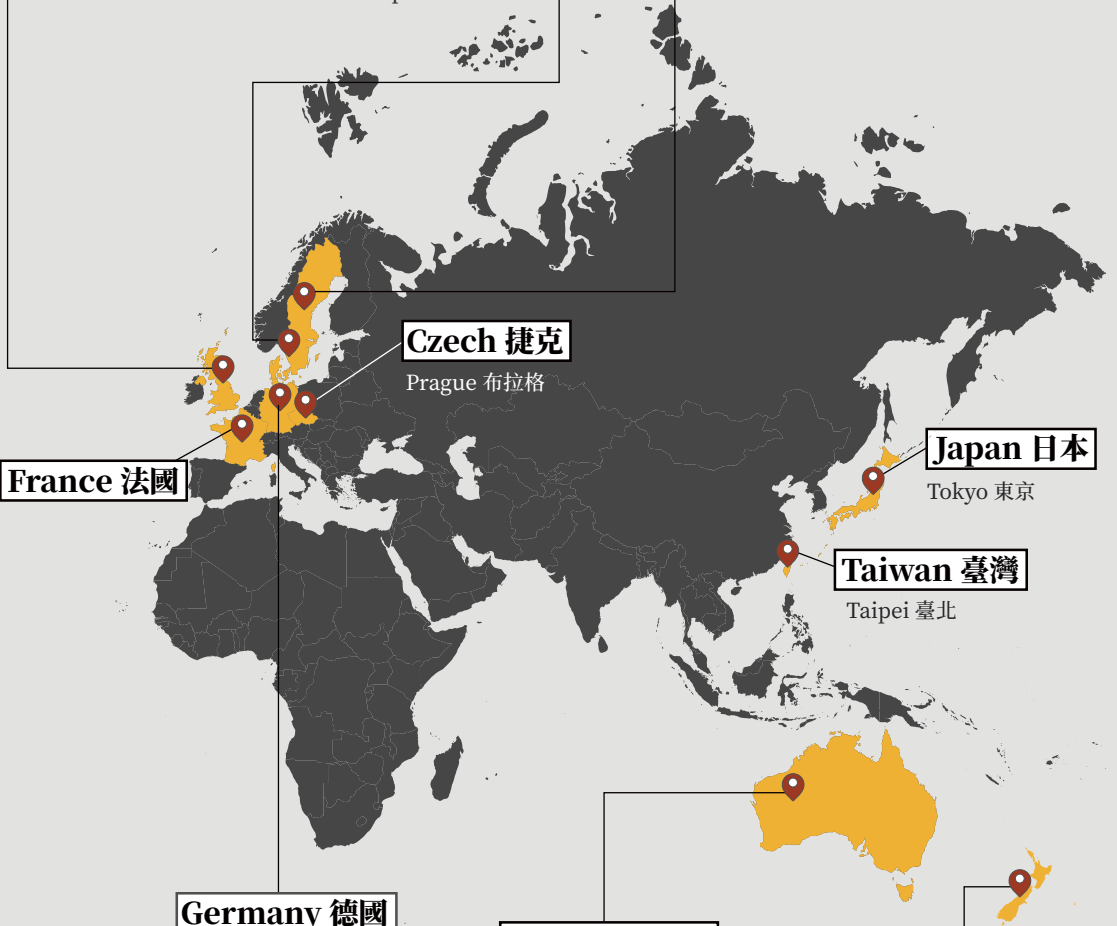
Berlin 柏林
Hamburg 漢堡
Munich 慕尼黑
Cologne 科隆
Frankfurt 法蘭克福
Dusseldorf 杜塞爾多夫
Heidelberg 海德堡

Australia 澳洲

Canberra 坎培拉
Brisbane 布里斯本
Adelaide 阿德萊德
Perth 珀斯
Sydney 雪梨
Melbourne 墨爾本

New Zealand 紐西蘭

Auckland 奧克蘭
Christchurch 基督城



報道 / 化零為整 ○

外媒觀點整理

(5/2022-7/2022)

自從 2019 年時代革命後，外媒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香港，其中一個主要關注點，是「新香港」與中國接軌的程度。



《華盛頓郵報》

當香港警察國安處於今年 5 月 11 日拘捕陳日君主教後，《華盛頓郵報》於 5 月 13 日報道，香港的宗教自由程度曾一直遠超中國，但在 18 名最近受訪的牧者及學者之中，多人表示有教會近年開始被逼審查牧者背景，避免委任有政治立場的人。自《國安法》實施後，另有教會提示牧師佈道時要避免敏感內容。此外，該報道亦指香港三大基督教會之一的宣道會，會分拆成數個機構，以降低被凍結資金的風險。





《路透社》

《路透社》在 7 月 5 日亦報道，梵蒂岡駐港非正式代表何明哲蒙席於今年 3 月調任離港前，亦曾向教會團體提醒，預料正如中國一樣，宗教自由在港將受到打壓，教會需要作出準備。報道指，一些教會團體開始將部份檔案，如涉及與中國地下教會接觸的敏感資料，運送到海外。



《衛報》

《衛報》於 6 月 3 日的一篇編輯室評論，直指香港的自由在《國安法》下已消失，不過即使在香港或海外，香港人仍盡力維持記憶，而未有將過去的自由遺忘。如鄒幸彤仍盡力利用自己的審訊去提醒大家六四事件。海外港人社群亦以電影節等活動，嘗試重建公民社會。





《紐約時報》

另一個被外媒察覺到香港正加速靠向中國的情況，是近日政治界掀起的「學習習近平」熱。《紐約時報》7月27日一篇文章，詳細描述習近平7月初訪港後，香港特首、高層官員、以至立法會議員，紛紛以社交媒體宣傳、或舉辦長達6小時的會議等等，讚揚和學習習在訪港期間的公開演講（或中共口中的「重要講話」）。特首李家超經常在活動致辭時引用習講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書展期間在傳媒面前購下《習近平的治國理念》一書。流亡海外的前立會議員許智峯回應指，對這種新出現的「個人崇拜」感震驚。

在英、美等較留意香港情況的國家，香港不再是一個自由城市，已是普遍共識。





《華盛頓郵報》

而《華盛頓郵報》7月4日的評論，就指只要看看香港，就知道民主制度是易危的。文中指習近平多次在香港提及「由亂到治」，就正好反映他不能容忍民主制度及其異見聲音，故即使香港可從疫情打擊中恢復，但不會恢復到從前的政治環境。評論指此反映只需幾年，一個民主制度就可以如香港般崩潰，其他地方必須警惕。



《彭博通訊社》

針對外媒的報道及評論，香港政府其實非常在意。《彭博通訊社》7月25日一篇報道，指出自2020年5月《國安法》開始浮面後，香港政府已去信30個國家多達174間外媒，發出多達500封致編輯的信，澄清有關《國安法》或「愛國者治港」的「失實」或「偏頗」的報道。■



香港研究進展 (5/2022-7/2022)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可說是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本期的香港研究將聚焦在 2022 年 5 月到 7 月期間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

「無大台」是反送中運動一大特點，市民透過網絡、社交媒體組織行動，「兄弟爬山，各自努力」。*Mask as identity? The political subject in the 2019 Hong Kong's social unrest* 一文以「蒙面」作為研究出發點，指出蒙面既反映一種集體政治身分，亦是一種個人決定。透過蒙面，香港抗爭者一方面隱藏其身分，另一方面幫助他們避免直接吸入催淚氣體，此外蒙面亦有象徵意義，反映抗爭者是帶著異見的自主主體。作者認為，蒙面也是一種鼓勵抗爭者互相連結的手段，令抗爭者更了解彼此的情感、理性與信念。文章並指，當代社會運動愈走向無領袖、愈憑藉網路產生，抗爭者就會愈追求連結與身分關係。

Wild hopes: Sourcing the political vocabulary of digital citizenship from the LIHKG forum 透過搜集及分析網民在「連登」上使用的辭彙，並透過其潛在含意、去了解網民的訴求以及身分的塑造。而另一份文章，*Game-Assisted Social Activism: Game Literacy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就以反送中運動中所用到的遊戲辭彙 (Game Literacy) 作為切入點，研究遊戲與現實社會的關係。文中分析「香城 online」這個例子，認為遊戲去類比示威行動，可以增加抗爭者能使用的手段，並加強社會運動的「be water」特性。

雖然 2019 年的香港社運往往被視為無大台、領袖，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意。*Twitter as a leadership actor — A communication as constitutive of organizing perspective on a 'leaderless' social movement* 一文便提出領袖只不過由一個實際存在的人，變成了網絡世界，並指 Twitter 的存在，令整場運動並不是「無領導 (leadership-less)」，而反覆強調的「無領袖」論述只是一種幻想 (fantasy)。

2019 年對許多港人而言顯然是創傷的一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甚至到現在，閱讀或觀看相關書籍及影片時仍然心有戚戚焉。*Kindergarten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一文研究社會運動對於幼稚園學生產生的影響。研究邀請 5 至 6 歲的幼稚園學生透過繪畫講述社會運動期間的經歷，並了解兒童如何看待警察

以及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結果發現兒童感覺雙方均憤怒且具攻擊性，許多兒童對警察表現持批判態度，並認為抗爭者需要受警方保護。

2020 年初武漢肺炎於全球陸續爆發，反送中運動因此逐漸受到壓制，再加上港區國安法同年實施，不少港人相繼離港，到海外尋求其他出路。不少海外地區出現愈來愈多的港人社群，在 *Diaspora formation and mobilisation: The emerging Hong Kong diaspora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一文中，作者將海人港人置放於「無國流散社群 (stateless diaspora)」的框架加以論述，並分析了港人在不同國家的情況。眾多國家中，英國可說是最熱門地區之一，尤其在 BNO visa 政策實施後，不少港人都選擇移民到當地。*Colonial Hangover and 'Invited' Migration: Hong Kongers to the UK* 一文中則分析英國歡迎港人移民的原因，其中寫道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英國脫歐後需要補充人力。■



Bibliography

- Ahsan Ullah A. K. M. & Azizuddin, M. (2022). Colonial Hangover and 'Invited' Migration : Hong Kongers to UK. *International Studies*, 59(2), pp.180-191
- Cohrsen, C. , Rao, N. , Kapai, P. & La Londe, P. G. (2022). Kindergarten children ' s perceptions of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20(2), pp.242-258
- Erni, J. N. & Zhang, Y. (2022). Wild hopes: Sourcing the political vocabulary of digital citizenship from the LIHKG forum.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4(4), pp.349-375.
- Fong, C. H. (2022). Diaspora formation and mobilisation: The emerging Hong Kong diaspora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8(3), pp.1061-1079
- Lin, H. L. & Sun, C. T. (2022). Game-Assisted Social Activism: Game Literacy in Hong Kong ' 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Games and Culture*, 0(0) pp.1-23
- Pang, L. K. (2022). Mask as identity? The political subject in 2019 Hong Kong ' s social unrest. *Cultural Studies*, 36:4, pp.624-642
- Poon, M. & Kohlberger, M. (2022). Twitter as a leadership actor — A communication as constitutive of organizing perspective on a ' leaderless ' social movement. *Leadership*, 0(0), pp.1-24
- Wong, M. Y. , Hui, L. M. , Suen, Y. N. , Wong, S. M. , Chan, K. W. , Lee, H. M. , Chang, W. C. & Chen Y. H. (2022). The impact of social unrest and pandemic on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The transdiagnostic role of event-based rumination.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56(4), pp.376-384

香港 / 脫華論： 告別黃河，擁抱海潮

文 / 徐承恩

《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作者。

偶爾午夜夢迴，都會穿越到求學時期的青蔥歲月。老師在講中國歷史，總會說「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下課回家、打開電視，就看到 TVB 轉播 NHK 製作的《大黃河》。在 Walkman 的收音機，羅文不時以特有的腔調演繹黃霑的禮讚，高歌「我的夢和你的夢，每一個夢源自黃河」，而侯德健則以控訴的腔調高歌「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就叫黃河」。兩首歌都渴慕富強、忽略自由，可是在我 10 歲那年的初夏，大人們卻因為對自由的渴望，反覆播放著這兩首歌。

本人喜歡在下課後翻起地圖，驗證日間的新知。可是香港與黃河又有何相干？香港和嶺南地區與東亞大陸主體，隔着一道五嶺山脈。此後橫越長江中游的兩湖盆地，再穿過秦嶺山脈在襄陽的缺口，走過超過 1,300 公里的路，才得以親近黃河水。在這個千里之遙的領域，住滿各種文化迥異、語言不通的族群，我們與這些人都只能勉強筆談。

後來考上大學，發現水文圖有時比地圖更精彩：畢竟海洋覆蓋 70% 地表，而水路交通向來都比陸路方便。距香港咫尺之近，就是黑潮這股源自西太平洋的暖流。這條「生命流」帶着滋養豐富的元素，從菲律賓、臺灣東岸、琉球群島，一直流到日本列島再分為兩支：一支沿着東南沿海，在日本東北對出的海面與親潮匯合，形成直奔北美洲的北太平洋洋流；另一支則在繞經韓半島西岸後南轉，形成流經黃海和臺灣海峽的大陸沿岸流，並在香港和臺灣之間與南海暖流及黑潮碰撞。海潮不只為沿海帶來豐盛的海產，還會與東北—西南的季候風系統結合，交織成串連東亞沿海的交通幹道。這道波瀾壯闊的海潮，才是香港真正的「母親河」。

海潮的東亞與河流的東亞，乃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黃河流域的漢語族群，在長期與內亞族群交流和衝突的背景下，在大約 4,000 年前形成城市國家，並為長江上游的南亞語族族群、中游的苗瑤族群和下游的原始南島族群所模仿。這些城市國家隨後，時而服膺於相對強盛的霸主、時而組織聯盟互



相攻伐，並於公元前 5 至 3 世紀演變成領土國家。秦帝國在公元前 221 年併吞黃河和長江流域後，又征服從韓半島北部到紅河流域的大片疆土，其後被漢帝國則在 20 年內整碗端去。此後東亞大陸出現過一連串自稱「中華」或「華夏」的「世界帝國」，它們雖會抵禦西北內亞族群的內遷，內亞族群卻多次越界融入為帝國的權貴階層。東亞大陸帝國面對東南諸族，則擺出相當強硬的態度：他們一方面以暴力吞併和同化接壤的農業族群、另一方面則威脅偏遠族群表態臣服。

東亞大陸帝國曾嘗試染指東亞沿海世界，其進展卻不太順利。帝國只曾短暫侵吞韓半島北部，到公元 4 世紀就無以為繼。日本列島從未受過帝國的統治，在國家體系形成後也拒絕向帝國稱臣。在東南沿海的嶺南和閩南，雖然是帝國名義上的疆土，可是五嶺—武夷山脈的地理阻隔，卻把帝國勢力侷限在要道和據點。直到公元 7 世紀，原住民的小王國仍實際管治著鄉郊。而唐宋帝國年間，廣州和泉州這類大城市，都是海洋貿易的主要港口，住着數十萬計的南亞和西亞新住民。雖然這些大城市設有帝國的官署，官員卻因文化差異和兵力懸殊，只得容許新住民在「蕃坊」自治。廣府人和福佬人等族群，就是原住民在吸收新住民及南遷漢人後形成的本土族群。

大陸與沿海的角力，在 14 世紀明帝國創立後白熱化。東北亞的朝鮮王國和日本，與明帝國的關係就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所言，出現「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體現着『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形成獨立自治的國家體系。東南沿海族群為迴避明帝國的國家壟

斷，則組織被誤稱為「倭寇」的海上傭兵，沿着海潮和季風以從事亦商亦盜貿易。不過東亞大陸帝國此時亦基於朱熹理學，建立以家族父權替專制皇權背書的「中華」意識形態，確立尊卑分明的社會秩序。這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欺負鏈」，只要順服在上者的權威，就可按照同樣的邏輯欺負下人：皇帝欺負士人、士人欺負家長、家長欺負子弟、子弟欺負妻妾、而妻妾則欺負（未來的）媳婦。這條「欺負鏈」讓子民順應「上尊下卑」的邏輯，令他們成為帝國結構的共犯。

這樣東南沿海的族群為爭奪田產，就藉儒教禮儀「漢化」融入「欺負鏈」，因「崩口人忌崩口碗」而自詡「華夏嫡傳」，丟棄自我的人格尊嚴。而獨立自主的東北沿海，亦受到尊卑意識的茶毒。朝鮮王國借用理學教條鞏固封建階級秩序，延宕發展近代文明的時機。日本走在東亞沿海世界之先，於江戶時代確立本土意識形態、奠定近代前期的原始資本主義，並在明治維新時以此為基礎發展成近代國家。可是「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卻鞏固尊卑分明的不公體制，對自由民權的開展構成障礙。而野心家亦按圖索驥，以「中華模式」確立以儒教倫理詮釋神道的帝國神學，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近代「天下帝國」：受「中華」茶毒的「大日本」不單帶來戰禍，還成為中國國族主義者的啟蒙導師，指引東亞大陸帝國走上黨國集權的道路。

美國在 1945 年打敗日本的「中華帝國」，成為東亞沿海秩序的維持者，又迫使日本擔任東亞自由民主的首徒。自 1950 年代末以來，東亞沿海世界一直維持相對的穩定，臺灣、韓國以至香港的民眾在這樣的空間，逐步確立主體意識、追求自由民權。可是美國的主要關注始終是要與蘇聯爭霸：為此他們以穩定壓倒一切，縱容日本的民主倒退成保守的「1.5 黨體制」，又默許臺灣和韓國的獨裁者濫用國家暴力。除此之外，美國更於 1970 年代為打擊蘇聯而拉攏中國，暗助他們走上稱霸之路。美國其後與遷佔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斷交，又默許英國把香港出賣予中國，都是出於這種合縱連橫的考慮。

不過自由民權運動眾志成城的力量，還是有力與大國政治的強權勉強一拼。韓國和臺灣分別於 1980 和 1990 年代先後走上民主化的路途，而臺灣亦開始學習捨棄裝扮成大陸帝國的顛倒夢想，步上「去中國化」的正途。身處東亞大陸帝國旁邊的香港，雖受困於認同錯亂的迷思，可是香港人還是於 1980 年代起，朝着民主自治的目標匍匐前進。縱使東亞沿海世界對自主的追求未臻完美，卻還是堅持到 2010 年代的關鍵時刻：隨着中國踏入習近平時代，這個重新崛起的東亞大陸帝國，其策略也從「韜光養晦」演變為「以我為主」，下定決心要稱霸全球。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逐漸意識到自己必須聯合東亞沿海世界，協力抵擋中國專制霸權的魔爪。

這樣的世界局勢，使香港在 2019 年的起義成為關鍵的世界史時刻。「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主流抗爭者的口號，代表香港人已決志抵擋「中華」

霸權、創立獨特的國族，讓起義亦從本土走向國際社會，成為沿海世界抵抗「中華帝國」侵略的前線。雖然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可是在迷糊不清的初醒時份，在各個崗位的香港人都必須趕快喝口「回魂啡」，為未來的抗爭做好準備。近日在東亞沿海世界，曾經就香港人的屬性出現過一些爭議。這些爭論背後也許不無私心，可是其核心問題卻是不容忽視：「東亞沿海世界在幫助香港自立後，這個新生的國家會否自私地倒向中國那邊，再反咬我們一口？」

香港人既要成為自決的國族，就必須認定自己在東亞沿海世界的角色，努力成為反帝反華的急先鋒。在香港發揚光大的嶺南文化，曾墜入帝國意識形態的迷霧，誤以「比中國還要中國」的理據去肯定本土：如今我們必須本於自立自主的自豪感，無畏地宣告香港就是香港，丟棄所有「承繼中華道統」的顛倒夢想。過往香港人又會把民國史浪漫化，卻不知「中國」本身已是一種邪惡的存在、不知曾經「反共」的中國國民黨絕非善類。筆者過往旅遊時，曾見過香港人在留言冊盛讚臺灣、韓國和日本保存着優秀的「中華正統」，卻不知道這種「讚美」是對沿海世界嚴重侮辱。如今「攪炒」大勢已成，香港的抗爭亦步入潛龍勿用、靜待黎明的階段。散居各地的香港人，是時候冷靜反省、裝備自己，思考香港在國際社會和世界史上的角色：認識東亞沿海世界歷史，以同情和理解與沿海各國建立友誼，並下定決心與東亞大陸帝國永遠訣裂，乃當今香港人的時代任務。■

（未經校對的詳細版本：<https://bit.ly/3OrLRYR>）



評論·時政

流散 /

從“*I come from Hong Kong*” 到“*I’ m a Hongkonger*”

文/冬用

陷入中度思香情緒的普通香港人。

光復香港 時代

關於移民

相比我於 4 月在 Telegram 群組上認識的偉業、5 月認識的同事瑪莉及永達、或 6 月在放映會上認識的大傑，及 7 月在集會上認識的秀麗和樂敏，我可能比較幸運。

早在 20 年前，我就移民來到了 N 國的 Q 城，在這裡上學，工作、入籍。相比他們，今年回流的我少了要在時限內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顧慮、也不太需要從頭認識這座城市、不需要早上 6 時去排幾小時隊申請社保卡、及等待一年才能考車牌種種新移民的煩惱。

在作為移民大國的 N 國，本地人很喜歡在認識新朋友時，或與巴士甚至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搭訕，講了幾句之後，有時就會問 “What is your background?”

是不是，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背景，他是問「你是什麼人？」

以前，我通常會回應 “I come from Hong Kong”，不想被視為中國人的一員，當時覺得這是比較好的回應。當然有時會有人反問 “Isn’t Hong Kong part of China?” 這時只好進一步解釋我們的分別。例如我們有獨特的語言，我們在近二百年歷史裡將東西文化融合了，我們有自己的飲食文化等等。但解釋了，對方是否真正明白，其實都不知道。

那個時代，香港移民雖然在 N 國同 Q 城有不少，但我們之間欠缺有意義的政治連結。每年一次的六四燭光晚會有數百人出席，或可算是該年最大型香港人的行動了。雖然我們也會一直關注、討論香港的消息，但可能大家都覺得海外能做的不多，只有旁觀的角色。

這些都是在 2014 年前，《牛津詞典》還未正式將 Hongkonger 收納之前的事。

也是那一年，我「返到」香港。「返」，海外港人之間，用廣東話提起這一程長途機，通常是這樣說的，例如「我暑假會返香港兩個月」。

關於香港

「你想像中嘅香港，係點㗎？」在《憂鬱之島》片中，這句問題不斷重覆地出現。

簡單地說，就是家鄉。

那裡還有不少親人、朋友。有好玩的地方，有好食的東西，有甚麼需要添置的話，會等到這幾周內瘋狂購物。即使好多年沒有返去，落地後又可能會需要幾日適應時差、移居地與香港有差別（例如搭地鐵要拍卡出閘），及香港出現新地方、事物，但你仍然會覺得你很熟悉這裡。

每次旅程完了要回 N 國時，有時會回顧一下該次回鄉有沒有遺留沒做的事或沒去的地方，然後跟自己說：「下次返嚟再去。」

那一年返香港本身只計劃短期逗留，但沒多久就遇上雨傘革命，身為這時代的香港人，或許沒有其他時間，會更想親身在香港經歷這場當時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最大型的社運。我可能比較幸運。

廿多歲的我在金鐘第一次強烈感受到香港人對這片土地的愛、及香港人之間的手足之情，是第一次看到彼此。是的，感受到甚麼是 Hongkonger 了。

於是本來的逗留變成了回流，當時想用更多時間，去了解這座城市，包括她的好與壞。

一直都知道香港充滿各種問題，真正住下來，這些問題也就共同需要面對。但當下會覺得，既然香港再成為了家，不再是想像中的地方，就會想一起去找問題的答案，想令這個家變得更好。

這也不單單是我的想法，3 年前，數百萬香港人都是這樣想的。那段時間，幾乎每時每刻，同 2014 年一樣，我都感覺到大家就在身邊，一個眼神，一個用字上的差別，大家就再度看到彼此，我們大家就是 Hongkonger。

可是，無奈地儘管我們很努力，問題也未能找到答案。面對我們的家繼續沉淪、被打壓，變得不再是從前熟悉的那一個家，很多人開始考慮離或留的問題，

關於離散

大學時，認識一位香港人同學，她跟我說她讀 Diaspora Studies。無知的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字，經她一番解釋，最終才大約理解為猶太人的二千年建國之路及巴勒斯坦難民在其他國家的現狀之類的研究。當下沒有一刻想過，我們有一天會成為研究對象。

現在回看，離散的意思，可能就是離港那一刻，當你看著飛機窗外熟悉的城市燈光逐漸消失，而你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回來，或何時才會回來的感覺。

回到 Q 城的最初一段時間，我以為我不會再多看有關香港的東西，以前關注的一些香港城市探索群組、專頁也未必會再看，免得心癢，免得觸景傷情。一些關於離別的歌，其實我直到現在也不敢聽。

但原來我沒有如想像中減少對香港的關注，反而 Follow 更多香港主題的

Instagram 帳戶（最近找到了幾個關於垃圾筒、跌嘢落地、獅子山和街頭塗鴉藝術的 Instagram）、Facebook 專頁，然後發掘了更多廣東歌，認識更多香港歌手、樂隊（我對於沒有早點認識 per se 同 The Hertz 感到相當遺憾）。

我想原因可能是，你既然不知有沒有回去的機會，反而會更想保持與家鄉的連結，你會很想通過這些 Instagram，看香港的變化，即使你有幾千公里的距離，你仍會想努力貼近她。

而也是離散者的內疚感，令我亦盡量主動關注更多牆內手足的消息，盡一點綿力幫助，我不會想放下香港的他們，無論牆內外的同路人，沒有大家的犧牲，很多香港人無法會得到在海外的這些機會。

有一次，同朋友討論說起為何會有人為了利益或其他東西，而見風駛輊一下改變了立場。瑪莉當下問了，「其實你覺得 30 年後，你會不會成為他們？」

我思考了一會，說「不會吧，當你有認識的人仍在牆內，你經歷過這一切，這不可能發生吧。而且，我很想返香港，要返到以前我們那個熟悉的，2019 年那時看到彼此的香港。」

關於社群

《香港民族論》一書以法國學者 Ernest Renan 的這一句作引言：「一個民族的存在，就是每天舉行的全民公投。」如果這代表我們要每天以行動顯示我們香港人的存在，希望大家會認為我們在 N 國有努力嘗試。

回到 Q 城後，我發現原來在香港人意識崛起後，無論已經移民 N 國幾十年、還是剛來到的香港人，同樣致力讓大家看到彼此。或者就是因為大家都成為了離散者，故更需要一個建立一個社群。

在線上，每天手機上打開 Telegram，十幾個不同主題的群組都會有新的討論，不同年代的移民會問到生活及工作上的小問題、有一些精明消費資訊、亦有一些時事討論，及興趣聯誼性質的聊天，互動其實已頗熱鬧。

而幾乎每個近一兩年來到的香港人，都會有一個記錄新生活的 Instagram，分享移民和日常生活資訊，當然，也離不開對一些香港新聞事件的反應。

在線下，香港人亦已不再是隱形人。N 國和 Q 城都有多個政治性組織針對政客進行遊說工作，或舉辦各種政治取態的集會；有不同的文化組織，將香港電影引入辦放映會、搞書展、市集等文化活動；也有社會服務機構和教會，



辦聯誼活動及訓練班等，致力協助剛抵埗的新移民。

回來後幾乎每個月都會有香港人社群活動，這些活動即使實際政治作用未必很大，但至少可以讓大家碰個面，圍一下爐。

在平日，有時在街上都會看到香港人車上貼著「香港加油」貼紙，在背囊貼著黑色洋紫荊旗等。至少，對比十年前，我在街上或地鐵上，都聽多了廣東話。

而且，這裡的香港人亦努力令其他人也看見我們。例如不少港人都有一同出席聲援烏克蘭人的集會，同維爾吾人一齊到中領館門外示威，也很積極主動與身邊認識的 N 國人提起近年出現新一波移民潮的原因。

這些微小的動作，其實都是建立社群的一步。大傑早幾日跟我說，他發現每次有 N 國人向他提問香港的事，原來都是他的一次自我學習機會。為了解答他們的問題，你會需要看更多資料，過程中令自己更加認識香港的歷史、文化。而且隨社群壯大，我們現在還可直接提供體驗機會，如帶他們到市集走一轉。

以前我通常以“I come from Hong Kong”回應“What is your background?”從今以後，我可以直接說“I’m a Hongkonger.”因為我知我們都在這裡，被人看得見。■

抗爭 /

由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的融合 走到大同世界主義

文/張嘉莉

視覺藝術工作者，策展人，前香港灣仔區議員，現居英國。會返香港嘅。

香港的「大中華派」曾與本土為先的「本土派」對立。2016年6月4日，自由亞洲電台曾邀請當時的本土派領袖梁天琦與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對談，了解雙方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看法和立場。

鄒幸彤在節目中直認自己是「大中華膠」，指兩派都想為香港爭取民主，只是大家的策略、分析不同：大中華派認為在中國民主化之時，香港才有爭取民主的契機，而本土派則認為在香港人爭取自主獨立的抗爭運動時，這個契機才會出現。大中華派較重視人與人之相同，認為中國內地有不少人與香港人一樣，都渴望建立民主制度，有不少維權人士堅持抗爭，只是一直受中共政權打壓。大中華派相信民主社會運動，需要團結更多不同力量，才有望成功。本土派則提倡以香港人優先的政策，強調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差異，從而論述香港人身分。

梁天琦在節目中，則說到他主張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並非種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是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至2016年，中共取得香港主權近20年，但有目共睹「民主回歸」的倡議已經失敗。他假設2047是1997後香港人的另一個重要關口。由於香港人已來不及把中國民主化，繼而容讓香港都民主起來，那麼在餘下來的30年，香港人就只好以最激進的主張去反抗：爭取香港獨立。梁認為，香港人首要是爭取香港的自主獨立，讓民主制度建立起來，進而影響中國內地，而非花氣力去率先建設民主中國。再者，梁認為視乎人民的質素，民主制度亦有可能令極權得到認同，形成多數人的暴政。節目主持補充道：本土派認為中國內地人民被洗腦多年，未必有足夠民意推翻極權，如果香港人口也被大陸人溝淡，縱使有民主制度，也未必能成就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

2016年的對談中，梁天琦還提到有相對激進的一派，才能讓相對溫和的一派得到多一些空間去行動。

不過，這已成往事。

梁天琦因 2016 年的「魚蛋革命」而被告暴動罪。今天雖已出獄，但仍受嚴密監視，出獄後沒發表過公開言論，而鄒幸彤則因六四集會及支聯會的工作，被控煽惑罪及違反香港國家安全法。「激進」也好，「溫和」也好，在 2022 年的香港，再沒空間行動。2019 年的香港大革命後，中共已不分派別地全力打壓香港人。梁天琦說的 2047 年死線，提早了二十多年壓到香港人頸項。

2014 年雨傘運動的口號「我要真普選」，在提出真普選訴求之際，亦強調「我」這個身位。無可否認，雨傘運動為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認同揭開了新的一頁，但當一個個體在言語間，每每都要重複使用「我」這主語，似乎對自己的身分還是欠些自信。

相反，在自我身分充分確立，「當家作主」之時，就更易直接講出要求、喊出口號，而這就是 2019 年出現的「香港人」。2019 年香港人在極權打壓之下、患難之中，進一步確立香港人身分。「反送中運動」除香港境內的街頭抗爭，也有許多面向國際的文宣。身處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用力向各國政府和人民說出香港的抗爭情況、中共政權違背國際條約的可恥，展現「香港不是中國」。

「香港人」主體性的鞏固，一邊廂與中共政權劃清界線，另一邊則再向外走，以香港為本位，連結世界各地擁抱民主自由的社會。即是，同時強調人與人之相異及人與人之相同；同時做到 2016 年本土派及大中華派所強調的兩個不同方針。

這個在 2019 年之後重生的「香港人共同體」，有能力在不喪失自我的同時，與其他個體互動、連結。箇中原因包括加入抗爭的香港人人數在 2019 年猛然上升，令整個運動有更多能量從多方面進攻，而不囿於單一方向發展。

不過，善於統戰的中共絕不遲鈍，看見香港人主體如此立體地樹立起來，中共知道香港公民社會、新聞媒體，必然是個威脅。於是中共迅速瓦解所有民間團體、強加國安法於香港，毫不掩飾地採用軍警治港。過去幾年間，不少香港人如水流徙到海外，包括英國、美加、台灣等地。身在海外，香港人與其他同病相連的人民容易投契，也更易看到各地政府打壓民眾的手法之相似，以及中共與其他極權政府的扣連。



緬甸藝術家 Sai 展示《消失的踪跡：其一》（右方）及《消失的踪跡：其二》（左方）。其一是他父親於 2020 年 8 月請他拍攝照片，以準備即將在 11 月舉行的選舉。在一系列照片之中，這一張似乎有不好的預兆。2022 年 1 月 28 日，父親因四項獨立的貪污罪，而被軍政府判處 16 年徒刑及苦役。其二中的臉部的織物，是以傳統撣族地毯圖案為特徵，是由被政權綁架的政治犯的衣物製成。藝術家問：「緬甸的問題總會被掃進地毯底，眼不見為乾淨，然而，當我們自身就是地毯，你還能將我們掃進地毯底嗎？」

今年 5 至 6 月，筆者於英國聯合策劃了「24901 哩紅線」藝術展覽，以赤道之長比喻中共政治審查紅線遍布全球。展覽從香港藝術受審查的故事開始說起，延伸至展示奶茶聯盟中緬甸和泰國的政治狀況，邀請了來自三地的藝術家參與。其中一位參展的緬甸藝術家 Min Ma Naing 除了展示一系列緬甸抗爭者的人像攝影和故事，還特意把抗爭現場的裝置帶到展覽場地：把軍政府首領敏昂萊的頭像貼在地上讓人民踐踏，懸掛緬甸女士穿着的傳統半身裙，阻礙迷信經過女性裙下便有惡運的士兵前進。

另一位來自緬甸的參展藝術家 Sai，則展出兩幀攝影作品，訴說其父面對的政治檢控及他偷偷探望被監視的母親之情況。他分享說，流亡海外與不同人士講解緬甸人的苦況時，發覺香港人是最明白自己的一群。談到緬甸於 2020 年的街頭抗爭，他說示威未被逼武裝化前，緬甸人都有參考 2019 年香港的街頭抗爭手冊。另外，緬甸軍政府除了有中共政權的支持，而且一直以來都有派遣軍人到俄羅斯受訓，緬甸境內還長期有俄羅斯駐軍。中俄也一直從緬甸拿取不少天然資源。聽到 Sai 詳細講述緬甸軍政府與中俄的關係，筆者就更清楚看到中共和俄羅斯如何透過長期支援另一些相對細小的極權政府，以換取當地資源去鞏固中俄本身的政權。Sai 和筆者都認為，西方社會積極支持烏克蘭人民抵禦俄羅斯入侵，就不能忽略俄羅斯正從甚麼渠道得到支援和資源去鞏固其霸權。眼看各極權政府早已用心結盟，形成邪惡軸心，各地受壓迫的人民必須相互支持，才有反抗的機會，身處自由國度的人民如要保衛其自由民主價值不被侵蝕，也須盡早提高警覺。

上月，筆者參與了一位白羅斯年輕藝術家 Aliaksandr Vialitchanka 的參與式創作。他現正以政治難民身份在波蘭的藝術學院進修，但念念不忘仍處於白羅斯監獄的友人，廣邀不同地域的人士帶上好友的迷你人型紙公仔，去世界各地遊歷並記錄拍照，再由藝術家把參加者提供的圖像和影片剪輯成錄像作品。作為參加者的我，手執人型公仔，感覺身負重任：沒有坐牢且身處於自由世界的我，究竟如何才可幫助仍在白羅斯或香港面對政治打壓的盟友和同伴？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藝術家特意安排視像會面，向參加者訴說白羅斯的政治狀況和解釋友人被政治檢控的因由。他們坐牢是因為在白羅斯組織了名為「只要食物，不要炸彈（Food Not Bombs）」、為無家者提供食物和衣服的行動。荒謬的是政權並不承認國內有貧窮飢餓等問題。此外，政權亦針對公民組織的形成。人民透過任何維護公義的行動而組織起來，對極權來說便是威脅、是「計時炸彈」。橫蠻無理地解散公民團體、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公民團體的理事人，不正是港共政權在 2019 年後在香港忙著幹的事情嗎？

筆者於 2022 年 6 月 12 日帶了白羅斯藝術家的友人紙公仔參與英國錫菲（Sheffield）的 612 街站。



我們看到當今之世的極權政府如何互相支持、鞏固勢力：緬甸和白羅斯極權政府背後均有俄羅斯與中共支持，俄羅斯直接入侵烏克蘭，中共以一帶一路的名義奪取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又撕毀《中英聯合聲明》，以軍警政府打壓香港人等。極權政府希望其國內的人民被孤立，缺乏外力聲援，而被壓迫的一群，勢孤力弱下就必須有策略地團結起來。在「國際線」中，我們看到的不再只是「大中華派」或「本土派」，而是有明確香港人身分的「大同世界」主義者，他們擁有清晰的香港人主體，了解自身族群與其他族群之相異，但又積極地與理念和價值相同的族群連結。近期在各地支持烏克蘭抗俄的示威中，就不難看見香港人的身影和旗幟。

在「由《義勇軍進行曲》步進新的香港共同體」一文中我曾經寫道「香港人共同體正在建構一個全新的『第三空間』，這個空間存活着香港文化生命體：是液態的、是帶著多維度的動能（momentum）繼續演化的、是傾向與其他擁有相同理念的個體連結的。因為流動，它能夠靈活地，把在香港實體境內因被打壓而遭排擠的元素，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發光發熱。這個流動『第三空間』的『勢』度，似退還進。」筆者深信這個香港人液態共同體，能繼續有機地凝聚和演變，等待下一個大擊反攻的機會。■

評論·時政

倫理 /

海外抗爭倫理之失範與重構 ——世界港人的意志共享及相互制衡

文 / 柳廣成

some drawings. Based in HK/Taiwan.

反送中後三年，各種紛爭漸現。即使人民如何試圖包容忍讓，但「兄弟爬山」主張的互相保留批判之妥協空間，似乎早已壓縮至超越臨界點，從而使三年後的今天爆發了種種事件及輿論批判，「槍頭向外」理論亦因分歧之強而漸失暫緩或和解之效。到此時此刻，我傾向認為種種衝突或許仍會陸續顯現。

在未來為每件獨立事件檢討雖仍具積極意義，但或許是治標不治本。我們該要針對更核心的問題：檢視海外抗爭倫理如何失範，以及如何重構。

海外抗爭倫理如何失範，導致猜疑及紛爭？

（1）失效的民間組織監察

三年間，不少海外民間組織陸續開設，在各處山頭林立。初期港人當然會傾向認為這是一種百花齊放，很是鼓舞。但在眾多組織一段日子的運作以來，或許我們都要理解，紛爭的開端或許是源自組織內外的倫理漏洞：

在海外，因目前仍不存在連結世界各地港人、針對香港事務的議會（可理解作並不存在影子政府），因此海外抗爭的其一路線便是走向建立海外各種民間組織。

然而，民間組織的建立只需基本符合當地法律即可。當中不一定需要對外界積極透明的內閣遴選（主要向主管機關提交會員名冊）；組織宗旨亦不需要太多對外的積極論述（章程草案主要向核准立案的部門交代，而成立後的執行監管，基本上僅需要由主管機構檢視其是否有遵照相關法例）。基本上只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有意成立，跟足設立規範和程序，就基本上已經可以產生。而當中的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之權限，亦僅限組織內的會員，而非開放予所有港人。

香港境內議會制度全面崩壞，以海外民間組織的形式尋出路是無可奈何。然而，即使是如此無能為力的現狀，民間組織在倫理上仍不可免責於人民對其「認受性」及「代表性」的檢視。

因上述提及民間組織特性，只要不觸及法律紅線，非組織成員之人民對這些民間組織並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管道對其作出有效監察。多數此類組織並非建基於或依附於國外議會，政治上的實際影響力或許不大，但仍有舉辦民間活動的號召力、組織資源分配的決定權。因此，組織仍某程度掌握代言港人意志的力量、向外界論述港人理念，從而影響海外民意，因事實上，海外非港人之當地居民會傾向預設，有關組織正代表著「香港人」的整個族群。因此如若把話說白一點成「海外港人民間組織可左右未來香港抗爭運動」，並不為過。

人民對這些民間組織的監察期望亦多數是在理念及道德層面。而人民對其理念的質疑，因上述提及的因素，只可透過輿論對組織作道德及聲望上的牽制。但其牽制卻無法啟動組織內部的任何問責制。只要組織有意，大可持續一意孤行，繼續作出違背輿論之行動（即使組織相信自己是真切為港人謀求出路）。



（圖片來源：愛民頓之友）

種種活動的執行失誤（如英國「612 嘉年華」事件）、組織成員在個人政治或專業倫理上出現不恰當行為（如王俊彥假新聞事件）等情況，便由此漏洞產生。但由於出現上述情況後，目前並未留意到任何組織因此解散，或有組織成員被罷免，這不期然觸發民間進一步的不滿，例如認為民意被騎劫、被代表、被大台化、話語權被霸佔、搶光環卻無上訴空間等等。

成立民間組織的權限基本上人人皆有（當然要看海外移民者的居留權限和犯罪紀錄等），若有不滿，當然可另起爐灶。但如果又有另一群人不滿這個新的組織，又該如何？持續成立新組織，卻不需向人民負責及承擔任何錯誤後果，便是「兄弟爬山」的窮途末路，組織與組織或人民之間無法直接溝通，只能訴諸輿論。而這種輿論卻也只能以倫理道德觀來牽制施壓，如若組織「意見接受態度照舊」，到頭來便是激化的紛爭，且失去有效的解決方案。

（2）「人血饅頭」論

提及此詞，並非出於要指責誰在吃「人血饅頭」，而是指出其理論如何構成人民之間的信任問題，繼以相互誅心，最終淪落為相互猜忌彼此如何牟財利己，忽視資本充權帶來的實際可能性，窒礙未來港人的抗爭空間。

上述提到，因人民監察失去制度依據，目前只能以輿論牽制。然而輿論多數以政治倫理道德觀出發，而「道德」本身就是難以量化的標準。其中以「人血饅頭」論為甚，許多批判皆由其為起始點。然而，我們不難發現「人血饅頭」的批判時有矯枉過正，原因正是其標準的模糊及浮動。

何謂「人血饅頭」，每人心目中皆有不同定位。其中最為極端苛刻的「人血饅頭」論，會認為一旦牟利便是吸「人血」。因此，人民的輿論牽制力度對民間組織而言有可能過大（雖不至於直接決定一個組織的存亡）——強烈的道德批判，會引來民間組織不必要的民意顧忌，導致「不做好過做錯」的消極心態。

或許這種「冤枉好人」的情況其實並不常見，但其他組織也可能會觀察不同事件帶來的負面迴響，並希望自身可盡量迴避。而如果他們對這些事件的歸納稍有思辯上的不慎，便會輕易掉入「維持現狀較好」的思考陷阱，以致只做目前輿論認可的工作，因過多顧忌而失去思索另類方案的積極性。雷同的活動方案在長時間重覆卻無甚作用後，最終又會令港人疲乏，對「維持現狀」的消極心態作更強烈的批判，形成惡性循環。

那，如何重構海外抗爭倫理，建立信任？

因海外抗爭運動多以政治倫理道德觀來進行輿論牽制，就目前狀態而言，可說正面對「規則真空」的狀態。

要解決所謂規則真空，當然亦有人提及「影子政府」，但目前要實際成立或許仍很困難——港人目前不信任的，正是制度，而其不信任的取態，大多與過往人民對香港議會及泛民政黨作風的負面印象有間接關係。如何以無懈可擊的論述及尋找一群具民望和信服力的人選，來協助成立所謂「影子政府」？其成立細節又如何服眾？我相信目前仍有困難（且，要在何地成立？有機會通過註冊嗎？），而其困難或許多源自人民的不信任。

因此，要優先解決的或許是信任問題，亦即在規則真空下先重構抗爭倫理。

（1）不濫用「兄弟爬山」、「不分化」、「不割席」

提出「兄弟爬山」，從不應該是為迴避檢討、交流及責任。其真義應該是基於持續的歸納及討論，在各方見解處於五五開、僵持不果後才分裂出各種可行路線，暫緩及保留對彼此的批判，直至各方路線經實際驗證清楚利弊後，再重啓批判，經詳盡的意見交流，才重新回歸「兄弟爬山」，各自繼續實踐，而非在輿論顯然一面倒的批判下，拒絕接收人民意見。

事實上，歷來的民間組織在面對輿論紛爭時，確實較少針對性地回應各種批判論點，而是簡單一句「兄弟爬山」、「不分化」、「不割席」，期望彼此只要能確認共同敵人，人民便有義務包容其不足。

民間組織的不完美當然是人之常情，香港的抗爭史，比對捷克、烏克蘭等國家，仍是年輕。然而，真正導致分裂的可能並非錯誤本身（當然若是重大過錯，仍會直接失去人民信賴），而是錯誤後的處理手法——檢討意圖欠奉，相關人員從未須要承擔明顯後果（如被罷免），令人民的義務包容漸超臨界點，逐漸將「兄弟爬山」等字句視為口號式的擋箭牌。

當然因規則真空，罷免亦非現實選擇，且人民亦有其焦慮——肯為港人行動的人在三年間陸續低調退出，每個仍在各方努力的人，均是珍貴的抗爭籌碼，不容輕易丟失。這亦是輿論反彈雖強烈，但亦未至於要趕盡殺絕的原因。

既然民間組織主動退位讓賢不大可能實行，那就需要其自身積極釋出溝通與檢討的誠意，包括在活動內增設人民參與討論的機會（非百分百由活動主辦方填滿流程，而是下放權限以釋除人民對其代言及騎劫民意、霸佔大台、話語權、搶光環等嫌疑。我個人明白，並非所有民間組織成員均直接經歷反送中運動，且可能部分成員或已移民多年，對港人之社會體驗或有距離感，因此對政治靈敏性或會有不足，以致不理解港人對組織之強烈批判背後的原因——如 97 至今，人民對泛民作風漸失期望，由 2014 年起更是極度不信任，故令公眾對一些組織的運作容忍較少、質疑較強。

因此，對不完美的體諒及包容，有時亦可是從上而下的，否則人民易將組織的不完美及其後的避嫌言辭與港共政府常強調的「包容」重疊，致使進一步的不信任。或許可在活動前多作質詢，令活動理念做到港人共享，而非僅局限於組織自身的宗旨。

(2) 精煉「人血饅頭」的標準化共識

「人血饅頭」雖是基於道德的批判，但我個人仍相信其道德可某程度標準化。而這需要民間組織與人民共同努力思辯，民間組織需檢視行動在牟利及公共效應間的正向平衡（對抗爭的積極效果要多於利己效果）、人民對抗爭行為的批判亦需調整尺度，以免矯枉過正。

這或許需要我們首先接受一個事實：「人血饅頭」不見得是在組織的規模才會出現，它亦可以是出於任何平民個體。

先以香港語境定義「人血饅頭」：利用抗爭者之犧牲謀取個人利益而沒有回饋抗爭的意圖。說到此，或許需要舉更多實際例子：

(A) 販賣抗爭主題產品

我個人認為，不應否定「抗爭主題產品」能夠作為抗爭精神的符號帶入生活。雖其效應微弱，但長遠而言，亦算是信念的潛移默化——它或許可在一個家庭中跨世代傳承其普世價值精神；何況有些流亡海外者來自基層，亦需要市集之類的平台與港人社群連結和取得輔助。

然而，販賣此類產品，因依賴的是抗爭運動，在收益及貢獻方面需達成平衡（如販售方的產品質量、事後的捐款等），而買方亦可監察賣方會否有謀取暴利的意圖，如有，這時刻才出動「人血饅頭」論，亦不遲。

(B) 民間組織或 KOL 接受捐款

概念其實與 A 近似，但捐款與 A 的買賣行為略有不同：

民間組織要接受捐款才能維持恆常營運，因此，收受捐款本身並無問題。問題在於，獲得金錢後，有否積極作相應行動，達成抗爭語境下積極正面的效果？

利用捐款舉辦活動時，要確保外界能理解其活動宗旨。最近常被港人詬病的，是組織聲稱要傳達的理念與實際效應不符，如活動性質與特定日子象徵之性質衝突；過往活動對嘉年華所蘊含的某種「慶祝」意味不合港殤事件的嚴肅，會否對港人的集體情感、事件定性及未來抗爭心態造成傷害？組織理想中（或聲稱）的公共效應有效嗎？會有被誤解的風險嗎？如有，是否存在其他更能被廣泛接受的方式，減少公關枝節，讓各方理解其理念？

其次，或許組織亦可加強透明度，讓人民感受其知情權受尊重——資金流動詳情為何？如有向其他第三方組織捐款（如細葉榕），可否透露款項（當然因私隱問題，不是要精確至披露受助者身分，而是組織在整體資源分配的大概百分比）？相信人民亦並不定期望非常精確的數字，但至少會想清晰理解自己的捐款如何被使用。

（C）保留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精神

當「人血饅頭」論如同「兄弟爬山」被過度濫用，則會演變為一種誅心論，如「表態是為取光環」、「黃店貼文宣是為牟同路人之力」、「加入海外政權是為更高收入」等等。當然不排除這些可能性，但至少公眾要在觀察其公利與私利的平衡後才加以批判。如未確認對方實際貢獻就猜測動機，那就與「捉鬼論」無異。過激的猜忌只會如文革批鬥般令真正有意貢獻香港的有志之士因怕非必要的輿論壓力而退卻，使整個抗爭運動得不償失。

總結此文，因海外針對香港事物的議會制度並未產生，民間組織現時沒有強力監督模式，加上過往不同事例，造成目前的分裂狀態——歸根究柢，上述均源自信任問題。我個人傾向認為，民間組織因懲罰機制欠奉（僅限於輿論壓力），需要承擔較多公共責任及義務——多受質詢、解釋、檢討以及包容民意。重構信任後，才能彼此確定政治上的道德合理性。在規則真空中尋求以目前仍倖存的道德倫理觀，以道德限度制約，容許人們對民間組織的政治相關行為進行道德評價並提出要求，而民間組織則在道德倫理上加以完善，主動釋出誠意，爭取彼此信任，以達成世界港人意志共享及相互制衡。在信任重構後，人民才能真正期待民間組織往後有積極行為，願意加入以壯大抗爭勢力。■







評論·文藝

大舞台/當中華膠變成麥高維治

攝/高仲明

文/蔡慧敏

香港人、傳媒工作者。現居台灣，希望在自由的土地上繼續發聲。

講起「大中華膠」，香港網民會把它等同於支持「民主回歸」的民主派人士。他們相信香港的前途繫於中國民主化，就算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仍堅持中國和香港是命運共同體。「大中華膠」如今垂垂老矣，但在八十年代初，他們曾是挑戰（港英）政權的熱血青年，大中華思想就是當時的浪漫和理想。只是在時代洪流下，這塊膠不能避免地老化、褪色了。

「膠」的特色，在於變幻原是永恆，會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而流動。「大中華」有時是個夢想、有時是獨裁者愚民的工具。1949 年蔣介石敗走台灣，念茲在茲要反攻大陸，遂把自己的春秋大夢強加於台灣之上。對於跟隨國民黨流落台灣的外省人來說，「反攻」等同於回家的願望；但對於本省人和原住民來說，教科書上的長江黃河海棠葉與我何干？大中華完全是來自火星的概念。往後整整半世紀，蔣氏等同於威權。學校、法院、政府機關必有「蔣公像」鎮宅——其實就是關二哥的概念，黑白兩道，莫敢不從。

然而神像也有生鏽的一日。2000 年，台灣出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去蔣化運動漸次展開。除了備受爭議的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的牌匾在 2007 年改為「自由廣場」之外，那些年幾乎每間學校、每個機構都上演過這一幕：以往總統就職要參拜、平民路過都要肅立敬禮的蔣公像，一個一個的消失了。移除蔣公像，成為了轉型正義的一部份。這些畫面其實並不陌生——90 年蘇共倒台，東歐人一湧上街，第一件事就是把獨裁者的銅像拉倒、粉碎。多得李登輝的寧靜革命，蔣公像才得以全屍而退。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本來就與尋找族群身份、本土思潮不能分割。威權既倒，標誌著大中華思想在台灣已走到盡頭。

被拆下來的神像該拿去堆填還是焚化？垃圾處理也令人很頭痛。它們最終被送到桃園大溪的蔣介石的陵寢。慈湖紀念雕塑公園的環境優美，但有二百多個蔣公盯著你，還要漆上不同的莫蘭迪色，整件事就變得很滑稽。原本被膜拜的神像，成了被玩謝的麥高維治。其中一座的簡介這樣寫到：「1979 年，高雄應用大學在順應時代潮流下，耗資 26 萬元，打造相貌和藹、手持拐杖的蔣公銅像，設立於校園中心，並在一旁設立升旗台，讓師生每日都可瞻仰偉人德澤。隨著校園操場落成，升旗台遷移，校舍改建，2004 年將銅像捐出。在時代變遷下，銅像的意義也走進了歷史記錄之中。」「大中華膠」今天看來可笑，唯坦然面對，而非遺忘與忽視，才能防止將來的不義。■



評論・文藝

四手聯彈

畫 / Justin Wong

vawongs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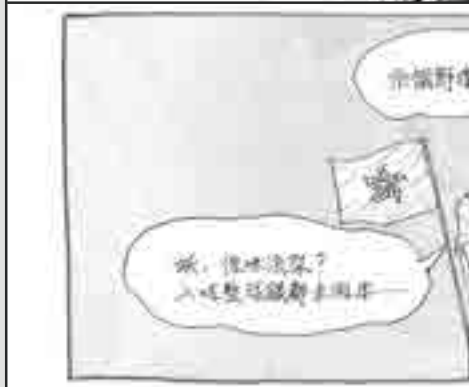
日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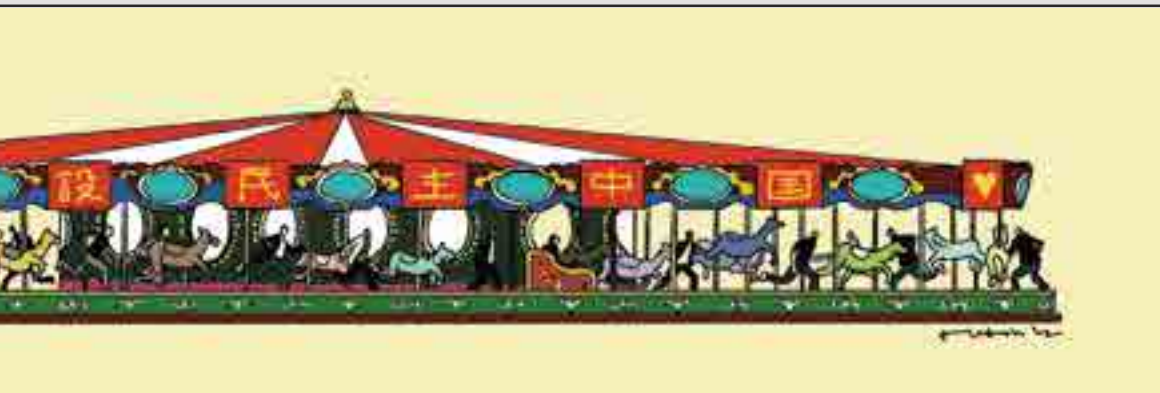
柳廣成

歡迎蒞臨大中華樂園！園區內有多種遊樂設施，任君選擇，你可以坐上旋轉木馬體驗民主中國的美好，透過電流急急棒感受緊張刺激的氣氛。如果想玩小遊戲，擲彩虹和推銀機肯定可以滿足你的要求！遊樂設施應有盡有，為你帶來最夢幻的大中華夢！■



© vawongsir







評論·文化

書評/向中共學習 製造香港、台灣軟實力 評《中國軟實力 China Soft Power》

文/六月

一個停留在六月的海外香港人

孔子學院、親中媒體、肩負大外宣重任的小粉紅……這些名字也許對許多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在西方國家、香港、台灣和國內不斷培植的政治工具。從學術上來說，這些工具在西方國家成為了中國「軟實力（Soft Power）」的輸出。近年，不少專家均對於這些軟實力不以為然，認為中國的大外宣處處碰壁，招來許多西方國家政府及人民的反感。然而，政治學者瑪麗亞·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卻認為中國對外的軟實力其實並非如預期中的軟弱。這些大外宣其實影響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體和人民，令他們對中國產生良好印象。

喬治亞州立大學全球傳播學教授瑪麗亞·雷普尼科娃在今年2月出版新書《中國軟實力（China Soft Power）》。這本書收錄於劍橋大學出版社的 *Elements in Global China* 系列，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靜君教授負責編輯。雷普尼科娃在書中列舉四個重要的中國軟實力輸出方式：（1）具爭議性的孔子學院、（2）中國在國際媒體的影響力、（3）中國對外的文化教育政策和（4）公共層面的外交政策。這四個範疇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中國的「軟實力」，到底是軟弱無力，還是強而有力？

一般外交專家都會認為「軟實力」是指對外宣傳。例如美國的國際形象是民主、自由與維持國際秩序的正義之師。這些對外宣傳都有助合理化和正當化美國對許多極權國家的外交干預。當然，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些美國的外交干預是威脅他們國家主權的行徑。然而，當美國透過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來描繪他們的對外形象時，不少人會對美國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這就是「軟實力」的對外宣傳力量。那麼，中國的小粉紅、媒體、教育機構有為中國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對外宣傳出口嗎？

不少學者均會認為這些中國「軟實力」的輸出在西方國家已經大不如前。反之，透過一帶一路和其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協作計劃，這些軟實力的輸出不論在網上或現實世界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影響，令不少政體依靠中共政權。然而，雷普尼科娃提出，對於中國軟實力的效用，不應只集中思考「對外」的力量。這些對外宣傳的工程，也是鼓動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團結 14 億中國人民的政

治力量。所以，這些「軟實力」工程所帶來的影響，是包括「大外宣」與「大內宣」的政治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軟實力」輸出與他們的環球經濟鏈是相輔相成的。透過與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中國也有效地輸出他們所描繪的「中國文化」和價值。因此，軟實力與經貿關係（硬實力）是息息相關。

觀乎中國政府近年在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經貿及基建工程，以及對於西方國家近年對中國產生的戒心和敵意，不少學者均認為中國的影響力已經從已發展國家遷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也是雷普尼科娃在書中的結論。然而，筆者認為，中國對所謂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地的軟實力輸出，並非如許多學者認為的軟弱無力。反之，中國政府透過各地唐人街的老華僑組織，例如一些同鄉會，不斷鼓動已歸化當地社會的華人支持。這些華僑組織也會與領事館密切聯繫，並透過支持當地參政華人政治領袖，在民間和政治體系各層面作大外宣的滲透和影響。





上述情況，筆者在加拿大、美國和英國均有所觀察。而筆者認為，雷普尼科娃等政治學家對於「軟實力」的定義，依然只集中分析中國政權的直接國家機器操作。這種「政體中心 (State-centric)」的思考框架會缺失中國在西方國家，透過非政府組織產生的文化滲透與「軟實力」工程。當這些組織進一步把當地生活議題，例如對華人歧視問題，直接與西方對中產生的敵意畫上等號，以圖令中國的「受害者」論述更容易打入當地社會左翼浪潮。與此同時，不少香港移民亦因對這些左翼浪潮反感

而轉而右傾，集中支持右翼候選人，變相令香港議題政黨化和右翼化。中國共產黨則樂見香港議題變成當地社會爭議，令西方國家無法達到跨黨派共識對抗中共。

那麼，流散者在這個年代該如何自處？我認為雷普尼科娃一書提到一些值得參考的重點。第一，讓宣傳機器本土化。雷普尼科娃提到，中國不少媒體在海外的分部都出現本土化現象。這裡指的是員工架構上，讓更多非中國人參與運作，從而讓中國的大外宣可以打入當地社會。



2021 年 11 月，英國倫敦唐人街有「反種族歧視」集會舉行，不少已歸化華人出席。集會上多位講者發表親中言論。

今天的香港流散者亦應當思考如何讓香港議題在當地社會本土化，讓非香港人都能夠理解和關注。例如，香港流散群體中，能否有一些企業專家，在行內有效地發出在中國的投資風險評估？流散海外的香港人能否與其他移民權益團體合作，透過共同參與公民運動，在公民社會產生影響？

第二，讓語言和文化成為政治載體。雷普尼科娃書中提到的孔子學院，在許多地方都是透過語言課程，吸納非中國人報名參與。香港流散者能否在外建立廣

東話語言的學院，用以宣傳反共訊息？台灣流散者能否建立國語語言學院，讓當地非華人可以報讀並學會國語？

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雷普尼科娃的這本書，除了可以充當分析中國軟實力的參考書外，也可以成為流散者思考如何製造「香港軟實力」、「台灣軟實力」的藍本。■

評論·文化

電影 / 愛國片不一定都是爛片， 但為何中國的幾乎都是？

文/紅眼

專欄作家，影評人。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正職寫小說。

🇨🇳 睇番真實歷史係點，更顯得他們根本就是在打飛機

18

🇨🇳 呢段片評算唔算煽動，令人唔入場唔愛國🇨🇳

1



👤 我想，《集結號》（第一集）比佢好睇好多，起碼有合理理性及真實的劇情與人性的深刻刻畫，呢套，似乎旨在宣傳某一點息吧了！

👤 睇你的文字，至少知道你有中肯的技術評論。要支持下你（利申，我沒看——思想、情展和現實上都不算是中國人，冇入場（亦有上串流平台）睇的動因）

目前全世界最密集、最賺錢地生產愛國電影的地方，毫無疑問就是中國。舉例說，以 1950 年代中國人民志願軍援朝抗美、遠征千里，打倒外國勢力為題材的史詩式戰爭片《長津湖》及續集《長津湖之水門橋》（下稱《水門橋》），便無懼疫情，分別成為中國 2021 年國慶檔及 2022 年賀歲檔的愛國大片冠軍，而且《長津湖》還挾慶祝中共建黨百年的聲勢，作為振奮人心的「中國勝利三部曲」之一，肩負著許多政治重任。順帶一提，另外兩部是劉偉強執導，以武漢抗疫為題的《中國醫生》，以及周迅、梁朝偉主演，描寫二戰期間中共地下黨默默為國捐軀的諜戰片《無名》。

只計中國市場，《長津湖》與《水門橋》兩片票房共收近 100 億人民幣（香港公映票房亦進帳超過 2,000 萬），而今年荷里活最賣座的電影《壯志凌雲：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賺盡全球票房也不過 13 億美元。中國電影贏了漂亮的一仗，對吧？

由徐克、林超賢和陳凱歌三巨頭聯手執導的《長津湖》，其實與續集《水門橋》同期開拍，由於最終徐克執導的部份佔近九成，林超賢和陳凱歌在續集便不掛名，改由徐克署名為總導演。總括而言，這是兩部香港導演有份參與，甚至佔主導角色的愛國戰爭長片。兩集前後相加起來片長近六小時，要完整看一遍

著實花費不少精力，但對某些著重性價比而入場的觀眾來說，則十分划算，皆因片夠長、明星多——儘管全片冰天雪地，每個角色都弄得焦頭爛額，未必看得出鏡頭前那個人就是主角吳京和易烱千璽，用了替身演員都神不知鬼不覺。

當然，電影的主要賣點是戰爭場面浩瀚而慘烈，以不惜工本的槍林彈雨、飛機大炮帶來失禁式視覺享受，襯托這一場中共遠征部隊的「冰與火之歌」。血淚戰曲的第一部，講述中美兩軍於長津湖地區交戰，主角一行人所屬的穿插七連奉命死守，阻擋美軍前進，結果隊員們彈盡糧絕，飢寒交迫，凍成「冰雕」都半步不移，以屍身震懾外敵，算是雖死猶榮。第二部則是敗者復活戰，圍繞穿插七連餘軍又再收到國家任務，要深入虎穴切斷美軍的陸路撤退要點，三炸水門橋。但他們哪來炮火炸橋？就是前仆後繼以他們的血肉之軀，開著裝滿炸藥的大卡車衝落山，甚至親手捧著炮彈近距離引爆。一眾手足視死如歸，但求轟轟烈烈死得有價值。

不過，嚴格來說，冰山火海進進出出的穿插七連從沒打過一場勝仗，說得好聽他們就是藏在勝利背後的一群殉國烈士，為國家的未來盛世而捨身，但說到最白，就是在死傷枕藉的戰爭之中，只要還未死，就不斷被上級「廢物回收」的一堆爛頭卒。

《長津湖》一方面愛國情懷澎湃，另一方面卻受到不少觀眾訕笑，包括批評部份劇情子虛烏有，過度幻想，以虛構的穿插七連英勇事蹟，既扭曲亦粉飾了史實戰況，再延伸到電影創作為求愛國篡改戰爭細節是否道德的激辯。製片商唯有再三澄清，全片僅以史實的某一前線小隊及戰爭英雄作為參照，暗示了這支全員勇武的敢死隊只是移花接木的美麗想像，但如果要講電影不道德，跟管虎執導的愛國戰爭片《八佰》相比，《長津湖》系列的杜撰部分尚可接受。後者最多都只是在細節上鑲縫插針，穿插出一隊穿插七連，借爛頭卒之死頌讚偉大的愛國情操，《八佰》則幾乎從頭到尾——由電影海報開始已經出盡招數，有意混淆視聽。

《八佰》冠名為中共建國七十周年的獻禮片，故事卻是圍繞 1937 年的上海淞滬會戰，講述 800 名臨危受命、披甲上陣的雜牌軍（其實報大數，只有 400 死士）為主力部隊斷後，留守四行倉庫，壯烈捐軀。套路跟《長津湖》如出一轍，但別忘記他們真正身分是 1937 年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於四行倉庫上高掛的、以血肉人鏈捍衛的那一面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結果，整部電影只以極遠鏡去拍攝那面隨戰火飄揚的旗幟，於電影海報上還故意遮遮掩掩，只露出旗幟的其中一角，讓觀眾以為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紅，就是代表新中國

的五星紅旗。如果有愛國觀眾為他們的犧牲而感動落淚，要不就是觀眾不熟歷史會錯意，要不就是戲中角色全部護錯旗、愛錯國。當然都可以納入「台灣是中國完整領土的一部分」這套大論述裡，而且劇本更聰明在將戰略失敗、畏死退兵，讓雜牌軍斷後送死的歷史污名，推了給中華民國政權。賺人熱淚同時輸的其實不是自己，不愧是我近年看過最下流的愛國電影。絕不是貶義，充滿卑鄙計算的愛國電影，才是我心目中精彩有趣的愛國電影。

從《八佰》到《長津湖》，或者已證明中國電影市場有足夠資金吸引最好的電影人，以最高的拍攝規格「投產」愛國電影，戰爭場面拍得好看，但細節幾乎經不起推敲，處處都是失真造假的嫌疑，既有點荒謬，又有點滑稽，甚至令人懷疑是否導演和編劇有意如此陽奉陰違，於主旋律之中暗藏小把戲，陷愛國大片於不義，挖了個陷阱讓那些愛國情緒高漲的觀眾中伏。

就當我一廂情願，或者許多電影人都懂得一些暗渡陳倉的手段，尤其是香港導演。許鞍華拍《明月幾時有》，名義上是講述香港民間自發組織抗日游擊隊，實則呼之欲出，影射的是雨傘革命。陳木勝拍《危城》，故事背景雖是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亂世，但「危城」就是香港。郭子健拍《悟空傳》，孫悟空與一眾猴子猴孫死守花果山，對抗天庭武力

鎮壓，都有一些關於香港社運的隱喻。但玩得最出神入化的人，個人首推徐克。

徐克正是第一批看準合拍片熱潮北上發展的香港導演，但不要忘记他本身就是香港新浪潮代表，是否真的晚年失節，為賺人民幣隨波逐流，替主旋律護航？或者在他那些合拍片、愛國大片之中，總有一些搞怪的蛛絲馬跡。早在十多年前的《狄仁傑之通天帝國》，電影表面上是將狄仁傑塑造成中國古代神探福爾摩斯，其實暗渡陳倉創造了一個虛構的神都洛陽，一個女后武則天所統治的唐朝盛世，暗藏篡改歷史與國運，改朝換代的野心。後來又憑《智取威虎山》奪得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坊間不少人挖爆頭，甚至罵金像獎和徐克一起墮落舔共，居然俯身染紅，為樣板戲抬轎。但細心一看，電影中那隊領銜主演的薯頭民兵，只不過用來襯托威虎山上一眾土匪皇帝，由梁家輝飾演的賊王座山雕才是真正主持大局的掌門人（有些影評人甚至認為威虎山是九龍城寨的借喻）。都是那句，就當我一廂情願，多年後的《長津湖》似乎同樣有意將一眾正面人物塑造成衝動送死的白癡／英雄，故事裡描寫得最立體的角色，反而是美軍／反派的代表史密夫將軍，一個受制於上司、猶豫怕事，身在前線卻最懂得「走位」的真小人。

不少內地觀眾都嘲笑《長津湖》劇情弱

智，認為主角一行人情願凍死都不敢移動，毫不變通，他們不是冰雕，是沙雕（傻屌）。正如他們居然計好方位，於冰天雪地朝著祖國的方向敬禮，對著空氣呼叫新中國萬歲。導演之一的徐克真不知道這些情節很蠢嗎？我傾向相信穿插七連的愚蠢樣板，是有許多臣服於愛國主旋律下的故意搞怪成份，儘管你不能違背愛國電影的宗旨，但可以行禮如儀，間中把幾個音符彈得份外突兀。至少我自己總是在這些被香港觀眾嗤之以鼻的中國愛國大片裡找到許多樂趣，看著他們死得那麼蠢，凍成冰雕，攪炒自爆，或是為了一面爛鬼國旗被機關槍射死，轟成爛泥，戰爭場面愈是嚴肅悲壯，卻愈覺得恢諧歡樂。

當然，這只是我的不正確解讀，也不代表導演的真正用意。不同影評人對愛國電影的看法可以有很大落差，譬如前陣子愛國作家屈穎妍才撰文談及香港票房過億的《壯志凌雲：獨行俠》是美帝主義產物，批評香港觀眾不應崇洋媚外愛錯國。必須承認《壯志凌雲：獨行俠》確是一部刻板的 80 年代美國愛國電影續集，但喜歡湯告魯斯不代表喜歡美國，正如我也覺得剛剛在 Netflix 上架的印度愛國片 RRR 拍得極其好玩，但不會因此愛上印度。RRR 以印度被英國殖民統治的黑暗時代為背景，兩個男主角就像無間道般不打不相識，最後知道彼此是同路人，便化敵為友共同對抗暴

政，揭開印度獨立建國的新時代。電影雖有許多浮誇失實的演出，但在愛國電影的嚴肅歷史主題以外，其實還包含愛情、喜劇、歌舞與懸疑的部分，讓故事及角色有著更豐富的人性描寫。正如在《壯志凌雲：獨行俠》這樣的老派愛國電影裡，湯告魯斯都不會只是一名皇牌機師，他跟《長津湖》的吳京不同，還是會談情說愛，跟隊友暗中較勁，自覺懷才不遇，無視上司命令逞一時英勇。不愛國、會犯錯的人物特質，並不折損電影鮮明的愛國旗幟，而愛國電影亦不一定是爛片，真正出色的愛國電影未必總是把愛國情操放在嘴邊，它可以容許角色不是全天候愛國的，只不過，這種說法於中國不被容許。

反過來說，中國的愛國電影總是大而無當，淪為讓人不爭氣笑了的大卡司爛片，就是這個原因。它最大問題不是拍得差，不是情節薄弱，甚至也不是一味鼓吹愛國情懷，而是愛國以外，這些電影什麼都沒有，步調一致的角色，除了愛國就是一副空殼，故事除了愛國沒有其他內容。一道菜不可能只用一種食材就煮成佳餚，始終需要結合其他配料和醬汁。但因為那道菜的名字是愛國電影，是樣板菜，便意味著觀眾、導演和演員只能硬食。

從事創作和表演藝術的人，甚麼時候會後退到只是言不由衷打份工？就是像

《長津湖》這種追求大陣仗，同時需要大家硬食的時候。要愛國就一味愛國，要大陣仗就盡量大陣仗，跟隨主旋律濫竽充數，不會認真拍、真心拍（反而有可能真心搞怪），同時不顧邏輯，不考慮太多鋪陳和節奏，結果飛機大炮連續轟炸了幾個小時，從易烱千璽報到道參軍到六小時後全隊死剩他一個人，對國家的熱情，視死如歸的覺悟，既不動搖，也從不迷失，連一小撮不愛國的瑕疵都不會找到。或者，中國並沒拍過太多有血有肉的愛國電影，只能交出了大量追求沒瑕疵的「純愛（國）電影」，因為人性就是有瑕疵的，沒瑕疵的愛國電影，其實說穿了沒真正關心過人民，到頭來只是純愛幻想，一個只有意識形態的空殼。■

評論·文化

音樂 / LONG LIVE 廣東歌 從《聲生不息》 看流行音樂與身分的關係

文/日巷

簡介：有時寫字，有時繪畫，介乎文字與圖畫之間的人類。



香港回歸25周年特別獻禮

特別指導單位：國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国际台作司、香港中联办宣传文康部

記得上飛機前睇的最後一場騷是 My Little Airport 的「我都唔知道」。人在外地，夜深人靜瞓唔著的時候都會覺得離港前睇到 MLA 是一件幸運的事。自問不算 MLA 忠實歌迷，「飛」也是朋友臨時有事去唔到轉讓給我的，但睇 MLA 的那個晚上，總覺得自己與周邊的人分享著某一種難以名狀的憂愁，而聽 MLA 的歌是一種療癒。

結束的時候我拍下了大螢光幕上「LONG LIVE」的字樣，到現在都會不時回帶。無論你是否廣東歌 fans，相信總有幾首廣東歌對你而言特別有意義。

「大家都是中國人，不用分那麼細」

香港主權移交 25 年之際，中國芒果 TV 與香港 TVB 聯合製作音樂節目《聲生不息》，以重新演繹「港樂」慶祝香港「回歸」。《聲生不息》表面上是一個音樂節目，但實際上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背後有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絡視聽節目管理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港澳台辦公室以及香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作特別指導，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在節目中發言，可見節目絕不是單以娛樂和慶祝作為出發點，而是一個大外宣，希望利用音樂這種人人都會接觸到的媒介作為滲透，除了可以鞏固「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領地一部分」此類論述，亦可以軟性手法做到「人心回歸」。

《聲生不息》共有 12 期，並設有 7 個

大主題，其中第 10 期更是特別為「回歸 25 周年」製作，名為「港樂與我共此時」，歌單有《獅子山下》、《無言感激》、《中國人》、《東方之珠》等等，把具有象徵性的歌曲《獅子山下》和《東方之珠》與中國人的身分連在一起，而且還向北京表達感恩之心，單憑歌單已能感受到滿滿的愛國心。

看過幾集《聲生不息》，撇除政治因素，節目於我而言不算吸引，皆因內容（尤其是第 1 期）就是不斷唱歌、唱歌、再唱歌，有時加上界分環節，一首接一首，感覺是疲勞式轟炸。而節目想傳遞的訊息非常簡單，就係要話你知：大家都是中國人，不用分那麼細。節目開首便以「香江的詩歌，是『歸家』的引言」作為引子，又把「港樂」形容為「傳奇國貨」，從頭到尾都打著「本是同根生」的旗號，試圖拉近中國與香港的關係。節目組邀請了 8 組香港歌手及 8 組中國歌手在節目上獻唱，有時亦會有特別表演嘉賓。如果仔細了解這些歌手的背景，可以發現節目組在人選上明顯下了一番功夫，中國歌手之一的劉惜君在深圳中英街長大。在節目第一集中她形容在中英街兩邊的港人以及深圳市民就像「街坊鄰居」、「大家都很熟」，之後她又講述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覺得兩地是「因為一個地界的關係，才會覺得有區分，所以回歸之後就會覺得沒有那麼多的隔閡」，言談之間十分強調鄰里之情，並把兩地混合在一起，從中建立一種大家都是自己人的概念，又可以把英國塑造成一個介入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的邪惡第三者。

廣東歌的意義

英國社會音樂學家 *Simon Frith* 在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opular Music* 一文中指出流行音樂有 4 種社會功能，而第一個是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自身的身分（Identity）以及在社會中的地位（Place）。而在建立身分的過程中，表演者、音樂本身、其他觀眾都有一定的影響性。以 MLA 為例，在演歌會之中的人，相信極大部分人都有接近的政治取向，而大家同樣地分享著某些社會事件帶來的哀愁，這些種種成為了各人之間的連結。

此外，音樂是一個可以建構自我身分、甚至是國族身分的媒介。Simon 曾表示流行音樂可以創造出集體認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並且對於民族認同（Nationalist function）有重要作用。林家謙、Mirror 開「騷」，Instagram、Facebook 充滿大家撲飛的動態，都是社會對於廣東歌的關注大幅上升的有力證明，某程度上亦映出市民更重視香港自身的文化，也是對身分認同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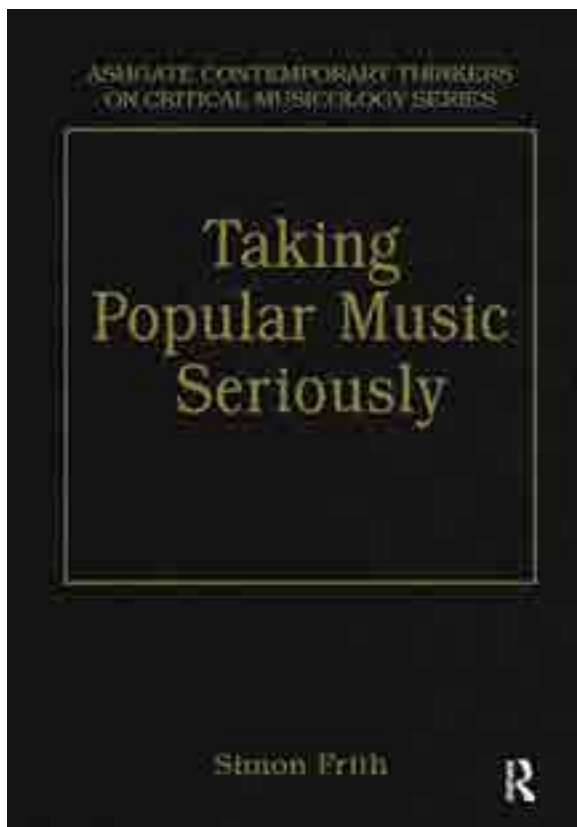
香港流行音樂 作為獨立的個體

《聲生不息》以「港樂」為主題，看似宣傳粵語流行曲，但其實節目不斷地抹去香港流行音樂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並將其納入中國音樂的其中一個分支，藉著重塑「港樂」去消滅「港樂」。

香港的流行文化得以蓬勃發展，其中一個原因定是當時的社會風氣較為自由，而自由正正是中國無法給予香港的東西。但中國卻奪走這些在自由底下孕育出的產物，並稱之為自己的生產，奪去香港的獨特音樂文化。根據加拿大電影導演 Loretta Todd 的說法，在文化挪用的過程中，較弱一方會漸漸失去文化自主性（Cultural Autonomy）。而文化自主性可以用以標示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一個人的起源和歷史。《聲生不息》重塑「港樂」某程度上是在抹去香港流行音樂文化自身獨特性，同時也是除去香港人這個身分，宣告「香港人」不可能獨立存在，你是香港人的同時必須是一個中國人。

記得多年前在海外留學時認識過些日本朋友，當時有一位女生說過想要學習廣東話。「NO!」作為香港人的我們異口同聲地說著，並指學普通話更加有用。日本女生當時有點不解，為何我們有如此反應。我不時都會想起這件事，現時的取態當然也有所不同。後來反思，發覺以往的教育多不是以香港本位作為出發，使得大家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自自然然不會去珍惜。

香港確實有自己的文化，這是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去找尋的，以香港自身作為出發點，而不是活在中國的巨大陰影下。希望廣東歌有朝一日能夠以自己姿態「LONG LIVE」。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opular Music 一文收錄在 *Simon Frith 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 一書。

評論·文化

飲食 / 追尋完美之茶杯、 或曰 2022 年的正宗

文 / 木子雨

旅居柏林的文化工作者，生活就是透過無間的翻譯與重寫尋找回家的路。



一切都從尋找一只完美的茶杯開始。

搬家的決定來得很倉卒。塵埃落定，以為我終於可以好好坐下來喝杯茶了，才發現自己需要新的茶具。之前居無定所，都是隨便湊合着，現在找到落腳點了，便覺得是時候投資屬於自己的茶具。

受過多種茶文化薰陶的我很好奇德國在這方面有甚麼可取。雖然近年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茶熱，但傳統的德國茶具幾乎不存在：基本上茶具與咖啡具二者並無區分，而且看起來非常笨拙，是更精緻的英法設計的拙劣模仿。另一方面，在柏林時髦小區的精品店可找到色彩繽紛的葡萄牙製當代北歐設計陶器，賣茶的專門店也有售傳統的日本茶碗。然而北歐人設計那些無耳杯的對象大概是 Cappuccino 而不是茶，傳統日本茶

碗或功夫茶具也不完全適合廿一世紀的日常生活，儘管現在很多的文化復興運動，東亞人正透過精心重演古典茶道儀式與散發「正宗」東亞美學的佈景和服飾重新發現他們的傳統，並使之成為一種非常 Instagrammable 的小眾時尚。亞洲人自我異色化可怕，還是西方人挪用東方文化更為糟糕？一次逛宜家，在餐具區發現一些「和風」系列，但那些半桶水的模仿讓人感覺很不爽。它們是為從未用過茶杯或飯碗但又喜歡這種「東方時尚」的人而製的。對亞洲人來說，那些形狀、大小、比例、顏色圖案、觸感全都不大對。穿過其他區域前往出口時，有些甚麼吸引了我的注意。園藝區一個架子上，放著餐具區沒有的藍綠色小陶杯——原來它被歸類為迷你花盆。但對我來說，它比起剛才餐具區中被稱之為茶杯的所有其他東西都更像是茶杯。

馬克杯及 IKEA 花盆



開始研究茶杯的歷史時，我發現人們剛開始喝茶時，專門為茶而設計的飲用器皿尚未存在，因此人們就隨便使用手頭上的東西。在日本，始於十五世紀並以千利休為代表的「侘茶」運動，挪用了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日常使用的廉價陶瓷碗，最終演變為我們所認知的日本抹茶碗。所以，就像千利休在一隻飯碗裡看見了一只茶碗一樣，我也於一只花盆找到一只茶杯。

日本茶碗的故事並未結束。2014 年至 2015 年旅居日本期間，我曾經歷了一場語言危機：搜尋「飯碗」時，發現它並不存在；搜尋「茶碗」時，飯碗卻出現了；明明也叫茶碗，我卻花了很多時間，才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茶道茶碗」類別下找到抹茶碗；迴轉壽司店那種日常粗用的直筒茶杯則叫作「湯飲」（熱水飲用器皿之意）。這就是日式演繹有欠準確的地方。

能指與所指之間不穩定關係的例子還有的是：一天我們上了 Mulackstraße 一家時髦（且「正宗」）的日本茶室，並點了抹茶。櫃檯的日本女生以德語提醒我（來了柏林三年，我仍未習慣這裡的亞洲人以德語而不是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般以英語或其他東亞語言跟我說話：即是說，我不習慣他們沒有根據我的外表而對我的出身作任何假設），他們的抹茶是盛在 schale（碗）裡的，而且不加牛奶。她可能只是出於好心，想確保我知道自己點的是甚麼，但我卻有點奇怪她竟覺得有需要向我澄清這對我而言

是理所當然的細節。也許所謂理所當然的東西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就像人們都理所當然地覺得茶是一種放在茶碗或茶杯裡喝的熱飲，直至 1981 年伊藤園出產了世界上第一瓶瓶裝烏龍茶。就像印度奶茶和抹茶越洋過海後經歷異變／基因突變，變成了「chai latte」和「matcha latte」，並被重新定義。因此，我們究竟是用碗、（有或沒有把手的）杯還是塑膠瓶（甚或花盆）來喝茶可能並不那麼重要。形式為功能存在，而兩者都是流動的。

現在是閱讀岡倉覺三（Okakura Kakuzo）的 *The Book of Tea* 的最好時機。隨著茶在西方世界再度流行，這一部經典著作重新被搬上神枱。除了書中對中國和日本的茶歷史與哲學的深入研究，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本小書原文就以英文撰寫，並於 1906 年在美國首次出版。它並非當時西方 Japonisme 熱潮中被翻譯及挪用的產物，而是由岡倉本人帶着向西方介紹茶道，以抗衡主流西方文化的明確目的而撰寫，而當時明治維新的知識分子普遍都批判日本傳統文化而主張擁抱西方模式。多得岡倉的影響，京都和奈良才逃過了於二戰被美軍炸毀的命運，今天我們才得以享受古都風情和抹茶甜品。但重點是，一個世紀前的西方竟有另一個亞洲僑民試圖向極其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世界解說茶與東方世界，實在很讓人有種奇異的滿足感。

怎麼我們好像從未聽過類似的關於中國茶和茶具的故事？眾所周知，最好的白瓷來自景德鎮，但我未見過有人像收藏 Wedgwood 或 Spode 那般追求優質的景德鎮茶具。Edmund de Waal 在 *The White Road* 中講述了他的白瓷起源朝聖之旅。我對茶杯的調查主要在網上進行，De Waal 以第一身探索白瓷歷史的嘗試跨越了時空，從中國景德鎮，到法國 Versailles 與 Limoges，

德國 Dresden 與 Meissen，再回到起點的英國。我嘆服 De Waal 對中國瓷器歷史知識的淵博，同時發現不期然間我竟也走過一條類似的軌跡：從香港到英國、日本、法國，再來到現在的德國。不知不覺的，我也走上了那條白色之路，心中念着棕與綠，以及其容器。



景德鎮 Chinoiserie 茶杯

還以為在柏林要找 Dresden 瓷器很容易，但我更常遇到的反而是東德製造的 Jäger Eisenberg 仿青花瓷。它有其有趣之處，具有一款獨特的稻草圖案與 Art Deco 形狀，在我位於前東柏林的新居是不俗的裝飾，但並不是我會經常使用的東西。2021 年夏天搬家之際，隨著疫症限制略為放寬，我們去了一趟 Dresden 短途旅行。由於沒有時間專程前往 Meissen，我們只參觀了專門店，結果也沒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我開始明白為甚麼 Edmund de Waal 說 Meissen 是一場試圖模仿中國的法國的實驗失敗結果。

奇就奇在我竟也去過 Limoges 好幾次，但每次也不過在火車站稍作停留。因此對於這白瓷之城我所認知的只有那座宏偉的石與鋼鐵組成的十九世紀建築，和其前方相當荒涼的後工業公車站。如同 Dresden，閃閃發亮的白瓷被隱藏於沾滿沙塵的灰色石頭和混凝土背後。Limoges 是我們送迎一名擁有一半英國血統和一半法國血統的城堡女主人

的親友的地點，她的 16 世紀城堡位於 George Sand 所在的 Berry 地區的鄉郊，距離 Limoges 約一小時車程。數年前我第一次造訪，本是想去學習一些「正宗」的法語和文化，沒想到在這個以英國人為主的家中，我幾乎是會講最多法語的人。這裡不見 Limoges 瓷器，卻有大量的英國骨瓷，仿明青花瓷杯碟茶壺等排滿了整幅牆壁。有些人對於我稱呼那些繪有藏於寶塔與垂柳之間的幻想東方景緻的奇觀 Chinoiserie 為「那些冒牌中國貨」感到很好笑。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擁有這麼多華麗的 Staffordshire 茶具的愛茶的英國人，喝茶時都只是在馬克杯中放一個茶包。

我唯一遇到 Limoges 白瓷是在當地的市集，零丁或成套的茶具食具都以不能置信的超低價出售。對門外漢如我來說，所有白瓷看起來其實都差不多。無論是 Meissen、Staffordshire 還是 Limoges，都是被花卉或其他裝飾圖案所淹沒的白色粘土，形塑成浪漫的 Rococo 風格，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極

東德製 Jäger Eisenberg 茶杯



其脆弱而且完全無法保溫，總之就是裝飾性多於實用性。與茶一直是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東方不同，茶在西方是一種奢侈品，西方茶具設計不為實用，而是為裝飾性的華麗。

回到柏林，又有一次奇妙的偶遇。我花了幾歐羅，從一位德國老太太那裡買到了一件非比尋常的東西。雖然我見過很多西方製造的 Chinoiserie 瓷器，但我這還是第一次遇到景德鎮出產的仿明青花 Chinoiserie 花樣的英式茶杯連茶托。我知道中國有製作專門為出口西方市場的產品，但見到東方人親身參與這場西方異色化東方的計劃，仍是令人震驚的。難怪那些英國人會以為他們的 Chinoiserie 是「正宗的」中國產品：誰又能說得清呢？

「咩係正宗？好味咪正宗囉。」香港著名美食評論家蔡瀾在電視螢幕上展開他趣怪而寬容的招牌笑容。我們對所謂正宗是如此執著，以至那評語聽上來簡直有若褻瀆。那是頓悟的一刻。Edmund de Waal 在書中說他早就放棄了「正宗」。早於我的探究開始時，我便知道這兩個字本身存在問題。追溯得愈遠，距離正宗也就愈遠。結果正宗就是對你來說感覺對的東西。手感恰到好處的茶杯，熱茶的香氣，喚起往昔快樂的日子。

Heimweh(家的痛)在德語中是鄉愁的意思。從我於海外生活的有限經驗中，我知道 Heimweh 是發生於味蕾中的。每次搬到一個新地方，總會有人問，你

最想念家鄉哪種食物？我的答案一定是茶，尤其是港式奶茶。對我來說，港式奶茶是正宗的，不僅因為它比「原裝正版」的英式奶茶好飲得多，也因為它對我來說別具意義。港式奶茶專用的厚身碗形白瓷茶杯與茶托毫不優雅但日常可親，為流散生活中的所有混亂失序提供了一個舒適安穩的空間。2019 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隨後泰國、緬甸、印尼亦相繼發生政治抗爭……人們開始談及象徵團結的「奶茶聯盟」。茶是我們的語言。一個異鄉人在一個不懂得我的茶的語言的異地，我重新審視遠在北美洲、已然蛻變成美國人的親戚，想到華裔僑民的離散史，並第一次感到心裡抽痛。

我覺得自己有必要保存這神聖的遺產——一種味道、一種觸感與空間感、一種將我與我失落的城市聯繫起來的儀式。環境轉變，於是我們向前看，但該留下多少，又帶走幾多？該像明治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擁抱新事物而拋棄舊事，還是像岡倉或現在那些茶文化復興主義者那樣義無反顧地堅持自己的根，甚至在面臨身分危機的時刻嘗試將之重新創造？我們能接受多少轉變，而又不離其宗？在這全球化、大規模流離失所、種族意識和解殖的時代，多元文化主義、文化同化、文化挪用和民族主義運動意味了甚麼？也許，在尋找一只完美的茶杯的時候，我其實是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撰於 2022 年 7 月柏林

編者答 / 鍾榮豪

AI Chat

如水

編委

編輯

國際



如水編委 - 鍾榮豪

Forward message

如水網址 | <https://flowhongkong.net/>

讀者invited如水編委—鍾榮豪改



讀者

當香港漸漸淪為 failed state，身處香港的人可以如何自處？除了移民還有何出路？



如水編委 - 鍾榮豪

首先我認為在外和留港的港人各自都有該做的事，每個人都有權選擇及規劃自己的人生，去和留的人沒有甚麼理由互相指責，或者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一方，因為留下和離開都不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留下的香港人固然要面對很多政治上的壓力，但起碼有兩點是他們可以繼續努力的。

第一就是圍爐取暖。雖然現在大型集體政治運動已不復見，但在政治寒冬下，我們更應該想辦法與同道保持關係，以非政治、非正式（e.g. 私人聚會）的形式，將之前社會運動所積累的人際網絡保留，甚至是擴張，讓各位看見彼此，知道大家仍然繼續在小事上奮鬥。

第二就是保育各種香港故事以及文化，避免它們被官方論述所改寫，因為這些都是香港民族存在的印記。



讀者

離港潮不斷增加，海外港人（不論流亡／移民）應否在移居的國家爭取政治影響力？



如水編委 - 鍾榮豪

要在異地爭取政治影響力，必要條件之一是香港人能形成強而有力的離散社群。我認為不論我們是否需要爭取在地政治影響力，組織離散社群都是值得去做的事。對外而言，蓬勃的港人社群所形成的政治力量不只能為香港民族爭取在地權益，亦能令香港議題更恆常地受移居國關注。對內而言，活躍的香港族群可強化海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令香港人身份更容易傳至移民二代，長遠而言更有利海外的民族資本形成。



讀者

從目前看來，香港獨立的可能性大嗎？將來有沒有機會達至港中區隔？



如水編委 - 鍾榮豪

現階段而言我們的確正處於劣勢，但換個角度來看，中國對港不惜殺雞取卵，犧牲香港自由城市的國際聲譽，其強勢正正反映中共當局已無法有效控制香港。另一方面，中國正面臨各種危機，再加上台海以至南海戰事隨時一觸即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在東亞上演，這些可能會出現的動盪都有機會為香港現況帶來重大轉機，但對香港的民主及主權的未來而言是福是禍，仍然是未知之數。

不過無論未來如何，我們香港人應該為任何變化作好準備，只要香港民族仍然為世界所見，甚至為移居國及全世界作出貢獻，我們就有迎接改變機會的希望和能力。



讀者

多謝你嘅回答！

編者答 / 鄺頌晴

AI Chat

如水

編委

編輯

國際



如水編委 - 鄺頌晴

Fixed message

如水網址 | <https://flowhongkong.net/>

讀者invited如水編委—鄺頌晴



讀者

想問點先可以適應到流亡後的生活，每一天營營役役，我唔再喺前線，返到一個較為平靜嘅生活，點先可以好好生活，因為我唔似其他人成日參加集會，或者其他活動，甚至乎有啲抗拒。好似有啲刻意斷開？我都唔知道。



如水編委 - 鄺頌晴

坦白講，我自己去到呢一刻都係未「適應」到流亡嘅生活。

當你响一個地方生活咗二十幾年，對佢有好深嘅情感嘅話，其實唔會用幾年時間就可以改變到自己嘅習慣、胃口同埋心態。我到今日仍然會因為好想食米線、好想食砵仔糕但食唔到所以好唔開心，會偷偷地喊。掛住香港同嚟香港嘅種種生活簡直就像更加難受。

當日經歷過咁震撼同創傷嘅社會運動，要進入日常返工返學，甚至喺無嘢做嘅日子其實好困難。人響外國，有時感覺係平行時空，你屋企著咗火年輕人要考慮嘅係流亡，但呢個地方嘅人要思考嘅係聽日買咩衫、同朋友去邊度玩。我自己同外國朋友有時都會有話不投機嘅感覺，覺得無人明白。

同一時間，唔想參與集會或者其他活動其實都係好正常。不停去重新諗起當時發生過咩事，可以係非常痛苦。我自己係連關於 2019 年嘅電影都唔敢睇，只係因為工作關係先睇過兩套，之後成個星期都好唔開心係咁喊。所以如果你唔舒服或者抗拒，其實都好正常。「人有事先可以做世界冠軍」，希望你會先照顧自己嘅情緒。

我自己係每個星期都有睇 Therapy 處理情緒，真係幫到我好多，可能你係要先休息下避開下，可能係行下公園去下大自然。同理「適應」唔係一件可以「趕進度」嘅事，係需要好多好多時間，知道自己仲係不適，畀啲時間自己去習慣。我哋失去咗嘅嘢係好大大嘅，可能要好多時間先會慢慢好受啲。



如水編委 - 鄺頌晴



人有事先可以做好世界冠軍



讀者

謝回答，祝各位生活安好。

編者答 / 黃台仰



如水編委 - 黃台仰

Pinned message

如水網址: <https://flowhongkong.net/>

讀者invited如水編委—黃台仰



讀者

早排澳洲 71 搞集會睇返反送中紀錄片時，有勇武派手足嚟鬧場話睇吓電影係光復唔到香港。呢度唔評論佢哋搞自己人場嘅做法，道理大家都明，但香港乜宜家仲有勇武抗爭嘅空間咩？想知道編委們點睇勇武抗爭剩餘嘅路線同可能？



如水編委 - 黃台仰

在回答現時香港還有否勇武抗爭的空間前，或許首先弄清大家所理解的勇武抗爭是甚麼。勇武抗爭的空間是否只局限於街頭的前線抗爭？它是單指激進行動還是某種心態？

「勇武抗爭」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理解及想像。在 2014 年雨傘革命前的語境，推鐵馬、與警察有輕微碰撞已經算是勇武行動。在後雨傘時期，勇武行動的定義躍升至與政權及警察更激烈、更直接的衝突，如在「光復行動」及「魚蛋革命」中示威者的行動。在 2019 年的革命，勇武行動終於被廣泛接受，成為整場革命中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策略。在政權及警方不斷升級的暴力下，勇武行動因此在短時間內，由快閃佔路升級至「火魔」、「裝修」，甚至「玩具」。

2014 年前的所謂勇武行動，在 2019 年的語境中變得不再勇武。由此可見，「勇武」指的並不是某套特定行動，而是一套指引行動的心態。那「勇武」心態是由甚麼特質構成？

要了解「勇武抗爭」不能忽視它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發展的脈絡。「勇武派」的出現，起初是為對抗傳統社運組織的「和理非」教條。作為「勇武抗爭」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推手，梁天琦曾言：「和平、理性、非暴力，有啲人仲覺得應該要非粗口。佢哋覺得呢啲嘢係天條，一定唔可以違背。當咗金鐘呢個地方，有義士衝出龍和道嘅時候，結果就畀一班教條主義嘅示威者拋棄。我哋反對嘅係佢哋呢一樣，我哋反對嘅係教條主義，而唔係和平集會或者公民抗命本身嘅能力。」

對教條主義的否定意味著抗爭者應該因時制宜。

簡單而言，因時制宜即是抗爭者根據自身及外在條件，計算出一個最有可能達成目標的行動，背後的思考是跟從理性原則。以 612 包圍立法會為例，當日群眾的目標是阻止送中條例二讀通過。大家十分清楚，若然當日不嘗試包圍立法會阻止議員進場，二讀將會通過，當天的抗爭亦會失敗告終。在這樣的條件下，不採取更「激進」行動，整場運動將會注定失敗。採取「激進」行動雖然未能保證一定成功，但至少成功率比不採取行動或採取象徵式行動高。

採取「激進」行動意味著風險及代價亦會相應提高。我認為「勇武」的核心特質在於，當面前唯一可行的選項是高風險、高代價的行動，但仍然願意冒險，以換取更高的成功率（或至少為僵局帶來變數）。

「勇武」是一種願意冒險，不惜犧牲，亦要為整場運動及族群帶來可能性的心態。

回到讀者問題，若然對「勇武抗爭」的理解不再只流於形式上，便會明白在現時的香港，任何有機會帶來新可能性的抗爭，都會面對極高的風險及代價。所有，仍然願意去冒險，去犧牲的抗爭者，在我看來都已經是勇武派。



讀者

Thanks!



Write a message

編者答 / 馮敬恩



大中華港獨

評論·讀者投稿

我愛我的國 而她尚未誕生： 大中華港獨理論基礎

文/羅依

執子右手、右手不釋 BIC 牌 Cristal 藍色原子筆寫作，一個傻仔。

居家聽風聽雨、坐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無可救藥「大中華膠」如筆者，不禁重溫練乙錚教授 2017 年預言，故宮博物院香港館將「成為一道分離主義者可資利用的裂痕」... 不出兩三年，香港將出現有別於『本土港獨』、潛力深不可測的另一種分離主義思潮：『大中華港獨』，自慰一番。練老當年盤點香港民主陣營譜系，指出民主回歸派、內部自決派、民主自決派、修憲永續派、華夏城邦派、民族自決派以至本土獨派，一應俱全，僅餘大中華獨派，尚未誕生——因念錢賓四先生告誡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力避紛擾、自定取捨；我一介泥古迂儒、惟務尋章摘

句，斗膽預製大中華港獨理論片瓦引玉，以俟海內外有志之士書到用時，俯拾皆是為盼。

一七年〈林鄭「西九僭建」煽出港獨最終型〉到一八年〈戰後中港關係思想史的脈絡〉，練教授舉例說明中國歷史文物堪為大中華港獨藥引、而新儒家思想反共成分早已過時，恕我逼不得已，固執已見——由於馬列主義者如中共政權，其意常在「否認普遍的人性」、「打倒一切建基於普遍的人性基礎上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詳見〈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至「徹底改造推翻中國文化」（唐君毅〈與青

年談中國文化》語），筆者大膽假設傳統中國社會生成內涵人文精神一切事物，其存續本身自然抗共、反共，譬如練氏設想「一個秦漢展」，可以勾起大一統王朝武裝殖民嶺南地區古老記憶之餘，參觀者延伸閱讀兩代嚴刑峻法以至刀筆酷吏殘民之慘烈、南越國早於公元前 203 年脫離北方政權獨立並且薪火相傳五代之久……禁之不絕；「魏蜀吳講座」聽眾意猶未盡、翻查《三國演義》，煽動言論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開宗明義，映入眼簾；「介紹乾隆的十全武功」，準噶爾渾台吉、回部大小和卓、兩金川土司以至曼殊師利大皇帝本人與香港市民同屬一個民族，固然難以自圓其說，今日蒙古、緬甸、越南、尼泊爾不隸紅色中國版圖之形勢，亦足以啟人疑竇。要而言之，共黨「依法治國」、「大家都是中國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等官方論述，以史為匕首、為投槍攻之，不堪一擊——今人所需物資與裝備，古人從《竹書紀年》以來三千七百餘年，早有悠久、詳密、無間斷之預備，信手拈來，如何壓抑激情與敬意？賓四師《國史大綱·引論》不諱言「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係我甘冒自賣自誇之譏，都要斬釘截鐵講返出嚟，時光倒流一句話。

華夏觀念與「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論述如何兼容並蓄、香港人如何汲取牟宗三先生提倡「人文教」經驗以安頓民族生命如藏傳佛教與猶太教等議題，雖然值得探討，篇幅有限，今次抗議中國共產黨「依法管治」香港，筆者專從政治哲學一範發揮。《論語·為政第一》有句話，孔夫子喲學生

二千五百幾年筆錄、今日初中生尚能望文生義、朗朗上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香港各級法官公然訴諸「阻嚇性刑罰」、「向公眾發出強烈訊息」，德拉古式 (Draconian) 嚴刑峻法、殺雞儆猴，莫講新儒家期期以為不可，依我牆內閱報所見新春文告，即使共黨大力「統戰」孔教組織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至多撐到伊個地步：「現代社會很重視法治，但是，法是人制定的，如果德治衰敗，缺德之人不可能制定良法，缺德之人也不可能遵守良法。儒家治國之道的基本要義『為政以德』，推行道德教化，實行『德主刑輔』，實行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德治改造人的內心，法治制約人的外在行為；法治需要強制力量，德治依靠人性自覺；法治是他律，德治是自律。所以，法治與德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至於我哋揭發「大中華港獨」旗號，譴責地踞衙門肆意舞弄法網，妄圖將八百萬港人拖入寡廉鮮耻深淵、陪同十四萬萬北朝臣虜跪住做法律奴隸，理直氣壯更甚。

其次請言中共只准河水汙染井水、嚴防井水澄清河水，何以撕毀舊中國授權本港讀書人參與中國政治之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釀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殖民地之事實。原來漢代察舉以至唐代科舉制度之用意，賓師《史綱》一言以蔽之，在於「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佔領香港二十五年，中共一方面以駐港聯絡辦公室、選舉委員會、功能界別選民、《基本法》附件三為手段，變

大中華

本加厲干預香港人組織政府以至香港政治，另一方面仍未開放中央政府職位以及明確升遷途徑，畀香港居民入仕——孟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市民苦苦守候政客所謂「民主回歸」，到頭來招致帝國二等公民待遇，夢醒時分謀求自決也好、獨立也好、「支爆」也好，不亦勢所必然、理所當然？

遠在西方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問世甚至古典民族主義移植神州大地之先，東海南海北海就有聖人教導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物有本末」而「君子務本」，修齊治平，首要「知所先後」，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等道德義務未盡，照顧天下蒼生無從奢談：「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資源有限尤甚：「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香港本土久經「白蟻政策」侵害，錫金化 (Sikkimization) 在即、危在旦夕，苛求香港人割讓社會資源、政治權力畀素昧平生、毫無倫常關係 (Cardinal Relationships) 可言嘅雙非家庭、「內地專才」、紅頂商人、京官以至黨國體制，根本毋須動用民族主義駁斥——有關主張其實違反人性、敗壞自然道德 (Natural Morality)。

上文舉例數端，旨在說明中共在港倒行逆施，樁樁件件，皆為儒家思想、中國政治傳統，以至天理所不容，所以我相信孔孟以迄錢賓四、唐君毅、牟宗三諸



香港故宮

位先生在天之靈，會庇佑人類戰勝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利維坦（Leviathan）巨獸、推翻地球上最後一個列寧式政權，迎來貨真價實嘅歷史終結；人類社會理想模式，或者既非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亦非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而近乎費孝通《中國紳士》、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蕭公權《中國鄉村》記載，推舉德高望重鄉賢帶領鄉親謀福祉，遍地自治社區——然則古語有云「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有道伐無道，無德讓有德」，驅除共匪、取而代之，恢復香港主權先決條件，係香港人嘅德行，修養到皇天后土認可嘅境界。新亞書院畢業、升學加拿大一位兄弟，賺人

熱淚一席離別贈言，忽然湧上心頭——謹此告罪挪用，作結並與《如水》諸君互勉：

「但願我真能進德修業，
但願我能在海的彼端持續呼叫，
但願我終有一日
能聽到家鄉雷鳴的回聲。」■

中國即外國：文化詮釋與割捨

文/雨果

作者簡介：生於香港，居於臺灣，「中國」文化愛好者。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概念源於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 1980 年代的論述，本意是把「中國文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政治中國」切割出來，並把「中國」一名的詮釋主導權移往中華民國，或是傳到其他海外華人手中。諷刺的是，這種分裂「中國」的概念，竟然變成中共的避風港，甚至在香港演化為所謂「愛國不愛黨」的統戰論調。

筆者生於英屬香港下政治冷感的小家

庭，政治黑暗的恐懼在耳聞中建立，想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文革、六四，中華民國則有白恐、戒嚴，所謂「政治中國」彷彿就是洪水猛獸。然而，「文化中國」在腦海中像是另一世界，從武俠小說、唐詩宋詞、諸子百家種種，建構了「中國」的理想形象。此種「理想」與「現實」的反差，讓筆者順理成章地接受了「愛國不愛黨」的口號，力圖推廣中國文化，甚至有五四時代那種「文化救國」的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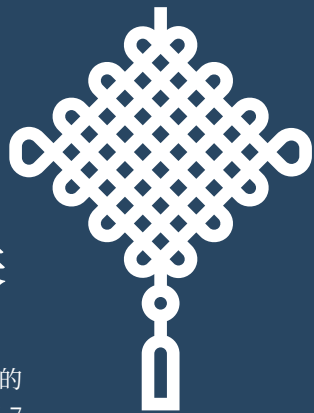
「大中華」之勢不可拒，幸在「膠化」前已止步。經歷 2014 年、2016 年、2019 年的社會運動，政治已經逼在眼前，而對中國的怨仇亦已無可復加。幸或不幸，筆者也在期間於「中國語言及文學」為名的學系完成學業，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依舊激烈。到底應該用甚麼取態面對「中國」兩字？到底身為香港人還能否接受「中國」兩字與自己沾上關係？

若然 1990 年代以分割「文化—政治」應對六四事件後的中國，那麼 2020 年代的香港或許應該徹底切割與「中國」的關係。然而，刻意迴避中國文化並非良策，也只會削去香港文化的重要部分。我們需要做的是解構「中國」的概念，拆卸千年古國的偽裝，把「朝代」還原為一個又一個短促的異國。我們不必捨棄文化，但是必須去除「中國」的概念，把所謂「中國文化」視作構成香港文化的種種外國文化之一，香港方能脫離「華洋匯雜」這種二元區分下隱藏的「中國」本位枷鎖。

「中國」本來就是抽象的概念，並不是現代定義下的「國家」。周、秦、漢、魏這些朝代興替，往往帶著滅國之恨、亡國之哀，難道那些都是無病呻吟嗎？只是世人勉強把敵國縫合，為了塑造出萬世不滅的「中國」，淡化朝代之間的本質差異。掃除大一統史觀的遺害，正視各朝為獨立國家的正當性，只要重新建構「獨立」史觀，香港自然可以擺脫「大中華」的陰影。

從推廣中國文化，到解構中國文化，其實也是一體兩面的轉變。爭奪所謂「華夏正統」的詮釋權，終會落入與「中國」糾纏不清的田地。先秦時期的《荀子》有謂：「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我們應該去除混亂，而非疏理混亂；應該要去除污漬，而非修飾污漬。共產中國沾污改造的中國文化，始終會成為文化侵略的破口。

如果我們把文言文視為外語，把朝代視為異國，那麼筆者喜歡的語言文化，就跟有人喜歡波斯、西班牙、日本的語言文化一樣。此種思想轉換對於大眾來說或許不難，但是對於曾經的「大中華」信仰者來說，或許是不容易但可行的出路。筆者只希望用自己微小的筆端為香港多做一點事。2019 年以後，失去的太多，也沒甚麼不能再捨棄。若然有天「中國文化」需要伴隨「中國」滅亡，相信筆者也會用文字投下贊成的一票。■



編者結語： 從大中華膠了解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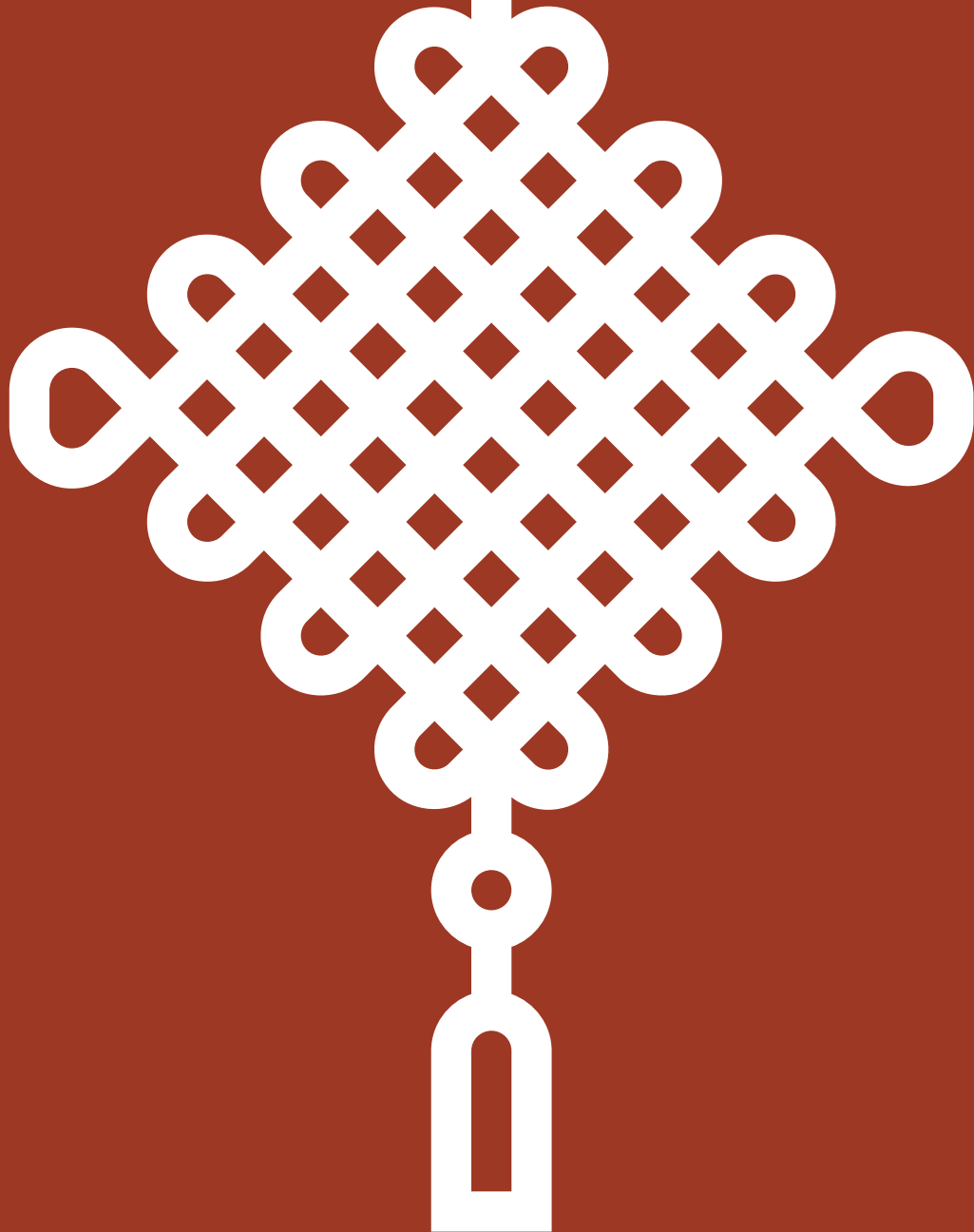
《如水》第7期以新面貌與讀者見面，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更全面、更立體的視野讓讀者了解及思考每一期主題。新增的「化零為整」系列整合了5至7月主要與香港相關的報道及消息，令讀者可以一覽數月間在香港及國際間發生的事，了解整個世界的動向，以及利用宏觀的角度去審視香港及世界大勢。「大舞台」及「四手聯彈」則以藝術的形式回應主題，我們希望除了文字以進行分析外，亦能以圖像與讀者溝通，以不同媒介闡釋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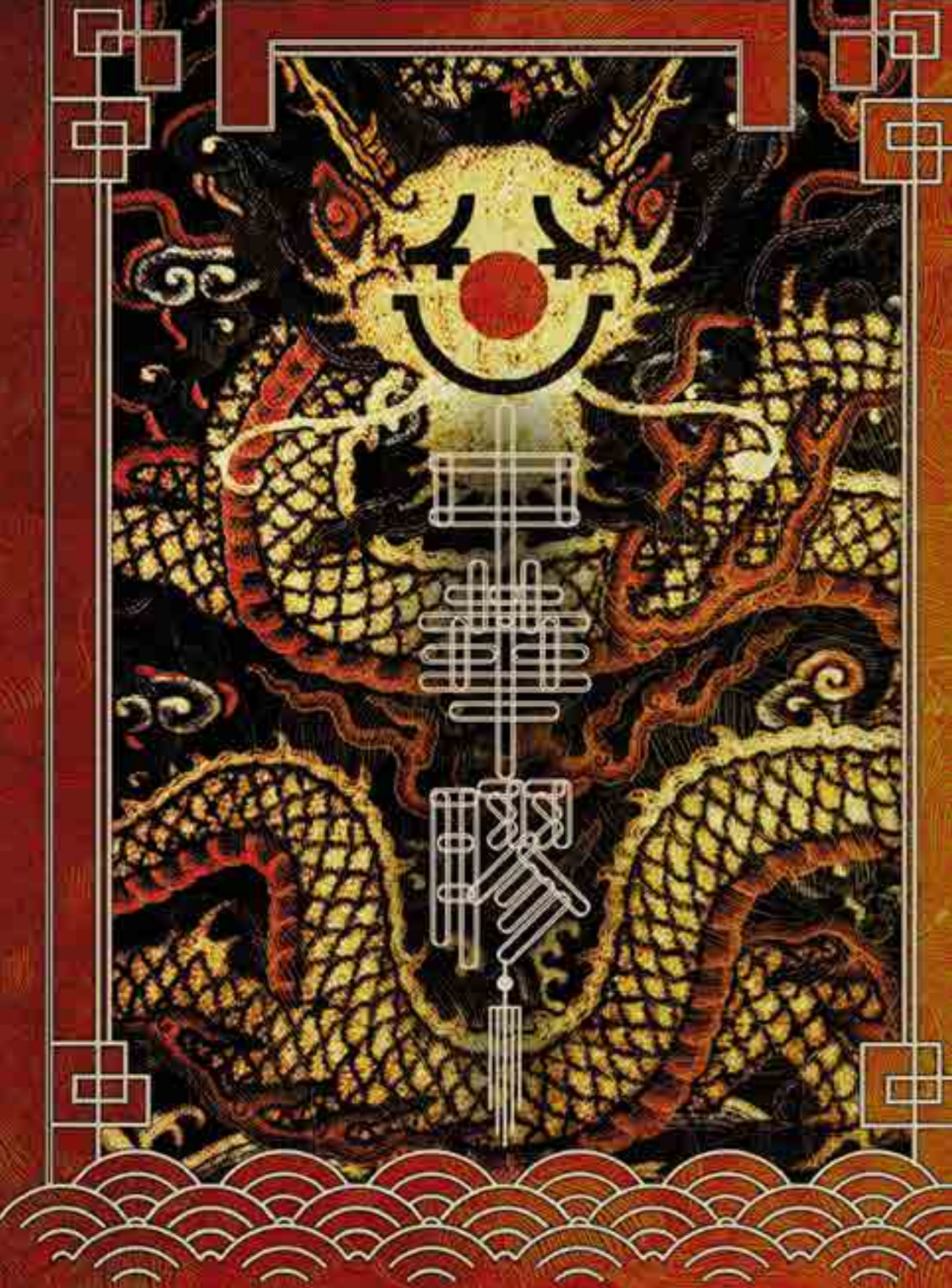
本期以「大中華膠」為主題。在講求香港民族自決的年代，大眾著重的是以香港作為本位去思考，而不是作為中國附屬品的角度出發，徐承恩在〈脫華論：告別黃河，擁抱海潮〉一文中亦指出脫華是當今港人的任務，並應丟棄所有「承繼中華道統」的顛倒夢想。在這個情況下，「大中華」主義顯然是走在相反方向。

只是在現實層面而言，要討論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要與中國扯上關係。在政治不穩的年代，愈來愈多人移居外地。英國、加拿大可說是最受歡迎，在一個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國家，許多人對於香港的概念都是模糊的。人在外地，少不免會被問道「Where are you from」，當你回答「Hong Kong」後，可能有少數人會和你討論中國的邪惡以及說句歡迎，但更多的是會同你講佢睇過Jackie Chan、「Chinese food」好好食又或者講句「Ni Hao」，將你與「Chinese」這個身份連在一起。再加上，不少港人在外地亦會保留過節日的各種習俗，食糰、賞月、食月餅。同時間，中國人同樣會慶祝這些節日，我們又應如何向外解釋香港人與中國人有甚麼不同？除了日常生活外，在學術界亦是如此，香港研究目前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範疇，更多情況就是被歸納在中國研究之下。

活在中國陰影下的我們，更應該去了解這個龐然大物。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雖然老土，但當港人向世界提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時候，我們確實需要了解中國是甚麼，而香港自身又是甚麼，兩者之間又有何不同，否則很容易淪為一個空有其表，無實質內容支撐的主張。因此，本期有不少文章討論到何謂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希望從理性的角度去理解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又以台灣作為借鏡，分析香港可以如何借助中國去建立自己的地位，並讓讀者們在了解大中華主義及中國的同時，更了解香港自身的地位，以及現時可做之事，從而走出中國的影子，迎向光明。■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2 OCT Vol. 7「大中華膠」The Great Sinophile

編輯委員會 張崑陽、黃台仰、鄺頌晴、江旻諺、鍾桑豪、馮敬恩、式、言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靄人、譚競嫦、周永康、梁繼平

總編輯 張崑陽

編輯部 亞當、冬甩、日巷、卡卡、莫莫

美術設計 Mido 筑、馮詔天 Sky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106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9 號 8 樓之 1
電話 (02)25643255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2 年 10 月

定價 新台幣 450 元

客服信箱 contact_cs@flowhongkong.net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聯絡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水 Flow HK》

官方網站：<https://flowhongkong.net/>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lowhkmagazine/>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flowhkeditorial/>